

炎黄春秋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

力挽狂澜： 周恩来在一九六六 邓宝珊与中共高层的微妙关系

祸起萧墙 冤惊海内
——林彪迫害罗瑞卿的阴谋纪实

《甲申三百年祭》疑议
——老作家姚雪垠访谈录

天津卫“打”红杨小楼



“郑和”舰水兵

1
95



立春门笄 十二生肖(挂帘) 陕西安塞

本期导读

△力挽狂澜：周恩来在一九六六

在“文化大革命”狂飙骤起的紧要关头，为了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使国计民生免遭厄运，周恩来殚精竭虑，忍辱负重，以“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艰难抗争。时值敬爱的周总理逝世 19 周年，谨发表此文以资纪念。

△《甲申三百年祭》疑议

——老作家姚雪垠访谈录

《甲申三百年祭》，尽管出自郭沫若这位名家手笔，又经毛泽东这位伟人首肯，然而，仍可以研讨商榷。半个世纪过去了，著名老作家姚雪垠曾对此文中的若干史实和某些论断提出疑议。今日发表，旨在倡导唯物史观。

△邓宝珊与中共高层的微妙关系

在毛泽东海纳百川的胸怀、团结救国的智举的感召下，身为国民党上将、并身兼要职的邓宝珊，却能在“剿共”高潮中与中共友好往来，睦邻相处。并在解放战争后期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和榆林、绥远起义。这是非常特殊而又微妙的历史现象。

△天津卫“打”红杨小楼

一代名伶、武生泰斗杨小楼，当他初出茅庐时，在北京这块梨园圣地，却屡遭挫折，并未走红。后经名师真传，刻苦磨炼，并在易地天津后，偶遇两家戏园子争他上演的一场纠纷，于是，声名大噪，技艺超群，堪与谭鑫培、梅兰芳等大师齐名。

△祸起萧墙 冤惊海内

——林彪迫害罗瑞卿的阴谋纪实

深得唐玄宗宠信的宰相李林甫，口蜜腹剑，面柔心狡，权势极盛，政事败坏。林彪与此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请看一代名将罗瑞卿，怎样一步步陷入林彪编织的毒网，又怎样一步步被逼进冤海的。

△参与和平解放北平的何思源

在北平和平解放 46 周年之际，有一位人物值得一书，他就是国民党曾任北平市长的何思源。他不仅呼吁和平，四方游说，还甘冒全家被军统特务安放的定时炸弹炸得一死五伤的危險，坚决表示：“抬着我也要出城参加和谈”。

下期要目

- △ 董必武指挥我占领《商务日报》
- △ 李政道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 △ 在国民党监狱中的陈独秀
- △ 国际主义战士谢唯进的悲壮历程
- △ 沈钧儒和他的女婿范长江
- △ 郭沫若与田汉的友谊与归宿告诉国人些什么？
- △ 尼克松的对华政策谋士——文龙传奇
- △ 说真话难，还是应该说真话
- △ 天地有正气
- 一群“推磨鬼”曝光记
- △ 改革名臣翁同龢晚年难度

1995/1 (总第 34 期)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苏双碧
张 饒 张国琦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 (常务)
丁洪章

总 编 辑: 洪 炉
总 经 理: 徐 孔
副总编辑: 刘家驹 王 恂 杜卫东

理 事 长: 杜导正
名誉理事 (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副理事长: 贝兆汉 李广尧
理 事: 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露
秘 书 长: 徐 孔

版式设计: 木子
责任校对: 秋实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770
社 址: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北京图书馆分馆内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出版日期: 每月 15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杂志社电话: 6016633-227 6076801
定 价: 3.20 元

开 篇	专 稿	春 秋 笔	轶 闻 录
④ 尊重史实是本刊办刊原则 本刊编辑部	⑤ 小平同志家乡父老情 母小平 ⑫ 力挽狂澜: 周恩来在一九六六 南山	⑬ 邓宝珊与中共高层的微妙关系 孙琴安 ⑭ 祸起萧墙冤惊海内 黄 瑶 ⑮ 参与和平解放北平的何思源 晓 鸥 ⑯ 林彪迫害罗瑞卿的阴谋纪实	⑰ 宋希尚智堵黄河大缺口 周乃光 ⑱ 记国家危亡之际的吴佩孚 张树昌

目 录

求 实 篇	英 杰 谱	殒 星 篇	艺 苑 志	文 荟 园	时 代 风	神 州 光	古 镜 台	编 读 窗					
④④ 以民谣为鉴……………尤 洪	④⑥ 《甲申三百年祭》疑议——老作家姚雪垠访谈录……………陈英茨	⑤① 李大钊身边的一对革命情侣……………罗学蓬	⑤④ 月黑星殒——文化先驱王思玷人生三部曲……………山 民 一 民	⑤⑨ 天津卫「打」红杨小楼……………刘连群	⑥④ 诗思·诗情·诗魂——我喜爱邓拓的诗……………丁一岚	⑥⑦ 张旭明、张大千与《五虎仕女图》……………朱家连	⑦⑦ 横扫六合军威壮——秦兵马俑二号坑发掘揭秘……………王兆麟	⑦⑦ 「郑和」号舰下西洋……………刘永路	⑦⑧ 关于纪实文章必须真实的讨论……………本刊编辑部	⑦⑧ 「正直刚方」话王翱……………陆茂清	⑧① 黄帝纪元推算……………倪 民	⑧③ 读者作者对本刊属望殷切……………本刊编辑部	⑧④ 关于纪实文章必须真实的讨论……………本刊编辑部

尊重史实是本刊办刊的原则

● 本刊编辑部

新年伊始,我们谨向本刊作者、读者致以美好的祝愿,并衷心感谢大家对本刊的支持。这支持不仅是指对我们的肯定和鼓励,同时也包括对我们的建议,特别是对我们的指正和批评。

本刊问世,已经三年有半。从创刊号到现在,已有34期刊物摆在读者面前。刊物本身,是我们办刊意图和宗旨的最好说明,无需我们再作解释。但我们仍想再强调一句:本刊以发表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纪实作品为主,而尊重史实则是本刊办刊的基本原则。

我们以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不应该离开我们的历史,也是不可以离开我们的历史的。历史是我们民族的根,是我们文化的源,割断或轻视历史,就将使我们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所谓“无古不成今”,就是这个意思。历史更是一面镜子,“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给人以启迪、激励或警惕后人。这也就是所谓“观今宜鉴古”了。

我们的昨天和前天,已经成为历史;我们的今天,亦将成为历史。人们当然有权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议论纷纷,各抒己见。但历史本身却是不容掩盖、歪曲和伪造的。因此本刊一贯强调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叙述,要求实存真,“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力求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情之殷殷,言之凿凿,道人生之真谛,还历史的原貌,为煌煌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留下可资借鉴的信史。

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各位读者的认可。一位研究党史的专家说:“《炎黄春秋》的一些重头文章是可信的。”一家报纸说本刊在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时,“不以成败论英雄”。一位大学教授认为本刊既有“史胆”,又具

“史识”,“胆”即唯物论,“识”即辩证法,两者相结合,便是我们常说的“实事求是”。

当然,我们决不敢以此自满,更不可以此骄人。因为我们深知真正做到尊重史实,实事求是,是非常不容易的。本刊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执行会长萧克,去年在本刊关于陈独秀一文中,曾经强调指出:“文化遗产中的‘糟粕’和‘精华’有时是很难一下子分清的。不认真分析,轻易的接受或否定,是不对的”。他还认为,“文化现象不一定只有‘精华’和‘糟粕’非此即彼两极。文化现象复杂得多,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处理”。我们以为,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认识和介绍,都应如此,决不可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而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很难的。

在还历史的原貌方面,也还有一个片面和全面、局部和整体的问题。即便是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某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知情人,因时间、地点、角度的不同,其所见、所闻仍可能是某些侧面,而非全面,某些局部,而非整体。但只要是事实确凿,而非虚构,则虽一肢一节、一鳞一爪,亦具有史料价值。瞎子摸象,说象是管子,是柱子,是一面墙壁,以偏概全,遂成笑谈。但如说象之鼻如管,象之腿如柱,象之腹如壁,都是事实,而且合在一起即近全象。这也正是我们竭诚欢迎作者、读者对我们已发表的文章进行补正的原因。至于一旦发现错讹,我们当严肃对待,做出纠正。过去我们是这么做的,今后更会努力。

补正史之遗阙,校传闻之谬误,是我们的愿望与职责。我们朝这方面努力,已经得到了众多作者和读者的信任与支持。今后我们一定会继续得到你们的支持,以及监督。让我们共同努力,把本刊办得更好,以无愧于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祖国腾飞的伟大时代。



力挽狂澜： 周恩来 在一九六六

● 南山

1966年，正当我国人民满怀信心地准备执行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建设计划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我国经济建设的进程。以林彪、江青为代表的野心家、阴谋家，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大肆宣扬“只要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挑动群众“停产闹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为了维系国民经济最起码的运转而不致于全面瘫痪，作为共和国经济“总管”的周恩来总理，在“苦海”（周恩来语）中进行了艰难的抗争。对此，我们截取1966年“文化大革命”最初几个月的一些镜头，就可窥一斑。

“做梦也没有想到”

1966年的元旦，中南海西花厅，似乎比往年的几个元旦更具节日的气氛。周恩来也显出难得的轻松，步伐也更具弹性和韵律了。

想想前几年的国民经济局势和当前的国民经济形势，周恩来也该稍稍吁一口气了。到1965年底，我国已圆满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国民经济终于从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中摆脱出来，开始走向好转。1966年，国家将正式执行被推迟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此时此刻，周恩来的思维触角全都聚集于如何在

国民经济调整的基础上，更好更平稳地把中国的经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以实现他早就提出的“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1月，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内蒙、辽宁、北京等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出现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干旱。周恩来打算以抓华北农业为突破口，扭转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南粮北调，进而把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作用而又一直难以“过关”的农业抓上去，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月底2月初，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研究对策和措施。并当场点将，要李先念负责河南，谭震林负责山西，余秋里负责陕西，林乎加负责山东，李富春、薄一波负责辽宁。他自己则自告奋勇地担任北京、河北组的组长。

正当周恩来全力以赴组织华北抗旱工作之际，3月8日和22日，河北邢台地区两次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两次飞赴灾区视察灾情，先后到了5个县、6个公社，号召农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鼓励大家“家里丢的，地里找回来”。

3月中旬，周恩来赴天津坐镇规划华北经济的华北局会议。行前，他写信给刘少奇、彭真等中央有关负

责同志，交待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处理事宜，告知自己准备下到河北、北京各地深入调查一个月。显然，周恩来是下了决心摆脱日常事务，全力以赴解决北方八省市区的农业问题。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思维触角却久久徘徊于阶级斗争、防止修正主义等问题上。他对阶级斗争的状况作了过份严重的估计，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正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他决意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这种危险。

5月4日至26日，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周恩来是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到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之中。在以后的讲话中，周恩来多次声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尽管他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忍辱负重，审时度势，想方设法尽量减少运动对维持国计民生的工农业生产的影响和冲击。

当大串连的狂潮涌来时，周恩来组织起草了两个限制性文件。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全国各地学生可以免费乘车去北京大“闹”一场。

8月16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外地来京串连的学生大会上对学生的串连行动公开作了肯定和赞扬。他说：“你们不怕大风大雨，到无产阶级革命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你们的行动很对。”8月18日，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在天安门对来京串连的全国各地红卫兵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

子，彻底打垮、打垮”。

陈伯达、林彪的讲话，无疑是号召全国红卫兵大串连的总动员令。此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离开学校，开始了“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大串连。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8月份，仅到北京大学串连的外地师生就有212.4万人次。

红卫兵大串连的狂潮，给我国本来就严重不足的交通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困难，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客运量的突然猛增。严重的超载使运输工具和运输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火车车厢的底盘弹簧被压坏，列车不能按时运行。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铁路交通管理部门的职工也外出串连，停业闹革命。全国铁路交通一片混乱，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生产建设，一些工矿企业因得不到必需的原材料供应而不得不停工。

对此，周恩来深为焦虑。他担心大串连这样发展下去，会导致铁路交通的停断。而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随之瘫痪。基于这种考虑，周恩来试图制定一些规定，对运动作某些限制。

8月下旬，周恩来指示陶铸组织人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把铁路枢纽和站段、港务局和码头等交通管理部门列为国家“要害部门”，强调对这些部门“必须进行坚决保护”，革命群众不应冲击这些要害部门，对不听劝阻者，应依法处理。通知稿拟出来后，周恩来批示送有关人核阅后立即发下去。

通知稿传到江青手中。江青提出：要中央再讨论一下。结果，这一通知就在江青的“讨论”中被压下了。

9月初，周恩来又亲自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其中在红卫兵串连问题上，强调要保障党和国家的工作要害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要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不受阻挠”，红卫兵不要到这些部门去串连，“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生产不致停顿”。《意见》还强调，必须向广大红卫兵讲清楚这些政策。9月3日，周恩来对《意见》作了最后定稿，立即召集政治局碰头会讨论通过。

会上，陶铸、陈毅等大多数人对《意见》表示赞同，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对红卫兵讲清楚具体政策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但是，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却有恃无恐地否定了《意见》。康生说：这十个问题（注：《意见》一共包括十个方面的具体政策）需不需要讲？我看不需要讲。这个文件如果发下去，就有“包办”、“代替”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戚本禹说：发通知，把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对立起

来，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由于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周恩来亲自起草的这一文件又未能走出中南海。

在欲以正式文件试图对运动进行限制、匡正的努力受挫后，为了维护起码的铁路交通，保证最低限度的生产建设物资运输任务的完成，周恩来又通过有关具体负责同志在具体工作中贯彻他的一些意图。他找到当时调任国务院协助他抓经济建设口子的余秋里、谷牧，要求他们花大力气精心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并对他们指示说：“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的，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他还忧心忡忡地说：“多拉一些学生是有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顿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和大动脉，一旦停顿，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你们可得帮我把握住国民经济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周恩来一再努力，试图将“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限于生产领域之外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些党政机关进行，工矿企业和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邪火也向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蔓延。一些工人、农民也纷纷离开自己的生产岗位，四处串连，大批的领导干部被当作“黑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揪斗，各级生产业务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针对这种态势，9月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强调在搞好文化革命的同时，也要保证生产，并要求各业务部门成立一个专抓业务生产的领导班子。

就在社论发表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先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来京串连的红卫兵大会和在中国科学院辩论会上，都强调要好好学习这篇社论。在中科院辩论会上，周恩来指出：我们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又要推动其他的两大革命——生产斗争和科

学实验。这就是今天的《人民日报》社会论所写的《抓革命，促生产》。我们不能看着科学院的尖端科学研究和许多重点实验像现在这样放在一边。凭我的责任来说，我不能继续看着这种情况下去，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使我们最紧急最需要的业务受到影响。

几天后，一份由秘书整理的《要事汇报》放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上面记录了黑龙江双城县人委的情况反映和提出的一些问题：县委和县委书记都被斗跨了，全县21个公社已有11个公社和生产队“炮打了司令部”，公社和大、小队干部大多数被揪斗，不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陷于瘫痪，生产无人负责。目前秋收临近，怎么办？

这样的情况，绝不仅仅是黑龙江存在，全国好些地方都频频告急。

周恩来心急如焚。他立即召集中央碰头会。会上，拟定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进行，学生和红卫兵均不能到县以下各级机关的社、队去串连，县以下各级干部和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秋收秋种，“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县以下各级领导班子有些陷于瘫痪的，应迅速调整干部，加强领导力量，把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

与此同时，鉴于工矿企业也出现了混乱现象，周恩



1966年9月，周恩来接见来北京串连的各界群众和红卫兵代表

来找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人商量，拟定了一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指出：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生产业务工作的正常进行。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和科学研究单位的职工，应当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外出串连，以免影响生产建设 and 科学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工矿企业单位凡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在党委的领导下，迅速成立抓革命和抓生产业务两个班子；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而生产任务又重的，文化大革命可推迟进行。领导班子已瘫痪的企事业单位，应迅速成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

这两个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尽可能将文化大革命的邪火阻于工厂和农村之外，以保证工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的正常进行。周恩来对文件作了最后的审定后，连同反映农村、工矿生产的有关材料送毛泽东阅批。9月14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下发了这两个文件。

为了减少红卫兵大串连对工农业生产领域的冲击，周恩来还抓住一切机会，耐心反复地向广大学生和红卫兵做劝说解释工作，强调生产业务部门与学校不同，不能放假闹革命，要求他们不要去影响工人、农民的正常生产。

9月10日，周恩来对即将去全国串连的首都大专院校的红卫兵说：你们去工厂参观，不要妨碍工人的生产，不能硬闯入生产车间。农村，现在正是秋收、秋耕、秋种季节，我们应该积极支持这个“三秋”工作，不要妨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十六条讲了，是文化教育机关和党的领导机关，工厂、农村、服务性行业不能像学校里一样，放假闹革命。你们也不要像在学校里一样，强行冲进去，否则，生产秩序就要受影响。

对那一部分即将去上海串连的红卫兵，周恩来告诫他们：上海是一个大城市，那里的生产关系到我国的建设，关系到大小三线建设和国防工业建设。上海担负着很大一部分物资出口业务。还要供应全国需要的东西，生产任务很重。希望你们不应该做的事就不要强加于他们。

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串连的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周恩来、林彪陪同接见。

接见大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强调红卫兵串连不要干扰正常的工农业生产。他指出：“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广大的工人、公社社

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红卫兵和学生“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闹革命。”

然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在会上却发表了另外一种基调的讲话。他非但只字不提生产之事，反而以极富煽动性的口气对红卫兵说：“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狽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显然，对于那些无政府主义思想浓厚的红卫兵小将来说，林彪的讲话更迎合和挑动了他们追求绝对自由、绝对民主的狂热，那些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红卫兵也不难听出林彪与周恩来的讲话是如此的不和谐。中央文革一伙借机在背后指使攻击周恩来的这个讲话是“大毒草”。

对此，周恩来愤然反击。9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指出：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我的这个讲话是经中央研究过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不能丰产不丰收。伊春木材不就减产了吗？东北还有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呢？农村“三秋”到了，不抓秋收怎么行呢？现在运输量因学生串连大大超过了，而货运量却大大减少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影响国家的建设了。工人、农民不能因文化大革命而不搞生产，不能放假搞运动。周恩来还对在场一些各部委负责人说：运动中要有两个不怕，一是要挺身而出，敢于和学生见面；二是遇有违反政策的我们要敢说，要敢于解释党的政策。

**“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我不入地獄谁入地獄”**

10月初，林彪令全军文化革命小组起草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

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看了《紧急指示》的草稿后，认为还不够，又加上“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一条。10月5日，中共中央向全国批发了《紧急指示》。随后，江青一伙在各种场合的讲

话中，别有用心地说《紧急指示》不仅适用于军队单位，而且适用于一切单位。此后，“砸烂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狂潮席卷全国。党政机关及一些生产业务部门的绝大部分领导干部被“炮打”，被揪斗，更多的生产单位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工人也像学生一样，离开生产岗位，四处串连。国民经济形势急剧恶化。

而这时的林彪、江青一伙，经过从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到10月中央工作会议这短短几个月的经营，已经攫取了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企图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以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这张“底牌”也十分清楚了。

周恩来的处境越发艰难了。他自己所发出的“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正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他必须从总体上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一到具体问题上，他又难以表示赞同。另一方面，他还必须面对林彪、江青一伙向他施加的种种压力。中央文革一伙公然污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说“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

但是，周恩来抱定“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决心，紧紧扭住国民经济这个大关，和党内正义力量一起，顽强抗争。

11月9日，上海一些工厂的工人在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操纵下，以上北京“告状”为名，脱离生产岗位，在上海北郊安亭站卧轨拦截列车，制造了使沪宁全线交通中断31小时的安亭事件。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愤慨。他当即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坚决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决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车站的上海工人，义正辞严地指出：“你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

然而，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竟背着中央，置周恩来的电告不顾，与王洪文、陈阿大等“造反派”头头串通一气，公然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并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上海市委。张春桥在与工人座谈时说：“如果工厂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上海的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好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在，可以存在下去。”工人同志的行动“完全是革命的”。中央文

革小组同意了张春桥的处理。

此后，“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迅速向广大工矿和农村的纵深蔓延。

就在安亭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会上，他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中断停滞的重要性，严辞批驳了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愤然指出：“不搞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国家怎么办？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

王力提出：“社论稿是不是请江青同志看一下再定？”

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就这样定稿，送主席批阅后明天立即见报！”

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强调：“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一切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科学研究部门和农村，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坚决遵守、时刻遵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只能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不能离开生产岗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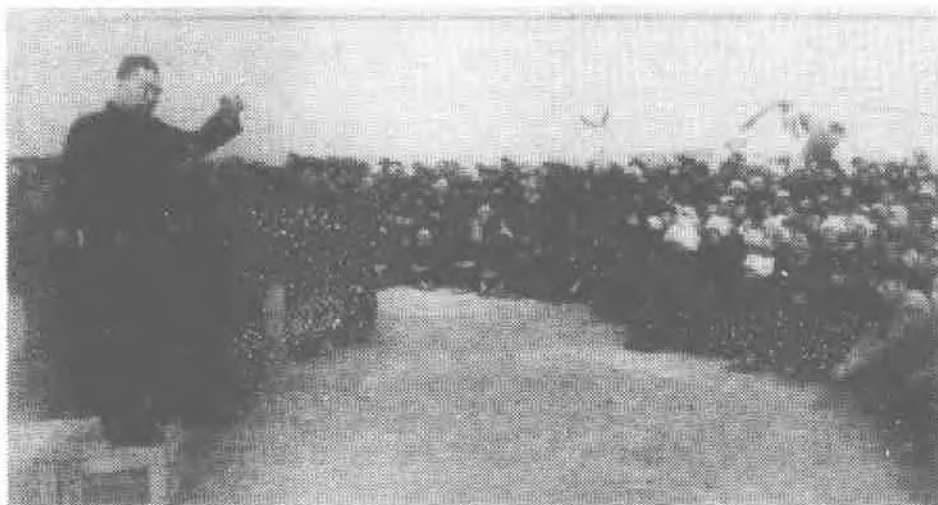
几天后，周恩来又找余秋里、谷牧谈话，要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力求把1967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然而，也就在《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第三天，陈伯达把他代表中央文革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交给了余秋里和谷牧。其中写有“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陈伯达还胁迫余、谷二人在一个星期内提出意见，给他答复。

显然，陈伯达是代表中央文革向周恩来一贯强调的意见示威。

11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谷牧就陈伯达起草的十二条规定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提出近日召开一个全国工交座谈会，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周恩来表示同意，并说：陈伯达的十二条拿到工交座谈会上让大家去讨论。

11月17日，有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等五个部和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哈尔滨等七大城市及各大区主管工业的负责人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会上，各地的负责人反映文化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第二天，周恩来就赶往余震仍在继续的灾区，鼓励灾民自力更生，重建家园。

大革命的冲击已经使工交战线出现了混乱，许多大型企业面临停产的危险。他们对工厂出现群众组织和学生到工厂中串连都表示担心。刘澜波、吕东、吕正操等一些国务院的部长们更是拍案而起，对陈伯达的十二条规定进行了怒斥和否定。

11月19日，周恩来亲临工交座谈会。他指出：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特点，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进行，工人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能擅自脱离工作岗位，不能搞跨地区串连。他还告诫大家：现在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大家要抱定这种精神，挺身而出，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主持会议的谷牧组织人对陈伯达的十二条作了修改，拟出了一个《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称《十五条》）。其中明确规定：工厂不能停产闹革命，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

对此，陈伯达大为恼火，他把余秋里、谷牧叫到他的住处，怒气冲冲地要余、谷二人读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文字：“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而后，又大发牢骚：“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

余秋里、谷牧从陈伯达处出来后，立即到西花厅把陈伯达的指责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说：“没有这么严重。”

次日，周恩来又与李富春一起到毛泽东处，把这次工交座谈会及《十五条》的情况作了汇报。毛泽东基本同意了《十五条》，并要谷牧带一个班子到上海、

天津、沈阳，听取工人的意见，对《十五条》作进一步修改。

会议桌上的较量

工交座谈会实际上是党内正义力量向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搞乱全国经济的邪恶势力发起的一个反冲锋。

这个反冲锋很快招致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非难和攻击。12月4日至6日，一向不关心过问生产的林彪却一反常态，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是要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报。

会议一开始，谷牧按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的《汇报提纲》，介绍工交座谈会和《十五条》的情况。还未等谷牧讲完，中央文革一伙就迫不及待地发难，大叫：“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张春桥站起来用手指着谷牧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

陈伯达也气势汹汹地指着谷牧说：“《汇报提纲》没有同我们商量，发这个提纲是搞突然袭击。”

很显然，张春桥、陈伯达对谷牧的训斥，其矛头是指向在一旁的周恩来的。

这时，一直沉默不言的周恩来严肃地对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搞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

在6日的会上,王力跳了出来,更加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他说:“工交座谈会的这个《汇报提纲》,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过去对学校搞了许多限制规定,现在又拿这一套来对付工人。还有什么‘工业六条’和‘农村五条’(指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还适用不适用?如果这些适用,就走到压制群众运动,压制革命的道路上去。”

为了保护干部,也为了今后的抗争,周恩来采取了暂时“退却”的斗争策略。会上,他作了“掩护”式的发言。他说:“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是极个别的,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交座谈会。会上,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还不理解。”“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进展。”

周恩来此处用“没有想通”是经过一番斟酌的,因为“没有想通”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是正常的。倘若“反对”就是敌我矛盾了。

周恩来对那些受到指责的干部们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大家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包括前面犯过‘错误’的同志,要负起责任来,既不要诚惶诚恐,也不能掉以轻心。”

会议结束时,林彪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说:“这次工交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是大错特错的。”

林彪还针对周恩来一再表明的“欲罢不能,势不可挡”的态度,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进入到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我认为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个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这次政治局会议后,由陈伯达等人搞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工矿、农村与学校、机关一样开展文化大革命,并否定了党委的领导。此后,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全面进入广大工矿和农村。

在这样一种局势下,周恩来对国民经济这一大关非但没有放松,反而抓得更紧了。他继续着以各种方式进行抗争。

镜头一:中央文革小组会上,江青怒气冲冲地指着陶铸说:“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在十月份下文件,叫农村和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

陶铸正色道:“那是中央的决定,我没这个权力”。

江青跳了起来,向周恩来大吵:“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

周恩来反问江青:“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江青气得撒泼而去。

镜头二:12月10日,人民大会堂会议厅。周恩来把被红卫兵揪来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20多位省委书记召集在一起。省委书记反映说:农村层层揪“走资派”,一直揪到生产队长,冬季生产和春耕准备工作无人管。

周恩来严肃地说:“基层干部就是要抓好农业生产,不搞好农业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要制止他们到农村串连。搞乱了农村,农业这个基础就要动摇,国民经济就要遭到破坏。”他对派往各部门的联络员说:“告诉红卫兵,乱揪各省同志到北京,是不对的。各省的领导同志三天内回省,不许阻拦。”

镜头三:碰头会上,周恩来提出:鞍钢乱起来了,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请富春同志去处理一下。”

江青火了:“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分辩道:“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江青大怒:“你一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

周恩来也很激动:“你说的不是事实,除了文化大革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就是文化大革命,也还有具体事务。主席接见一千多万红卫兵,中央文革没住一个,都是各部、北京市、军队安排的嘛!”

……

本文所叙述的仅仅是1966年周恩来为维系国民经济运转而进行的抗争。对周恩来来说,这种抗争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从未停止过。正是由于周恩来的不懈努力,力挽狂澜,我国的国民经济在十年内乱中才没有全面崩溃。至此,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陈云同志的这句评价:

“没有周恩来,‘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作者单位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

(责任编辑 王 炯)



小平同志家乡父老情

● 母小平

在邓小平同志 90 华诞之际，位于四川省广安县城北面 20 里处的小平同志旧居，铁树怒放奇葩，已经连续 9 年开花，令中外客人大饱眼福。

小平同志的故乡在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小村极为普通。小平同志旧居和别的农舍差不多，即是四川人

常见的那种土木结构，白灰抹的墙，木头搭的门，青瓦盖的顶，一排正房略高一点，当中是堂屋，两边偏房各有数间，中间有个坝子。坝子四周有古朴遒劲的铁树，青翠葱郁的芭蕉、塔柏，屋后有茂密的翠竹，一条专为客人参观修建的水泥路直通门前。

在正屋大门的上方，悬挂着一块木匾，上面端端正正写着“邓小平同志旧居”。

室内陈设十分简单。左边偏房有小平同志少年时代睡过的床和一张茶几，右边几间有小平父母睡过的床和一尊石磨等。正房陈列的小平同志的照片有几百幅，这些照片，从少年时代赴法勤工俭学，到红军时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各个时期都有。还有在联合国大会上气宇昂扬的伟人英姿，有外事活动中的神韵风采，还有一张小平同志家五十年代的全家福。这些照片生动地记录了邓小平同志60多年光辉卓越的革命生涯。

在另一间屋子里，挂着一幅充满乡土气息的小平同志画像，像两边有幅对联：“政通人和千家乐，国富民安万户欢”，字画不是出于名家之手，意思却出于民心。在小平旧居的门前挂着四川文人马识途撰写的长联：“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人生杰，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手寿巨擘；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定蕴物华，治水秀山，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道出了家乡人民对小平同志的爱戴之情。

小平旧居在解放后的土改中分给了当地十多户贫苦农民。改革开放后，住在这里的人生活逐渐好起来，盖了新房，才逐渐搬了出去。于是，在这些空房里，才将收集到的小平同志照片和旧物一一陈列起来，专门供人参观。家乡的人民本打算把小平旧居修得象样点，但小平同志一再叮嘱：“照原样，不搞纪念馆”。这样的“原封不动”的农家小院，自1982年以来，已先后接待了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

从陈列的图片中，我们才知道，小平同志的祖籍本不在四川广安，而在江西吉安庐陵。其一世祖邓鹤轩，于明洪武13年（1380年）以兵部外郎的身份进入四川，一直定居广安，距今已有600多年，繁衍约20代。先后诞生过“文行魁星”邓显，吏部尚书晋大学士邓士廉，明万历进士、南京户部主事和湖广按察司副史邓吉昌，清乾隆翰林院士、大理正卿邓时敏等杰出人物。到今天，邓氏家族又诞生了一位震惊中外的伟人——邓小平。

小平同志生于1904年8月22日（农历7月12日），父母按字辈为他取名邓先圣。“先圣”进私塾发蒙时，私塾先生对此名字十分不满：孔子乃称“圣人”，你怎么能“先圣”呢？于是将他名字改为“邓希贤”，这个名字一直用了32年。直到参加革命后，才由“邓希贤”改为邓小平。

小平同志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但其童年和少年时代又十分平常。小平还不满6岁时，就到了协兴乡小

学读书，1915年小平11岁便考入了广安县的高小。1918年小平14岁考入广安县中学。小平自幼资质聪慧，在家里是个受父母疼爱的好儿子，在学校里又是个勤奋用功的好学生。进中学不到9个月，他就被父亲送到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读书。1920年7月，该学校毕业生中，年龄最小的就是邓希贤。当时小平同志还不满16岁。

到小平旧居参观的人，都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有的想感受到伟人的灵气，还有的是想在这里发觉到伟人出生地的神秘。但是，他们除了能看到小平少年时代勤奋读书的史实外，再也找不到非凡之举了。小平同志的卓越才干和伟大气魄，完全与他少年时代的勤奋学习，长期的革命实践、刻苦锻炼是分不开的，是从60多年血与火、生与死的艰苦卓绝斗争中拼搏出来的。可以说：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造就了叱咤风云的一代伟人。

小平同志家乡亲属很少，只有一个少年时与他感情较好的舅舅淡以兴，已于1990年逝世。他舅舅为人忠厚善良，解放时一无所有，解放后一直得到小平同志关照，每月都由卓琳同志给他寄一些生活费，并常常来信告诉他：“不要给当地政府添麻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淡以兴当选为县政协委员。

现在小平同志旧居只剩下淡以兴的儿子、56岁的淡文人。他依靠科学，勤劳致富，种菜、种果树、养猪，如今已修起了新房，面积有200多平方米。据他讲，近几年来，先后有几十位中外记者采访了他，成为远近闻名的新闻人物。

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给小平故乡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小平同志旧居原来的照片看，牌坊村光秃秃的，连树都看不见。而今的牌坊村，绿树成荫，果树成片，村子里也办起了粮食加工厂、水泥预制件厂。他们依靠党的富民政策，发展生产，勤劳致富，全村690户人家，年收入上万元的有200多户。新修的楼房点缀在青山绿水之中，400多户人家添置了电视机，有的还买了汽车、拖拉机和摩托车。他们正按照小平同志指引的目标大踏步前进。

小平同志自16岁离开故乡后，一直未回过老家。家乡的父老乡亲十分想念他。小平同志虽没有回家，但对家乡却十分关心。1986年，小平同志来四川视察时，在百忙中接见了家乡的党政负责同志，并再三叮嘱：“一定要把广安建设好！”让家乡人民以至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这是他老人家终生奋斗的目标。

（责任编辑 焕 然）

邓宝珊与中共高层的 微妙关系

● 孙琴安

邓宝珊将军名瑜，字宝珊，以字行。甘肃天水人，生于1894年。早年加入同盟会，国民军时期即为上将。曾任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第八方面军总司令。1932年后，任国民党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新一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抗战胜利后，又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等职。因其好读书，喜书画，在西北军中素有“儒将”之称。又因其虽为军人，不喜戎装而喜著长袍，故又有“长袍将军”之称。

毛泽东与邓宝珊主动 保持睦邻关系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提出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邓宝珊很赞成，曾为此而奔走。同年10月，毛泽东率红军长征抵达陕北，为了免遭国民党部队进攻，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在11月份，他就给邓宝珊写了一封亲笔信，托汪锋带到西安面交本人。邓宝珊当时正巧不在西安，未能见到。邓后在杜斌丞处得知此事，想亲自来西安面见汪锋，而汪锋此时又返回瓦窑堡，又未遇。故邓宝珊未能见到这封信。

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宝珊部驻军榆林，与陕甘宁边区毗邻。毛泽东闻知后，为防备邓宝珊受蒋介石之命来围剿边区，感到要和这个邻居搞好关系，便不断派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如王震、南汉宸、袁任远、杨明轩等到榆林，与邓宝珊协商解决双方在陕北合作的一些具体问题。在抗战的头两年，延安、榆林之间的邮电来往没有限制，延安发行的《解放日报》以及毛泽东的有些著

作，都寄赠给榆林的国民党部队和机关。邓宝珊既好读书，毛泽东的文章对他的思想、观点也有所影响。他对中共也尽量保持一种睦邻友好的关系。

邓宝珊路过延安， 受到毛泽东的宴请

1938年5月，邓宝珊路过延安，与随行人员住在延安城的骡马大店里，他不想惊动中共领导，悄悄通过。不料有人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立刻给交际处处长金城打了个电话，说：“一定要予邓宝珊一行以热情的欢迎和优待。”

金城得到毛泽东的指示，当晚来到骡马大店，正好碰上邓宝珊的副官于浚都，便说：“邓军长远道而来，我们没有得到通知，有失迎迓。我们边区政府有几个招待所，房子虽然很小，但总比这个骡马大店好一些，我们欢迎邓军长和诸位到招待所休息。”

可是于浚都不去向邓宝珊报告，反自作主张地回绝说：“邓军长明天就要赶路回榆林，现在既然已经在旅店住下了，就不再惊扰贵党和政府了。”

第二天一早，金城又来到骡马大店，正当于浚都还想挡驾时，邓宝珊却出来了，十分和气地对金城说：“这次路过延安，时间仓促，没有打扰边区政府。我们在这里住得很好，就不麻烦你们了。”

金城一见邓宝珊出来说话，立刻说：“听说您来了，我已报告毛主席和边区政府。毛主席和边区政府非常欢迎您，希望您能在延安多逗留几天，和大家见见面。”

邓宝珊见毛泽东如此恳切挽留，就不再推辞了，说：“好吧，我今天不走了。”

金城回去向毛泽东一汇报，毛泽东与肖劲光便于

十二月五日

当天上午来到了骡马大店，与邓宝珊热情握手。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接着，毛泽东便请邓宝珊及其随行人员吃午饭，邓宝珊欣然而往。

金城等在机关合作食堂摆了几桌酒席，李富春、肖劲光、周小舟等人也出席作陪。吃饭时，毛泽东与邓宝珊更是谈笑风生，轻松随便。

“西北军的将领许多是爱国的，有与我党合作和民主革命的传统。”毛泽东夸赞道：“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合作得更好。”

“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邓宝珊也很有信心地说：“毛先生和周恩来先生在双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两党重新和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是深得人心的。从此，总理生前的愿望，有实现的可能了。”

随后，毛泽东又说：“希望邓先生这次能多住几天，到延安各处去参观、指导。”

邓宝珊被毛泽东的恳切挽留引动了心，便欣然地说：“我就改变计划，多住几天了。”

这样，邓宝珊就又住了下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作了回拜。又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还出席了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在延安的中共其他党政军领导人，也曾到他的住处来会面交谈。邓宝珊本想只在延安住一夜，结果在毛泽东的挽留下住了整整一个星期。

邓宝珊第二次路过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

同年冬天，毛泽东听到日军又有可能侵犯西北的消息，感到情况严重，便打算派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到邓宝珊处报告防务，顺便把中共中央六中全会的报告和有关文件带给他看看。与此同时，他还亲自给邓宝珊写了一封信，信云：

宝珊仁兄左右：

近日敌侵西北之消息又有传闻，諒尊处早已得悉。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諒有同情。特囑陈奇涵同志趋谒麾下报告防务，并将敝党六中全会之报告、决议、宣言等件带呈左右，借供参考。倘有指示，概祈告之奇涵。专此。

敬颂

戎绥

弟毛泽东上

毛泽东对邓宝珊写信，可以直言不讳地说要把中共的文件带给他看，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在邓宝珊身边担任总部秘书工作的汤昭武便是中共党员，对邓宝珊的思想行为揣摸得很清楚，并随时报告延安，因此毛泽东这时对他的思想动向还是有个大致的了解的，故写起信来也没有太大的顾虑。

1939年（一说为1938年），邓宝珊北上榆林就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时，途经延安（一说为去西安开会之便），毛泽东闻知后，特邀请他到自己的住处去会晤。当他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只见窑洞里的书架上放有马、恩、列、斯的著作，也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方面的名著，还有陕北各县的县志。这是邓宝珊第二次会见毛泽东。因两人只相差一岁，几乎是同龄人，又都好读书，所以彼此谈得很投机，竟谈了整整一夜。他对毛泽东谈话的印象很深，以为他“讲问题深入浅出，比喻生动，非常幽默，引人入胜”（沈求我：《回忆邓宝珊先生》）。这次谈话，给邓宝珊的影响很大，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

邓宝珊在延安除了会晤了毛泽东，也会晤了中共中央的其他一些领导人。还旁听了毛泽东在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那时张国焘刚借祭黄陵的机会逃离延安不



邓宝珊将军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北平西苑阅兵前，与邓宝珊（左）亲切握手。

久，所以毛泽东开头便说：“我今天向大家讲我们队伍中有一个人开小差的故事……”

大家一听，便哄然大笑，邓宝珊也不禁笑了。

邓宝珊回到榆林以后，曾对他旁边的工作人员说起毛泽东，以为其精通辩证法，对问题看得远，看得深。并常与他们谈论《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中的观点。

过后邓宝珊牙病发作，毛泽东闻讯特派牙医师梁智到榆林为他看病。而邓宝珊知道毛泽东爱吸纸烟，每次有熟人去延安，总要带些好烟给他。

毛、邓互相信托，妥善解决了 几次冲突

大约在1939年或1940年，邓宝珊属下新十一旅中的一个连受人利用和煽动，与当地的八路军发生冲突，被八路军包围缴械。事情发生后，榆林中学校长杨尔琮来到邓宝珊处，说“共产党、八路军这样不讲信义，不给邓先生面子，邓先生要对他们采取强硬态度。……”

邓宝珊听后，也不置可否，就对杨尔琮说：“谢谢你的关心。”

杨尔琮走后，邓宝珊对他的亲信说：“他讲他的，我有我的主意，我已经给毛先生发了电报，请他派汉宸来一趟，商量个解决办法。”

毛泽东接到邓宝珊的电报后，果然派邓宝珊同志朋友南汉宸来到榆林，经过商谈，八路军把俘获的人和枪都还给新十一旅，双方言归于好，事情就此平息。

1940年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派包介山为绥德专员，但包介山上任时，却把前任专员、因反共而逃离的何绍南秘密带到绥德，邓宝珊不让他们进入榆林城，只准在镇川堡住下。包介山、何绍南便捏造事实，企图大造反共舆论，邓宝珊则如实说明了事情的经过。因此，所谓“绥德事件”也就此结束。毛泽东闻知后，又在3月下旬托南汉宸、袁任远给邓宝珊送去了一封亲笔信，双方的友好关系一如既往，没有受这一德事件的影响。

同年冬，国民党当局又开始了新的反共活动。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命令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缩编。此时，毛泽东为使邓宝珊免受蒋介石的影响，马上给他写了封信，托刘绍庭带到榆林，面交邓宝珊，并转达了毛泽东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和要求，希望邓宝珊认清反共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日的阴谋，起而反对分裂，坚持团结抗战。

果然没过多久，胡宗南突然给邓宝珊发来一个电报说：“兄部新十旅李贵清部，经弟整顿充实，改编为暂十五师，由刘志宏师长率领，如兄需要，请即调榆。”

邓宝珊一看，就知道是为了增加兵力来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于是，便复电给胡宗南：“榆林粮秣困难，维持现有部队尚感不足，如再添一师，势难维持，弟意不调。”找个借口回绝了。

总之，在这次反共浪潮中，邓宝珊表面保持沉默，暗中却尽量加以抵制。这一点，毛泽东是很清楚的。

邓宝珊第三次一见毛泽东便 说：“毛先生发福了！”

1943年6月，重庆电召邓宝珊赴重庆开会。蒋介石恐怕他再到延安，特意电令他绕道宁夏。邓宝珊有点不高兴，说：“连我走哪一条路都要过问，真是无聊。”又说：“不指定路线还罢，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

6月8日，邓宝珊离开榆林南下。10日到达绥德，徐向前开了欢迎会，两人分别在会上讲了话。随后，邓宝珊在绥德开明绅士刘绍庭的陪同下，于6月17日到达延安。

毛泽东闻知邓宝珊来了，当天就在杨家岭新建的中共中央大礼堂设宴招待他及其随行人员。陪同在座的有朱德、贺龙、高岗、南汉宸、续范亭、林伯渠、李鼎铭等，共数十人，可谓济济一堂，隆重相待。

当邓宝珊刚一见到毛泽东,就高兴地说:“毛先生发福了!”

“这是由于我们军民扩大生产、丰衣足食的结果。”毛泽东风趣地说。

这次接风洗尘的宴会以后,毛泽东又在交际处一连三个下午为邓宝珊举行宴会,分别由毛泽东、朱德、贺龙三个人作东道主。毛泽东是第三天下午来交际处设宴的。宴会前后,邓宝珊与毛泽东等人围坐在院子里,一边乘凉,一边漫谈。毛泽东出语幽默,谈笑风生,并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他对邓宝珊说:“国际局势处于大变动的前夜,法西斯快将土崩瓦解,日本帝国主义就要走投无路了。”

谈话中邓宝珊问毛泽东:“毛先生贵庚几何?”

毛泽东故意完整地说:“光绪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辰。”

“毛先生比我大一岁。”邓宝珊感慨地说:“中国有毛先生这样一位领导,乃民族之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我们一定要为毛先生祝寿。”

除了漫谈,毛泽东又特地与邓宝珊单独晤谈了数次。邓宝珊还参加了晚会,观看了几次话剧与京剧的演出。他这次在延安约停留了一星期,这才继续南下。临行前,南汉宸还托他在重庆代购一批药品,他答应了。

邓宝珊病倒延安,毛泽东送他十张狐狸皮

邓宝珊这次在重庆主要是奉命述职,两个月内就受到蒋介石的六次接见,其中有几次还是单独接见。然后邓北上到了西安,再由西安北上途经延安。由于他南下时为炎夏,北返时已入秋冬,再加上在重庆、西安时身心兼劳,到延安时突然发起病来了。

毛泽东亲自看望慰问他,并请精通中医的李鼎铭来为他诊脉处方。服了几贴药,邓宝珊的病情已见痊愈。

毛泽东还特意委托边区交际处的金城,把10张最好的狐狸皮作为大衣料,赠送给邓宝珊。他在给金城的信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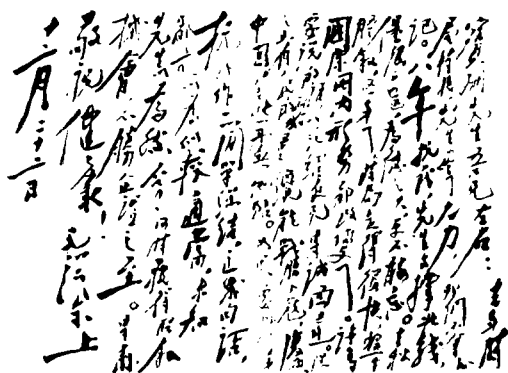
金城同志:

狐皮十件,送邓总司令作衣料,请转交为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六日

那几天,延安正举行生产劳动模范大会,邓宝珊与续范亭以贵宾身份出席,并应邀在会上讲话。邓宝珊在



毛泽东致邓宝珊的信(1944年12月22日)

讲话中一再提高嗓门向大家说:“我是大家的朋友。”

这次在延安,毛泽东又与邓宝珊进行了长谈。在谈到胡宗南最近对边区的进攻时,毛泽东说:“这不过是以卵击石,不过是挑一担鸡蛋招摇叫卖而已。我们只要丢一块石头过去,就可以把它打得粉碎。”

邓宝珊听得不由笑起来了。

他在延安这次停留了20多天,回到榆林以后,他对亲信沈求我说:“在延安,同毛先生长谈,谈得很好。边区正在开荒生产,要做到自给自足,我看能办到。胡宗南想封锁边区,此人志大才疏,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抗战胜利后,邓与共军终于发生磨擦

由于邓宝珊与陕甘宁边区为邻,一直和睦相处,即使在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连连向共军发动挑战的时候,他也以各种方法减少或避免与共军的磨擦。胡宗南对他的消极态度也无可奈何,反共计划屡屡受折。

1944年冬,正巧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刘绍庭将赴榆林,毛泽东特意将自己要说的许多话,请刘绍庭转告邓宝珊,并且托他带了封亲笔信:

宝珊先生吾兄左右:

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兄转达。总之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如果要对八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鄙意以为似较适当,未知先生以为然否?何时获

得晤叙机会，不胜企望之至。专肃，敬祝

健康！

毛泽东 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内战。邓宝珊驻守榆林的部队也曾向共军挑衅。而毛泽东与朱德对他却另眼相看，希望他能举事起义。

1947年春，胡宗南在榆林部队暗插了许多特务，对邓宝珊进行监视和控制，这使他大为不满。这时，续范亭又给他信说：“而朱、毛的对你的期待，亦可谓特殊无二。”同年夏，刘绍庭带来了朱德和续范亭写来的信，面交邓宝珊，要他当机立断举行起义，邓宝珊感到情况复杂，便在复信中表示：“只要有机会，决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

朱德与毛泽东等见邓宝珊还在犹豫，同年8月，西北野战军从战略需要出发，向榆林发动进攻，邓宝珊仓促应战。

8月25日，邓宝珊飞抵北平，就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之职。他在北平住了约一个月，便又离开了。

邓宝珊与中共进行谈判

自从共军占领东北，接着打响平津战役，傅作义便一直在战与和的十字路口徘徊，他虽然曾先派崔载之与李炳泉，后派周北峰与张东荪和共军谈判，均未获得成功。

这时，傅作义的“拜把兄弟”马占山正在北平，他向傅作义建议：“邓宝珊与共产党的历史关系较深，又有威望，如请他来出任和平谈判的代表，将会有利于谈判的进行。”

傅作义听从了他的建议，便派“追云号”飞机去把邓宝珊接到北平。邓宝珊来到北平后，一方面与傅作义、马占山进行秘密的反复商讨，明确面临的形势，分析了傅作义部队和北平其他国民党部队的情况，设想和平起义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和应付方法；另一方面，他又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的一些成员秘密接头。他一到中共地下党的崔月犁等人便说：“我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过，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

接着，他就和崔月犁谈起了国际国内的形势。邓宝珊明确而坦率地说：“蒋介石败局已定，我将全力劝傅作义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那你在榆林的部队怎么办？”崔月犁问。

邓宝珊答道：“北平和平解放，自己起义后，榆林的

问题将迎刃而解。”

1949年1月13日，邓宝珊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在周北峰的陪同之下，来到共军平津前线部队驻地谈判，先后受到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陶铸等人的接待和会见。

毛泽东致电林彪：我们对邓先生完全信赖

当毛泽东知道邓宝珊作为谈判的代表前来时，感到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对手，心里非常高兴。于是，特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发了一份电报：

请告傅方代表，如果傅方决心和平缴械或决心出城改编或决心里应外合协同解决中央军，就应下决心站在我们方面。如果傅方决心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决不会亏待他们。吴化文那样的人我们也没有亏待他。……

你们应向邓、周二及同来的人切实做一番工作，坦白诚恳向他们说明利害。

傅之灵魂是邓宝珊，可向他表示，毛主席知道他出来谈判，表示高兴，并致欢迎之意，榆林方面，接邓八日电，要派人寻见主席的消息，毛主席已知道了，此点你们亦可告他。

林彪等人接了中央军委的电报后，便代表毛泽东向邓宝珊前来谈判表示欢迎，并将毛泽东已知道榆林方面要见他的事情转告了他。邓宝珊心里也很感高兴。

但是，在邓宝珊前来谈判之前，周北峰先来谈判过，由于在一些条款上讨价还价，拖延了时日，谈判陷入一定的尴尬局面，给邓宝珊增加了一定的困难；天津被共军的攻占，更使邓宝珊处于被动的地位，可他又必须完成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

经过整整两天的谈判和多次协商，双方的意见一时仍难以得到统一。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邓宝珊最后向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建议：“把我们双方的意见电请毛主席，由毛主席来核夺。”

毛泽东接到林彪等人的电报，立刻复电称：经邓先生达成的协议是可行的，我们对邓先生完全信赖。

于是，第二天一早，林彪便来对邓宝珊说：“毛主席复电，‘尊重邓先生意见。’”

邓宝珊的脸上立刻泛起了得意的笑容，他对毛泽东的态度表示满意。

就这样，在邓宝珊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

谈判之下，终于促成了傅作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决心，推进了北平解放的日程。

当时，北平《新民晚报》还特意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邓宝珊将军》，热烈赞扬邓宝珊为北平和平解放所作的贡献。

北平和谈成功后，邓宝珊又促成榆林起义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绥远的问题也摆到了毛泽东的面前。为了促成绥远的和平解决，傅作义、邓宝珊主动提出面见毛泽东，共商大计。经毛泽东同意，2月22日傅作义与邓宝珊坐飞机离开北平直达石家庄。

在西柏坡毛泽东接见了傅作义与邓宝珊。毛泽东问邓宝珊：“当年邓先生来延安，我们两次彻夜长谈，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邓宝珊连连点头。

邓宝珊想起过去在榆林时与共军的两次交锋，便问毛泽东：“榆林的那两次仗，是不是可以不打？”

毛泽东说：“第一次打榆林，我们是知道的，目的是牵制胡宗南的部队，配合陈赓部队过黄河。第二次，是彭德怀同志计划的，围城打援，后来因为粮食困难才撤了下来。”

“我总感到不该打榆林。”

“两次围攻，有一次还是该打的。”

也就在这次交谈中，毛泽东更进一步坚定和明确了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绥远方式”。

谈话后邓宝珊立刻给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挂去电话，说：“我在石家庄附近已见到毛先生，毛先生说：绥远、榆林再不打仗了，要部队自行学习，以后再整编。”

第二天，邓宝珊便与傅作义乘飞机回到北平。

同年3月25日，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入北平，还特意邀请傅作义与邓宝珊，在西苑机场参加检阅解放军仪式。

在毛泽东的嘱托下，邓宝珊与傅作义又促成绥远起义

毛泽东来北平，先住香山。一天晚上，他特意就绥远的问题，把傅作义、邓宝珊二人请来一起商量。因为邓宝珊有一部分部队在包头，而主持绥远地区的董其武曾是傅作义的部下。

毛泽东对邓宝珊说：“绥远包头的事，暂时先摆着，叫蒋介石继续给发饷，这很好嘛！”

邓宝珊点点头，表示同意。

接着，毛泽东又问：“你们二位将军，今后打算干什么？”

邓宝珊说：“宜生从小就立志为民众做事，他主政绥远时，在河套地区大兴水利，大办电垦，老百姓很欢迎。”

傅作义补充说：“搞水利可以直接为人民办事。”

毛泽东微笑地点点头：“那你的意思想到水利部工作啦！”

接着，毛泽东又对邓宝珊和傅作义说：“你们带兵多年，有许多老部下，将来绥远问题解决以后，给你们各编一支部队，由你们推荐人带领。”随后，又说：“你们不参加民主党派，那你们两人就自己组织个党吧。”

傅作义说：“我是个军人，不懂党务，搞不来。”

邓宝珊也连忙推辞：“我们不会办党。”



1949年2月，周恩来和前来西柏坡的原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右三）、邓宝珊（右四）及前来商谈国共和平谈判和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的“上海和平代表团”成员顾惠庆（右七）、江庸（右六）等合影

毛泽东笑起来了。

与毛泽东分手以后，邓宝珊又加紧了他与自己的驻守榆林部队的联系，随时了解情况，解决各种问题。最后，在他的促进和中共西北局的争取之下，1949年6月1日，榆林部队宣布起义。

然而，毛泽东希望绥远的问题也能和平解决。但阻力很大，困难重重。8月下旬，毛泽东特意在香山召见了傅作义和邓宝珊，派他们到绥远去为和平起义问题进行工作。

当时，蒋介石也早就注意到了绥远问题，特派徐永昌到绥远活动，企图阻止绥远的和平起义。徐永昌以“称病”为理由，赖在包头不走。邓宝珊见时不宜迟，不能再耽搁了，与傅作义商量后，便以自己的名义请徐永昌吃饭。在吃饭时，便委婉地对徐永昌说：“听说你‘病’了，气候不好，请注意一点。润之、玉阶先生来电，欢迎你去北平。宜生已让其武给你安排治疗，并请你领导绥远起义，起义后我们一起去北平。”

徐永昌是个明白人，第二天便回广州去了。绥远工作由于进展顺利，9月19日，董其武等宣布绥远起义。

9月21日，邓宝珊偕傅作义一起回到北平，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

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

邓宝珊奉毛泽东之命，赴兰州上任

建国以后，邓宝珊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在毛泽东签署发表了任命书以后，又特地约邓宝珊到中海去谈话。毛泽东知道邓宝珊在驻守榆林时曾与西北野战军发生过冲突，所以特地对他说：“西北的工作由彭德怀、习仲勋同志负责，你以后跟他们在工作上关系很密切，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志，容易相处。你没有去之前，是不是先给他们发个电报，有个联系，更好一些，你看怎样？”

邓宝珊没想到毛泽东考虑得这样周到，便说：“主席考虑得很周到，我一定照办。”

毛泽东点点头说：“那好，你把稿子拟好送给我看一看，我替你发。”

回去以后，邓宝珊便叫沈求我起草一份给彭德怀、习仲勋的电报稿，除向他们二位表示问候外，还表示如果可以，希望先到一些地方参观学习，再去甘肃。

第二天电报稿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替邓宝

珊发了出去。仅过了两天，彭德怀和习仲勋就发来了复电，词意恳切，对邓宝珊表示祝贺和欢迎，并同意他去一些地方参观学习。

1950年1月3日，邓宝珊坐飞机去兰州赴任。

邓宝珊每到北京开会，毛泽东总要约见他

以后，邓宝珊每年到北京开会，毛泽东总要在中南海约见他，有时与张治中、傅作义、程潜一起约见。有一次，毛泽东与他长谈到深夜，从中苏关系、高饶事件，一直谈到安徽省的工作，就把他当作一个老朋友一样对待。他从毛泽东的谈话中获得了很多的教益。

1956年，邓宝珊赴北京开人大会议，在一次主席团会议之后，毛泽东邀请他坐上自己的车，一同到中南海丰泽园去吃饭。毛泽东还特地为他准备了面条。

在吃饭时，毛泽东询问了邓宝珊在甘肃工作的情况，问起了邓宝珊的二女儿邓友梅的情况。邓宝珊便把她在抗战期间赴延安学习，后因肺病严重回榆林休养，不久去世的经过告诉了毛泽东。

邓宝珊也就苏共中央二十大会议全面否定斯大林一事，问毛泽东：“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毛泽东说：“斯大林功大于过，应该三七开，全面否定是错误的。”

邓宝珊点点头。毛泽东喝了一口酒，又说：“听说邓先生对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国民党甘肃省教育厅厅长有意见？”

“这个人本来是可杀可不杀的。”邓宝珊坦率地答道。

“既然如此，当时还是不杀为好。”毛泽东说：“希望邓先生今后见到什么，还是不客气地提出来。”

1959年，邓宝珊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但仍留在甘肃，主持省政府的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在“文化大革命”初，邓宝珊也受到当地红卫兵的冲击。周恩来闻知后，立刻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

过了两年——1968年11月，邓宝珊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74岁。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决定为邓宝珊举行隆重的追悼会。这时他已去世11年了。

（责任编辑 王 恂）

祸起萧墙 冤惊海内

——林彪迫害罗瑞卿的阴谋纪实

● 黄 瑤

林彪对罗瑞卿的“迂回包抄”

1965年初，患了晚期肝癌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治疗。春节过后，林彪夫妇也来到上海休养，并常到医院找刘亚楼谈话。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们已无从知晓。但从日后林彪对罗瑞卿的栽脏陷害来看，他实际上是在利用刘亚楼的生命垂危，好在日后给罗瑞卿罗织一些“死无对证”的“罪证”。

后来，罗瑞卿回忆一次同林彪的谈话时，认为，这是林彪对他的最后一次争取，其表现就是利用刘亚楼进行说项，同时又亲自出马“交心”，肯定了比武，肯定了要用罗瑞卿，又说1961年冲罗瑞卿发脾气不过是一场误会，如此等等。对于林彪这番话，罗瑞卿很难表示赞同，因此听完没有表态。显然，罗瑞卿这种表现进一步引起了林彪的忌恨。

1965年4月3日，罗瑞卿应解放军某部邀请，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什么叫突出政治，如何突出政治》的讲话。讲话在对突出政治作了具体解释后指出：“怎样才叫突出政治，如何突出政治，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同志中理解是不一样的。有林彪同志的理解，有我们的理解，还有另外一些同志的理解。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因为对于任何事物、任何一种思想，要正确地认识，全面深刻地理解，需要有一个过程。”后来，在整罗瑞卿时，这个讲话也成为“罪证”之一。

当罗瑞卿仍在外地时，听到总政反映，有许多单位建议将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印成大张，张贴到连队。林彪已同意。罗瑞卿考虑再三，感到这个“指示”第一段提到叶群的名字不妥。因为叶群只不过是林彪办公室的主任，在军内并无重要职务，不宜过分突出。林彪知道后很不高兴，决定不印大张了。罗瑞卿得知这一消息，连忙表示：“那就照原样，不改。”林的答复是：“不改也不印了。”罗瑞卿知道此事又引起了林彪不满。

5月2日，罗瑞卿夫妇和杨成武夫妇到达上海。罗

瑞卿立即到林彪处，林彪让罗瑞卿坐下后，说：“今后要加强通气，这样我才好工作，这是组织原则。”说完后，林彪便打开《毛泽东选集》，念了有关加强请示报告的章节，接着又念了党章上有关组织原则的章节，并提出加强通气的五条规定。林彪的口气比较缓和，但气氛十分森严，罗瑞卿在沙发上如坐针毡。预感到林彪还会用更严厉的手段来对付他。

1965年，《解放军报》社起草了一篇社论，标题是《突出政治就是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罗瑞卿在主持修改这个社论时，指着“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问社论的起草人：“这个提法是不是林副主席的原话，还是你们的记录？以前公开见报没有？”大家回答：“这是林副主席在上海说的原话，报上也用过。”罗瑞卿记不起曾经见过林彪在什么地方讲过这样的话，又很怀疑林彪会有这种绝对化的提法。他感到这个问题牵涉到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提错了或提得跟中央、毛主席的提法不一致，都不好，于是便到另一个房间给当时分管理论工作的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打了一个电话。

康生接到罗瑞卿的电话后，由于不知道“最高最活”出自林彪，同时也由于他尚未开始同林彪勾结，于是表示：如果要这样提，恐怕应问问中央常委，甚至恐怕还要问问主席自己。罗瑞卿问他个人意见如何，康生未正面回答，他认为，还是按中共中央原来的提法稳妥。于是，罗瑞卿便将“最高最活”删去了。

6月29日，在罗瑞卿家讨论总政为再版《毛主席语录》起草的前言。在“前言”中也写上了“最高最活”。罗瑞卿又立即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理论修养很深的田家英，回来后对大家传达田家英的话说：“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不能再发展了吗？”

由于罗瑞卿征求了田家英的意见,“最高最活”的提法又被从“前言”中删去了。罗瑞卿万万没有想到,在后来这便成为他“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而在用这一条整罗瑞卿时,康生保持着深不可测的沉默,田家英已含冤去世。

1965年8月,罗瑞卿到大连去了一趟后,却认为林彪对他还算好。他回到北京后便投入紧张的工作,包括精心修改将以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文章修改好后,罗瑞卿将其分送给中央常委审阅。周恩来对此稿进行了认真审阅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他对原稿中“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提得高高的,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空气搞得浓浓的,把士气鼓得足足的,把团结搞得好好的,把对敌人的仇恨搞得深深的”进行了修改,使文字更加简练、明确。罗瑞卿对周恩来说:“这几句是用的林副主席的原话。”周恩来立即说:“既然是他的原话,那就再改回来。”

正当罗瑞卿在北京字斟句酌地为林彪精心修改文章的时候,林彪对罗瑞卿又采取了新的步骤。为了稳住罗瑞卿,一面由叶群通过打电话对罗瑞卿嘘寒问暖;一面在一些单位设立了联络员,即选择一些人,使他们可以越过各单位党和行政组织等正常渠道,直接同林彪、叶群联系。林彪、叶群通过这一手段加紧了对一些人的

拉拢,经营自己的山头,同时,就整罗瑞卿问题进行个别谈心、交底。而罗瑞卿仍然蒙在鼓里。

10月25日,作战部副部长×××给林彪送去一份材料,前面有一封信,写道:

林副主席:

最近期间,我多次想向你报告一件事,但因事关重大,未找到适当的机会不便轻率。

我觉得罗总长骄横懒散,心怀不测,值得警惕。我这个感觉,是经过六年的观察得出的。六年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962年5月去上海修改“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以前,我对罗总长极为信任和尊敬,认为他是坚决执行主席和你的指示的人,是主席和你最信得过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接班人。

1962年5月到今年7月,从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我对他产生了怀疑,感到他的一些作法不对头,甚至他对你的指示也不是心悦诚服的,特别是你提出要突出政治,他是不赞成的,实际上是带头抵制的,只是采用了两面手法,搞了一些伪装。但这个时期,我对他的本质还看不透,虽有上述怀疑,总是从好的方面去想他……。

直到今年七八月,在参加写《人民战争胜利



罗瑞卿(左)陪同毛泽东视察长江舰(1953年)

万岁》和修改罗总长9月3日的讲演稿时,我才大吃一惊,才发现他是心怀不测的人……。

在林彪、叶群授意下,×××把他自己说成是对罗瑞卿观察了6年,早就并独立发现了罗瑞卿问题的人。

然而,就在10月初,×××写这份材料以前不到1个月,林彪已经发话了:“1960年,罗瑞卿和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便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对我了。”对比林彪所言可以看出,×××总比林彪晚半拍。这只能说明,没有林彪、叶群打招呼,×××也就不会有这样的“发现”。

这一年5月11日已以罗瑞卿署名发了一篇文章,而在9月3日发表了林彪署名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之后,紧接着又于4日全文发表了罗瑞卿在首都庆祝抗战胜利20周年大会上所作题为《人民战胜了日本法西斯,人民也一定能够战胜美帝国主义》的讲话稿。^{2:1},这显然已引起了林彪的不快,然而林彪又不便因此而发作,因为发表文章、讲话都是中央决定的,并非罗瑞卿个人的主张。拿这件事指责罗瑞卿,罗瑞卿只要稍作解释便会不攻自破。就在这个时候,×××送来了这个报告,说由三座门编写组拟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稿的水平高于钓鱼台稿,乃至只要把三座门稿中未用到林彪文章中的下脚料往罗瑞卿的讲稿中一加,便会立刻使罗的讲话水平超过林彪的文章。罗瑞卿所以主张用钓鱼台的稿子,目的就是要把水平高于钓鱼台稿的三座门稿保留起来,据为己有,以便超过林彪。为了阻止罗的“阴谋”,×××便决定“三座门的稿子一个字也不准用到总长的讲演稿中去。”显然,×××这样说并非真的要这么做,而只是向林彪表明一种姿态。

罗瑞卿同毛泽东、林彪的最后一次见面

1965年11月25日,罗瑞卿陪同周恩来到达上海。这时,上海报纸正围绕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展开热烈的争论。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悄悄告诉罗瑞卿,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十分不满。毛泽东说:“他们不登,你们就出小册子。”毛泽东还关照此事对谁也不要讲。陈丕显对罗瑞卿说:“我谁也没有讲,但可以告诉你一下。”于是,罗瑞卿便要来一本刊登姚文元文章的小册子。

11月26日下午,罗瑞卿陪同毛泽东接见了柬埔寨副首相朗诺。这是罗瑞卿在“文革”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在朗诺来到之前,罗瑞卿对毛泽东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已要来了一本,还没有来得及看。毛泽东一笑,未说什么。

接见朗诺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让罗瑞卿也参加。周恩来汇报完后,罗瑞卿提出,准备第二天去苏州看林彪。毛泽东点点头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保养,要保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毛泽东对林彪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周恩来也要求罗瑞卿把他向主席的汇报向林彪报告一下。当罗瑞卿向毛泽东辞行时,毛泽东习惯性地朝他挥了挥手。罗瑞卿没有料到,这就是他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

罗瑞卿一到苏州便向林彪报到。林彪秘书马上回电话说,林总要你马上就来。

罗瑞卿到林彪的住处,一进门秘书就告诉他,林彪还未吃午饭。罗瑞卿点点头,便来到林彪的会客室。林彪见到他照例握手、让座,又拿出糖盒请罗瑞卿吃糖。叶群未露面,而是在附近一间屋子里偷听。罗瑞卿知道林彪尚未吃午饭,谈话中几次声明,明天还可以留一天,再谈一次。林彪要求他一次谈完。罗瑞卿说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嘱咐,汇报了在两广看地形及沿途部队情况,以及北京批判萧向荣的情况。罗瑞卿认为对萧向荣的问题看得过重,林彪未置可否。罗瑞卿在汇报中还谈到最近空军一飞行员驾机投敌的事,并对林彪说:“听说吴法宪为这件事急得满脸大汗。”林彪立即点点头说:“这个人就是责任心强。”林彪接着又说:“就是要突出政治。突出政治就是突出革命。突出革命,他就不去反革命了。”当时林彪自己也决不会料到,不到6年后,他这个革命不离口的人竟然同叶群、林立果等人一道,也乘飞机叛逃了。

罗瑞卿汇报完后,问林彪还有什么指示,林彪说:“没有了,谈完了。”罗瑞卿站起身要走,林彪又问罗瑞卿身体如何,罗瑞卿回答:“还好,只是最近牙经常疼。”林彪说:“牙疼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豆豆几次牙疼,一吃这个就不疼了。”这就是林彪最后一次见罗瑞卿的临别赠言。

叶群杭州之行和上海会议

罗瑞卿以为这次同林彪谈得很好,然而这只是一个错觉。林彪夫妇在给罗瑞卿以平安无事的错觉后便要开始动手了。但总攻击却迟迟未发起,原因是因为林彪尚未准备好,还缺乏过硬的致罗瑞卿于死地的材料。罗瑞卿这次苏州之行促使林彪把发动总攻的时间提

前。他知道罗瑞卿刚陪同了毛泽东接见外宾，他怕夜长梦多，于是，也不管材料是否够用，决定立即发起总攻。

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彪

11月30日

这封信从头到尾一个字没有提到罗瑞卿的“罪行”，甚至连姓名也没有写上，但是，随信附去的11份材料，除1份是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外，全部是揭发罗瑞卿的材料。

11月30日，叶群携带了这一批材料乘由空军司令吴法宪从上海派的飞机秘密赶到杭州，向毛泽东作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由于这一汇报只有毛泽东和叶群两人在场，其内容已无从知晓。

叶群汇报完后，毛泽东收下了她送来的材料，吩咐她不要在杭州停留，立即返回，并派汪东兴乘专列送她回去。

12月2日，毛泽东对林彪11月18日来信，及所

附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进行了批复，大意是：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毛泽东信中所指的“人们”，既包括了罗瑞卿，又不仅仅指罗瑞卿。这说明林彪的状告准了。12月8日，整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召开。

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弄清。第一个问题是林彪夫妇何以敢于告罗瑞卿。林彪那么注意韬晦，难道不怕告不准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第二个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会批准林彪夫妇的告状？后来，到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曾作自我批评说，他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错整了罗瑞卿。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一位政治经验非常丰富的英明领袖。罗瑞卿又是他非常信任也非常熟悉的干部。罗瑞卿对毛泽东可以说是一片赤诚，忠心耿耿。叶群一番话再加上十几份材料为什么就能够使毛泽东改变了他几十年对罗瑞卿的认识？现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有限的材料，对此作一些粗线的分析和推测。

当时，由于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主观主义的“左”的错误日益严重，他和处于中央第一线从事实际工作的刘少奇等人的分歧日益加剧。至于罗瑞卿虽然也在第一线，但由于他在军队工作，不似其他处理政府工作、经济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同志那样同毛泽东有那么多分歧，他仍然绝对信赖毛泽东。对他来说，不存在对毛泽东的指示有任何抵制现象。因此，到了上海会议召开的时候，毛泽东还对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反对我游泳，那也是好意。”

当时，“文化大革命”已拉开序幕。毛泽东由于把阶级斗争扩大化误认为是保卫马列主义纯洁性，把党内正常的争论和分歧误认为是路线斗争，并担心苏联赫鲁晓夫事件在中国重演，因此他对党中央第一线的一些干部已不再信任，认为已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他企图依靠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解决防修反修的问题，



罗瑞卿(右)与“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干部战士在一起(1963年)

并更换接班人。他认为林彪是合适的人选。无论是从发动“文革”角度还是从选定接班人角度看，毛泽东都需要林彪也信任林彪。可是林彪却在这时告了罗瑞卿的恶状，提出了对罗瑞卿的严厉指责，说罗瑞卿伸手要夺权。如果对林彪告状不予认可，那林彪就要承担诬告的罪名，就要反坐。他只有相信林彪的指责，罗瑞卿便被推上了被告席。

上海会议于12月8日在上海召开，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个会议有许多不正常之处：会议开始之前，常委中除毛泽东、林彪外，大都不知会议的内容；会议上最活跃的人物是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叶群，她作了3次共约10小时的发言，内容可能也是她在杭州向毛泽东所告罗瑞卿的“御状”的一部分。现还有记录，摘要如下：

过去（我）对罗是毕恭毕敬，没有想到罗和林的关系搞得这样紧张。以后发现一些问题，不敢轻易上报，一怕看不准，二怕材料不够不过硬，三怕给中央、军委常委出难题，四怕转移工作重点。

叶群这个讲话充满了谎言，但这“四怕”中的第二怕是真话。从林彪送给毛泽东的11份材料看，用以打倒罗瑞卿确实“不够”、“不过硬”，需要叶群在这一讲话中来编造。

叶群在叙述了5月间林彪不让罗瑞卿作总结发言后说：

罗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

罗的个人主义已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把国防部长的位置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

帽子有了，证据呢？叶群在喋喋不休地叙述了林彪对罗瑞卿几次发脾气过程后说：

1964年罗即逼林退位。林从包头回来时，刘亚楼来说：罗曾听主席说，希望林多活20年，因为林有马列主义。林约罗来，罗只待了十几分钟又走了，并说明天即出发去看地形，在林问到主席有何指示时罗才说，主席是说了希望林多活20年，因有点马列主义。

这是借揭发罗瑞卿来抬高林彪。叶群接着说：

国庆节后罗见林，大声说：“病号，不能干扰，应让贤。”出门后又大声喊：“不要挡路”。林气的昏迷过去。我家里的人从走廊上路过，听到了罗讲的这些话。林对我说：“我是让贤的，但国防部长是主席、中央封的，我让贤也得让给真正的贤者。罗凭此就不能让给他。”

叶群这一讲话中最耸人听闻的是下一段：

刘亚楼对我说：“六三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几

点意见，是罗交代的。

四点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看林彪同志要上政治舞台的。

二、你的任务很重，应保护林的身体。

三、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了。

四、放手要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给罗负责。”

我对刘说：“每个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荣誉很高了，无意再进。这是中央决定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谈的问题。”刘说：“你怎么这么迟钝。你如果办到了，林进入政治舞台，不管军队，让罗干，总长不会亏待你的。”我说：“这是对我最大的污辱。”回来路上小孩都说：“刘讲的不对，你答的对。爸爸又没有野心。”回家后林说：“你答的对，今后不准讲这个事，这是违背原则的事。”

一会儿是上台，一会儿又是下台，这反映了叶群当时的心态。既要告罗瑞卿逼林彪下台，又要给林彪上台造舆论，因此说起来便忽上忽下，语无伦次。

2月19日，刘要见林，刘又谈四条。说要团结罗、尊重罗。林说：够放手了。罗没人缘，政治不挂帅，封锁我，对罗要一分为二。林无意中说到罗看人不准，六二年罗要××当总长。刘听后大惊说：“唉呀，原来总长不是我！我上当了，被玩弄了。我是贫农的儿子！……”

这时刘亚楼又对我说：“……我一夜未睡，罗不好，请林警惕，还要多通知几个人：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注意，不要上当。我收回四条。我坦白，四条中后两条是重点，是要林退出军队。”刘哭了，说对不起主席、中央、林彪同志，但又说不要告诉罗瑞卿同志，他有势力，军队、公安系统都在他手里。

叶群的指责性质是十分严重的。然而，这全部是凭空捏造。与会人员大都表示怀疑。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随后说了一句：“难以置信。”邓小平感到叶群讲的最要害的问题是所谓刘亚楼的四条，而刘亚楼已死，是“死无对证”。对林彪向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表示不满意。朱德在参加上海会议后，心情十分沉重。康克清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他摇头不语。有时他又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面就宽了，要涉及到很多人，怎么得了呀！”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显然还需要听听被告说些什么。于是，会议决定把罗瑞卿召到上海。

就在叶群鼓其如簧之舌，对罗瑞卿进行造谣之时，罗瑞卿正风尘仆仆地奔波于边防线上。

又过了一两天，罗瑞卿便听到中央要在上海开会的信息。他打电话问在北京的彭真。彭真也不知道会议

的内容,只听说是庐山会议性质的会,批判对象是谁还不知道。罗瑞卿听后仍然没有想到会是自己。随后,周恩来给罗瑞卿打电话,要他在11号赶到上海开会,内容电话上不好讲。

12月11日,罗瑞卿夫妇乘飞机赴上海。周恩来讲了此次会议的内容,随后便转述了叶群代表林彪在会上对罗瑞卿所作的指责。周恩来也传达了毛泽东所说,“反对林,还没有反对我”的话。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意见,即:一、情节是严重的;二、同彭、黄有区别;三、从长远看,还是有成绩的;四、中央未察觉,也有一定责任;五、党的方针仍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认真地改,仍然准许革命。

听了周恩来、邓小平所传达的内容,对毫无精神准备的罗瑞卿来说,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林彪的指责犹如狂风骤雨,一阵阵无情地抽打着他。他立即起而争辩。由于事情来得突然,而林彪所说的那些材料不是已被歪曲得与事实面目全非,就是彻头彻尾的捏造,罗瑞卿感到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要解释、争辩。他激动地说:“我没有反对林副主席,没有伸手,没有反对突出政治。杀了我的头也不能承认这些。”罗瑞卿要求面见林彪或同林彪通电话,当面说清林彪对他的指责。周恩来立即很严肃地对罗瑞卿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幼稚?”听周恩来这样讲,罗瑞卿稍稍冷静了一点。他开始明白,林彪既然已经提出如此严重的指责,这已经不是可以当面对质能解决问题了。

周恩来看到罗瑞卿不说话了,便劝他冷静,不要激动。他要求罗瑞卿不要到主席那里去,也不要到林彪那里去。他说:“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要告诉我们一声。”他还说:“这次开会为了避免历来开这种会的副作用,采取背靠背的办法,你可以不参加会。”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又找郝治平,也劝她冷静,不要激动,并要求她多劝罗瑞卿,冷静对待。

谈话结束,周恩来、邓小平离去。罗瑞卿送他们上车,等车走远才回屋。罗瑞卿要上楼,守候在楼梯附近的上海公安局副局长王鉴去扶他,罗瑞卿摆摆手,拒绝了。但他自己却怎么也没有力气上楼。此时赶到楼下的郝治平走上前一步,搀扶着罗瑞卿进入二楼的房间。郝治平已猜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只觉得像当头被人打了一闷棍。两人坐下,停了好一会儿,郝治平问罗瑞卿:

“这是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呀?”

罗瑞卿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些问题我向总

理、主席直接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而且林彪知道,谁都知道的……”

罗瑞卿越说越激动,止不住流了泪。郝治平看到罗瑞卿那痛苦的样子,也不禁痛哭起来。

后来,罗瑞卿在狱中痛定思痛时写道:当时,“我实在感到对我很异样。不让我见主席,不让我见林副主席,不让我参加会,不让我外出……我想,对彭、黄,当时在庐山,也没有这样呀!所以怎样也控制不住不自己。”

在这一连串的“不让”之中,罗瑞卿感到最伤感的莫过于不让见毛泽东。

罗瑞卿自从参加革命以来,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而此时“文革”的风暴尚在酝酿之中,罗瑞卿是头一批挨整者之一,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仍属屈指可数,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因此对于失去毛泽东的信任,对于挨整,明显地缺乏承受能力。

叶群伙同吴法宪制造伪证

在上海会议开始“背靠背”揭发罗瑞卿以来,发言的内容大量的是一种会议必不可少的表态。也有些人揭发了罗瑞卿工作作风中的问题,主要是说他揽事太多,锋芒太露,得罪了一些人。对于这些意见,罗瑞卿都接受了。但是,无论是揽事多、露锋芒还是得罪人,都不能置罗瑞卿于死地。因此,叶群抛出了所谓刘亚楼的四条和所谓逼林彪让贤这两枚重磅炸弹。然而,前者是死无对证,后者是无可对证,现在罗瑞卿又不承认。于是,毛泽东决定休会。16日会议结束时,邓小平讲话,连罗瑞卿的名字也未提,说了一句“要继续调查研究搞清楚”则宣布散会。

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同罗瑞卿进行了第二次谈话。他们向罗瑞卿传达了在会议上大家就人际关系、作风、工作、政治、组织等五个方面对罗瑞卿提出的意见,传达了毛泽东的话: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

对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心情,罗瑞卿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夕曾回忆道:

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我即写了报告给主席、中央,请求调离我在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及与军事有关的职务,如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中央很快就批准了。并将批准及我的报告转发全国军队团以上,地方县委、县公安局以上。并将电报抄给了我。

因我不在军队工作了,军委办公厅来人撤了电话机。我还要秘书将我的枪、猎枪和秘书们的枪都交上去。彭真同志专门打了一个电话给秘书,说猎枪可以保留一支给孩子们玩。我说,不要留,全部交。

我曾经要求出去理个发。组织上交待说,不要去,以免碰到熟人。以后,我除了到301医院拔了一颗牙,什么地方我都没有去。

回北京后我住在新六所。孩子们都回来了。可他(她)们还什么都不知道,仍如往常。

看到这一群孩子,尤其是三个小的,想到自己的错误会连累他们,真是万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将自己彻底毁灭掉!

在这五内俱焚的悲愤心情中,罗瑞卿继续就3个问题向中央申诉。在这一年年底,他在给周恩来、邓小平并转报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信中写道:

你们第一次向我宣布的主席、中央对我的看法的第一个五条以及你们第二次归纳群众意见对我批评的第二个五条(关系、作风、工作、政治、组织),我完全拥护并深为感动。我的错误,责任完全由我担负,主席、常委、中央没有任何责任。我一定忠诚老实地对我的错误事实、性质、根源向党作彻底地、毫无保留地交待。一个人如果还要革命,还要跟党、跟毛主席革命到底,犯了错误,除了认识、检讨和坚决改正而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还有另外三条(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封锁反对林副主席)或者四条(加挑拨)我确实没有。我有错误不承认,是没有党性,我有的错误乱承认,也是没有党性。我不能反对有同志对我怀疑,甚至很多同志怀疑,但是没有的事我不能承认,请求中央严格审查。如果证明明确有其事,那算我对党隐瞒,应该算是错上加错,或者罪上加罪。

关于伸手。就我所知道的,这次揭发的是两件材料。一件是说我向林副主席说老病的要让贤。我说过没有?如果说过,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指什么说的,我完全记不得了。不过,可以保证,我决没有暗示,要林副主席让贤之意。我没有这样坏、这样狂妄、这样愚蠢呀!一件是说刘亚楼说了四条,这个我完全不知道。是这次事情后我才听说。

对叶群“揭发”的这两条,罗瑞卿最为愤慨。他写道:“入党三十多

年,大小错误犯过很多,还没有犯过什么伸手的错误。多么重,多么委屈的罪名啊!至于说我气焰很凶,大有逼他之势,这简直不可想象!”

把罗瑞卿“挂起来”,罗瑞卿不满意,林彪、叶群也不满意。林彪、叶群要的是把罗瑞卿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为此,他们需要为所谓刘亚楼的四条制造伪证。谁来干?他们选中了吴法宪。这不仅因为吴法宪当过刘亚楼的政委,而且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也在他管辖之下,制造假证要方便一些。而当时为了取媚于上司,可以不要人格的吴法宪也正是做假证的合适人选。

经过下了两场“毛毛雨”之后,在上海会议召开之前,叶群向吴法宪摊牌,她把脸一抹,很严厉地对吴说:“刘亚楼和你同罗长子的关系都很密切。今后有两条路,是靠林总还是靠罗长子,你可以选择。”吴法宪吓得连忙站起身,连连点头哈腰地说:“我当然靠林副主席,请观后效,请观后效。”

开上海会议时,叶群曾让吴法宪在小组会上发言,然而,吴法宪除了重复罗瑞卿去苏州看林彪是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搞折衷主义;不抓“四个第一”,到处提倡比武,军训搞花架子外,没有什么新鲜玩艺。

上海会议快结束时,叶群又找吴法宪,要他为她所编造的刘亚楼的四条找旁证。叶群要求吴法宪用刘亚楼的夫人翟云英作突破口,逼迫翟云英作证。吴法宪一回北京立即去找翟云英。问她是否听到刘亚楼临死前向叶群谈过四条。翟云英回答从未听说过。吴法宪不得要领而归。过了一会儿又来了,采取了迂回战术,问翟



罗瑞卿(右)与郭兴福(全军曾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交谈(1964年)

云英：“刘司令平时讲话不是喜欢用手势吗？”翟云英回答：“他讲话确实常用手势。”吴法宪又伸出右手，屈起大拇指，伸出他那4个短而粗的手指说：“他不是常这样讲话吗？”翟云英点点头。吴法宪又启发道：“伸出四个手指头？”翟云英摇摇头说：“我没有注意。”吴法宪又不得要领而归。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如此反反复复，一点儿一点儿地磨。最后，吴法宪让翟云英写材料，被拒绝。吴法宪磨了几次无效，便说：“你身体不好，我去请别人写，写好你签一个名就行。”于是吴法宪又去找秘书，请秘书按他的授意写成材料，叫翟云英签名。材料写道：

亚楼同志生病住在上海华北路922号，治病期间，有一次叶群同志、林豆豆同志来看望他的病情。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我看时间很晚了，催亚楼同志吃饭时，亚楼同志说：好！我今天累了（当时，亚楼同志坐在沙发椅上），伸出四个手指头向叶群同志说：“我还有四点，下次再谈。”（这句话重复了三遍）这四点内容是什么，亚楼同志没有跟我说过，我不知道。

翟云英一看，这样写有些穿凿附会，拒绝签字。吴法宪又怏怏而去。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央求翟云英道：“今天是叶主任（指叶群）让我来的，你要是不签字，她会说我没有找你，我就交不了帐。”翟云英不签，吴法宪就磨。已经折腾将近一夜，翟云英被缠不过，再看看那材料并无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便签了一个名。此时，她对上海会议整罗瑞卿一事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吴法宪所提“四点”是怎么回事。

吴法宪于12月21日把由他授意，由他的秘书执笔写成，通过欺诈手段骗得翟云英签名的材料呈送给林彪，但并未得到林彪、叶群的青睐。因为，这份材料空洞洞，起不到给叶群制造的谣言作假证的作用。于是，吴法宪只得给不听招呼的翟云英记上一笔帐，同时亲自出马作假证。12月25日，他打小报告给林彪，全文如下：

林副主席：

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有两个问题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

（一）1964年9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刘亚楼同我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不需要经常向林彪同志请示，也不要到处去请示。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

一看，一旦发生战争要靠他指挥。从刘亚楼同志和我谈的这一段话，可以充分说明罗瑞卿同志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二）今年4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4月23日晚赶至上海，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挥手叫护士走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对不起××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上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僵，说到后来眼圈发红。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以后他又说：“生病以来，中央、毛主席、刘主席、总理、林副主席都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最后他流了眼泪。

以上报告，请指示。

吴法宪

1965年12月25日

谈来编去，仍然是死无对证。1965年4月，罗瑞卿确实给刘亚楼有一封信，我们现在已无从知其内容，但刘亚楼的回信仍在，并已作为11份材料中的一份由叶群呈送给毛主席，在上海会议上印发了。现将刘亚楼的复信抄录如下：

总长：

4月13日来信敬悉。接到首长的指示以后，使我既感动，又难过。感动的是，首长工作那么忙，自己本身身体也不太好，还经常为我的病操心、关怀；难过的是，听有些人向首长反映一些不合乎事实的情况，因而引起首长不放心。

顺便报告首长，我这次害病，得到主席、刘主席、总理、林总、元帅们和首长以及其他同志那样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感动得多少次流下了眼泪，因此，我不能不再一次向首长保证，请首长放心，我决不违背主席、总理、林总、首长以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决不辜负首长的亲切关怀，决不浪费党和国家的大量资财而不安心治病。我相信我还不是一个那样没有党性的人、不识抬举的人。就是病情再严重，我也坚决不灰心丧气。四个月以来，是不是像有些人反映的那样，情绪波动，胡思乱想，不安心治病？究竟听不听医生的话，和医生配合得怎样？首长可以派人到现场检查，以明真相。

希望首长保重身体！

此致

敬礼！

刘亚楼 4月15日

林彪、叶群所以要这一封信作为罗瑞卿的“罪

证”，是因为他们拿不出所谓刘亚楼讲的四条的证据，只好拿这封信充数，用以说明，罗瑞卿的信促使了刘亚楼之死，而罗瑞卿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灭口”。然而，这完全是罗织罪名。现在，我们虽然无从看到罗瑞卿的原信，但从刘亚楼的这封复信可以看出，罗瑞卿写信的目的是希望刘亚楼配合治疗，安心养病，不要灰心。从刘亚楼的复信看，他对罗瑞卿的关怀表示了感激之情。他的情绪是较激动，而这对于一位已患了晚期肝癌的病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信中根本没有所谓受了侮辱的意思。

对此，罗瑞卿在“九·一三事件”后，于狱中所写的揭发林彪的材料中已给予痛斥。他愤慨地写道：

……至于说我四月中旬写给刘的那封信，说得作用那样坏，完全是反革命叶群有意夸大、有意散布的。吴还说：刘接我信后不久就死了，好象刘是因我的信致死的，这完全是恶意攻击和加罪。刘因何致死？这有科学作证。我还是要请问吴，刘为什么不留下一个文字证据呢？刘同我有勾结，有阴谋，又被林彪教育觉悟了，我去“催命”，又那样痛恨我，这当然会更促使他揭发我，为什么还是没有留下揭发的证据？要知道，刘那时还是完全清醒的，写下一个揭发我的证据是完全可能的呀！就算他已经不能写了，为什么不请你吴法宪或者叶群或者×××代写一个，他签一个名呢？就算刘亚楼没有想到这样，你们吹捧的“英明”“伟大”的林彪，为什么也没有想到呢？

从京西会议到“三·一八”

上海会议开过之后，在军队总部机关和军以上干部中发动了一次对罗瑞卿的集中揭发。吴法宪制造伪证说罗瑞卿要夺林彪的权，是这次揭发高潮中的重点和核心。此外，揭发材料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一是说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为了说明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林彪、叶群授意有关部门搞了两份材料。一份是林彪1964年12月《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三稿对照”。另一份是《罗瑞卿的三次讲话摘录》。

“三稿对照”所以不把林彪原来的指示原封不动地作为“第一次稿”，是因为这个指示原文逻辑混乱，语病很多。一点不动，拿不出手。因此对于罗瑞卿提出的修改意见，也仍然保留若干。但是这么一来，“第一次稿”便不成其为原稿，对照云云也成了一篇糊涂帐。

不过，“三稿对照”有一点是对的，罗瑞卿确实对林

彪指示作了修改，其中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有两处。一处是在林彪所说“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后面补充了一句：“当然，这里是指的必要的，也不能乱冲击一气。”另一处是在估价1964年成绩、提出1965年任务时，加了一句“气可鼓，不可泄”。

罗瑞卿同志的三次讲话，共同主题是对林彪的指示“要有全面正确的理解”，也就是将林彪的指示往正确的方面解释，以力图减轻其在部队贯彻时会产生消极作用。罗瑞卿这样做完全是从工作出发，也是为了维护林彪的形象。但摘录的整理者却认为罗瑞卿这三次讲话歪曲了林彪的指示。

“三稿对照”旨在说罗瑞卿“篡改”，“三次讲话摘录”旨在说罗瑞卿“歪曲”。一个“篡改”，一个“歪曲”，总的帽子就是反对突出政治。

在上海会议之后揭发罗瑞卿的高潮中，对罗瑞卿提出的更严厉的指责是说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在上海会议召开之前，由于毛泽东有言在先，罗瑞卿“还没有反对我”，因此，会议没有给罗瑞卿扣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但是已经在说罗瑞卿反对提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了。朱德在会上明确表示，同意罗瑞卿反对顶峰的说法。他也认为对毛泽东思想不能讲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上海会议之后，为了给罗瑞卿扣上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揭发材料提供的罗瑞卿这方面的“罪证”主要是：

一、反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顶峰的”的提法。

二、在为林彪准备七千人大会讲稿时，反对说毛泽东思想中有毛主席个人的天才因素。

三、提倡学习30本书就是为了反对和冲击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

在这3条中，第三条是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第一、第二两条是对林彪的提法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些都是无可非议的，但在那荒诞的年代都成了反对毛主席的“罪证”。

3月4日下午召开的京西宾馆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斗争会。什么“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农奴主”、“定时炸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如此等等大得可怕令人毛骨悚然的帽子，一顶顶往罗瑞卿头上扣，它对罗瑞卿的灵魂的折磨所造成的痛苦有时更甚于遭受皮肉之苦。罗瑞卿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实在忍受不了，头脑快要爆炸似的，比受什么罪都苦啊！所

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

在批斗罗瑞卿的积极分子中,吴法宪占有一个突出的位置。

“九·一三事件”以后,他交代说:

一九六六年三月在小型批判会上批判罗瑞卿同志时,林彪、叶群写给我最恶毒地诬蔑罗瑞卿同志的四条,我记得的大意是:罗瑞卿到上海看刘亚楼的病,罗要刘亚楼去劝林彪:“身体不好,应该退休让别人干,林彪可以养病,把军委的日常工作交给其他军委副主席。”其余我实在回忆不起来,要我和×××两人在会上发言……我还诬蔑罗瑞卿同志说:跑遍全国到处看地形,为了自己将来指挥队伍,等等,这些都写在发言稿上。我和×××发言后,有人认为我们放了一个“原子弹”。

吴法宪这颗“原子弹”一放,罗瑞卿再严酷地责备自己搞比武,反对突出政治,不尊重一些老师、骄傲自满,爱揽事等等,都无济无事了。他3月12日就上述问题作了长篇检讨后,会议上的几个积极分子说,这些都是“小鬼”,他们要求罗瑞卿把篡党篡军这个“大鬼”亮出来。会议要求罗瑞卿重新检讨。

罗瑞卿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以后又听了两三天发言,发言稿都是当场发,牵涉的问题,所举的材料不少,但我手中又无材料,实在听不下去,但又无法申辩。要我作第二次检讨。我感到检讨实在写不出来。我写一个正式报告给七人小组,请求会议发言结束后,停开若干天,给我写检讨的时间。很快就给我一个书面答复,说不行。并说会议一定要在两个礼拜左右结束,要我一边听会,一边准备检讨提纲。晚上在家里还可准备等等。可是,这我那能办到?真是忧心如焚,不知如何是好。

4个月来,罗瑞卿的脊背上已经承受了太大压力,随时都可能倒下。他尽力支撑着。此时,种种屈辱、冤枉统统涌上心头,他有口难辩,感到已陷入无可名状的痛苦深渊,他突然想到了死,想求得永久的解脱。

3月18日上午,郝治平正在室内陪伴他。她手边有一本小说,她想让罗瑞卿转移转移注意力,松松心,

便对他说:“现在有一本小说,我看还不错。”罗瑞卿便说:“你觉得好,你就去看吧,我要一个人坐在这里想一想。”他托词要郝治平拿着书到另一个房间去以后,在一张字条上写道:

治平:

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此时,罗瑞卿尽管受到了林彪致命的精神折磨,但对党、对毛泽东仍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

罗瑞卿写完字条,便到公务员房中取安眠药,尚未将药片从药瓶中倒出,公务员回来看到了,他又把药瓶放回原处。他想,公务员要是反映上去,更不得了。于是又回去。此时郝治平还在看书,他深情地看了她一眼,说了一句“你在这里好好看书吧”,便走进卧室,脱去外衣,换了一身洁净的睡衣,然后轻轻地走上了通往这座三层楼顶层的楼梯。顶楼是储藏室,很少有人来,到处都积满了灰尘,有一扇窗户通往顶楼的平台,他推开小窗,高大的身躯费力地钻了过去……

对于这惨痛的一幕,他的女儿点点在事过21年以后写道:

二十一年前的这一幕,至今使我想起来就热泪盈盈。二十一年前重压在你心头的惨烈的痛苦,至今使我不堪回顾。这是我心灵中一个永远不堪触抚的伤痛。死亡本身就是阴冷的。这种追求死亡的特殊方式更是阴冷可怕和不自然的。自戕,就是骨肉迸裂,就是心灵破碎,就是生命毁灭,就是万念俱灰!在这一点上我不能自欺,更不能欺人。在短短的几年里,有那么多中国人民中的杰出人物都先后走上这条可悲的道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忘记那个毛骨悚然的时代。可悲之处恰恰在于,在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民族都缺乏准备。如果他们(父亲和老舍老生)当年果真有那么冷静的分析的话,他们就绝不会去死。以他们对生的热爱来说,死亡,尤其是自戕,是最残酷的苦刑。

(责任编辑 王 恂)

参与和平解放北平的何思源

●晓鸥



何思源

出路在哪里

公元1948年年末的一个深夜，当零点的钟声在南京城上空“当当”响起的时候，一辆辆美制吉普车、军用卡车刺耳的鸣叫声，仍然在大街小巷此起彼伏，令人胆颤心惊。

临近岁末的南京城，没有一点辞旧迎新的欢乐气氛。主宰它20多个春秋的国民党政府，在辽沈战场的溃败和在淮海、平津战场龟缩的惨状，给这座古城罩上一层厚厚的阴霾。

何思源从北平到南京已经一个半月了。连日来，这位北平市前任市长的心绪，一直被一团莫可名状的烦躁所左右。

与蒋介石决裂，他是决心已定的。1948年7月，震惊全国的北平“七五”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已经被免去市长职务的何思源，在同傅作义的谈话中就含蓄地点出傅作义与蒋介石的关系是“茂盛的枝叶与腐根结在一起”。这次他到南京也爽直地对李宗仁说：“我在北平当市长的20个月，是一步步走向蒋介石的枪口的。”

所以，卸任后一连几道委任状，包括当什么“大使”、“政务委员”等等，他都拒不接受。7月，他听说蒋介石要来北平坐镇指挥，赶忙带着全家5口人躲到青岛。

他不知道自己今后该怎么办，整日彷徨无主，干脆趁儿女们返回北平上学之机，独自南下，在宁、沪、苏、杭等地转了一圈，甚至还去了趟台湾。他摆出一副游山玩水的模样，全部心思实际在调查社会动态。所见所闻，更加深了他的忧思。特别是到南京城内看到他多年效忠的国民党政府，竟然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不堪的局面，“气数已尽啦……”他不无遗憾地哀叹道。甚至连他的老友、国民党政府要员张道藩也劝他“赶紧出国另找出路。”

栖居他国他是不干的，他也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出路只能在国内找。所以，当他回到北平后，欣然允诺了傅作义的建议，到南京李宗仁处，“看看还有什么办法”。他也想在已经当上副总统的所谓“温和派”李宗仁那里找找自己的出路。

1948年年末，蒋桂争斗已达白热化程度。尽管桂系军人施展了不少逼蒋下台的手段，但在蒋桂争斗中，李宗仁显然仍处于下风。何思源感到前途渺茫。他决计返回北平。南京城内的厌战情绪和对中共军队的恐惧心理，特别是李宗仁手下那群人日趋强烈的“求和”呼声，对他影响很大。他领悟到，从这“求和”之中，可不可以为他找到别的什么出路？几天前，他接到太太的电报，询问要不要乘外侨的船从天津港离开华北。何思源即回一电：“留平，勿动。”若不是12月14日中共几十万解放大军突然出现在北平城下，将北平团团围住，17日又占领南苑机场而使飞机无法降落的话，他可能已经坐在北平自己的家中了。

1949年1月9日，何思源在一片冷清的气氛中，秘密登上北上的小型军用运输机，返回北平。行前，他拿着蒋介石元旦“求和声明”，去向李宗仁辞行。在表明了自己决心回北平促进和谈，以配合李宗仁行动的意图后，他十分恳切地说：“德邻公费了很大工夫，花了很多钱才当选副总统。现在能全力把蒋推下台，能全权执政的话，就应当摆脱一切阻碍，当一个民族英雄，千万不能再继蒋介石惨败之后再打下去了。”

此刻，何思源趴在飞机那圆圆的小窗口前，回味着前一天对李宗仁讲的这番话。他不相信李宗仁能有开创新局面的魄力和勇气，对自己能否在北平打开和平局面，能否寻求到新的出路，他也没有什么把握。“不管怎样，我得尽一份力，使北平免遭战火之灾。”他正在思忖，感到座舱里突地一阵震动，紧接着又颠簸了几下。

窗外弥漫起一层浓浓的黄色尘雾。小飞机已降落在天坛南墙外一片黄土地上。

发起“和平运动”

回到北平的当天，何思源立即去见傅作义。

同两个月前离开北平时不同，傅作义的“华北剿总”司令部已由西郊公主坟迁入中南海内。何思源刚跨进居仁堂，等候在那里的傅作义劈头就问：“南京方面的情况怎样？李先生打算如何？”何思源没有马上回答。他接过副官递来的茶碗，目送他退出大厅，然后手扶黑得发亮的檀木椅子，欠欠身，叹了口气，说：“傅先生，我没有照你的意思去见顾孟余。因为从南京的气候来看，找他来搞个什么华北委员会去同共产党合作，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傅作义嗯了一声，没有说话，用手抚了一下稀疏的头发，双手习惯地插在粗布军裤的后裤腰里，在大厅里来回踱步。

何思源看了傅作义一眼，接着说：“蒋李交替看来一时实现不了。李先生的嫡系部队驻扎在芜湖，南京实际仍在蒋先生的控制之下。即使李先生上台也难以维持。”

傅作义“哦”了一声，转过身，注视着何思源，问道：“为什么？”

何思源毫不掩饰地回答说：“李先生倡导的那个‘民主’问题，我看共产党不会接受的，蒋先生又不买他的帐。”讲到这里，何思源心一横，干脆把他对蒋介石、李宗仁以及共产党这三方面的主张敞开评述了一番。他认为李宗仁所提出的主张，包括取消戒严，取消特种刑庭，停止特务活动，释放民主人士，释放张学良等等，都是“徒尚空谈”。他们内以“民主政治”，外凭桂系军人实力，企图利用不利于蒋介石的国内形势，逼蒋交权而已，并不能解决当前华北问题。而蒋介石元旦发表的“求和声明”，同共产党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辞，大相径庭。不用说共产党，就是国民党内部对蒋先生的不满情绪都日趋激烈。而中共提出的大都是政治上的根本问题，如不剥削人民，不压迫人民等等，很得民心……两个月来，何思源在南京前思后想，憋了一肚子话，终于痛快淋漓地一泻而尽。他也不顾及傅作义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了。

看来傅作义内心斗争十分激烈。他不时打断何思源的话，提个具体问题。诸如某某人当时怎么说的，某某人对时局的具体态度怎样。看得出，此刻，傅作义极为关心各方面对国共双方和平前景的估计。

何思源站起身来，恳切地说：“宜生先生（宜生——傅作义之号），北平城外大兵压境，我回来见你，目的不言自明。现在南京四分五裂，已经管不了我们，先生应当机立断，彻底‘换根’，早早和平解决。”

何思源讲这番话也是有缘由的。因为他已听说，一个多月前，傅作义同人民解放军已经有过接触。不过何思源所知也十分有限，从头年的11月上旬，沈阳被人民解放军攻克，东北解放大军即将南下时，傅作义参加南京高级军事会议归来，就派人同解放军首次接触。之后，随着战事发展，傅作义通过他的部下多次与解放军及中共北平地下党接触，探寻出路。就在何思源向傅作义介绍南京之行的前三天，傅作义已第二次派人出城，与人民解放军谈判。在内部，傅作义也利用各种机会同他的兵团、军、师级军官，甚至包括一些蒋系中央军的高级军官，个别交谈，讨论战局的前途，了解他们的想法。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后，傅作义把收集反映的范围扩大到社会各界上层人士。凡接触到傅作义的军内外人士都一致认为，此时，傅作义处在极度矛盾痛苦的心境之中。他不甘心几十年苦心经营起来的军队和地盘，一朝之间化为乌有，又不愿在这强弱相差悬殊的形势下去撞个头破血流，还不情愿让跟了他几十年的部下指责自己为“叛逆”。因此，他的一切行动，仍表现出一副“固守北平”的姿态。

傅作义自然很重视何思源的作用。他清楚何在国民党内部的影响。对北平社会各界的工作，他已暗定由何思源牵头。

当然，何思源并不清楚傅作义的心思。他知道，单靠一己之力是难以说服傅作义的。在决定返回北平时，他已筹划好，不管傅作义怎样做，他是要利用自己在北平的影响发起一个“和平运动”。

1949年1月初的北平市，已成孤城一座。几十万人民解放军象箍桶一样，把北平城紧紧箍住。离城墙外一二里处就有解放军战士警戒。对解放军来说，不是考虑如何攻克北平，而是考虑在攻城中如何减少对这座古老城市的损害。

被围了近一个月的北平城内，垃圾、粪便运不出城，大街小巷脏乱不堪。时任北平市政府社会局一位工作人员曾这样描写道：“由于石景山发电厂和门头沟煤矿已被解放军占领，电源、煤源断绝。冀北电力公司依靠城内发电设备，仅能供给路灯照明和军政机关、自来水公司、广播电台用电，一般市民只能用煤油灯照明。入夜一片黑暗……”

其实，为了让北平市民过好1949年的新年，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控制的石景山发电厂按平日晚间需

要的4万基罗瓦特向城内供电，而傅部不顾及人民要求竟拒绝接受。这还不算，还强求居民在家门口挂上红灯，代替照明。一时间，北平城流传起两句民谣：“家家挂红灯，欢迎毛泽东。”

这一次何思源是开诚布公地在各种场合鼓动“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其行动之公开，被当时报界称为“明目张胆”。

寻找共产党

何思源在四处奔走进行“和平运动”的同时，私下里到处寻找中共地下党工作人员。他想，应当把自己的想法和南京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情况报告他们，以求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他估计得不错。这时，单由中共华北局领导的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就有3000多名党员，加上党外围秘密组织“民青”、“民联”等成员，总计8000多人。进入1949年以后，解放军各军区、部队也都分别派出敌工人员潜入北平，对敌军进行策反活动。

何思源的努力没有白费，在他会见傅作义后的第三天，1月12日，一位名叫张均的年轻人在东交民巷南京政府外交部驻北平办事处，约见了何思源。张均是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敌工部一名联络员，半个月前潜入北平，住在其内弟、办事处英语秘书赵宏奎那里。行前，敌工部长康健生明确指示他们的任务有两条：一是防止敌人突围；二是争取北平和平解放。康部长说，你们可以利用各种关系开展活动，最好能设法靠拢敌方的上层人物。

1月10日，张均照例起了个早，先到办事处门前观察来访的人。他忽然看见一个身穿灰大衣，戴金丝眼镜，年约50来岁的瘦削男人匆匆走进办事处主任的房间。他心里砰然一动。站在一旁的内弟“噢”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这时候别人都往南跑，他怎么倒回来了？”内弟告诉他，此人姓何名思源，国民党内的老资格人物，半年前刚被老蒋撤了市长职务，听说去了南京，不知为什么又返回北平。张均让内弟设法打听一下。

当晚，内弟告诉他，原来何思源来找张主任商量他的“和平运动”，想得到张的支持。交谈中，何思源提到他曾找过中共地下党，但未找到。内弟问张均能不能意见他，张均有些犹豫，对何的底细不甚清楚，贸然出面有些不妥。内弟向他介绍了何思源目前对南京的态度及南京向何打黑枪之事。次日，张均让内弟约何思源第二天下午在办事处见面，并讲明自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联络部联络员。

1月12日午后两点半,何思源如约前来,他双手紧紧握住张均的手,热情地说:“找到你们很不容易,我刚从南京回来,想向你们的高级首长介绍南京政府的一些内部情况。”张均回答说,他可以转达。

何思源思索了片刻,点点头,说:“请你尽快转告,现在南京那边和平空气很浓,对南京政府的压力很大。”他简单明瞭地介绍了南京几个方面的实力和政治态度,介绍了傅作义目前的情况,恳切地说:“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在北平搞个‘和平运动’,造成声势,希望得到你们的呼应。”

张均说:“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我们首长也指示要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不过,何先生在奔走和平时,尽量不要过于突出,要注意安全。特别希望何先生能利用自己的身份,做做傅作义将军和他下面人的工作。”

由于是第一次见面,谁都不了解对方的底细,所以谈话时间很短。何思源显然不满足于同中共一位年轻的联络员接触,临别时,他除了要求保持联系外,再次提出希望能见到对方的高级首长。

游说蒋军部队

事实上,在北平城内众多的名人耆绅为着不同的目的、通过不同的途径、兴起不同形式的“和平运动”之前,毗邻天津市已经有4位参议员在8日下午举着一面白旗,走过天津市城区国民党军队防线,徒步向人民解放军阵地走去。由于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蓄意顽抗,天津民间出面的谈判终无结果。1月14日上午10时,解放军向天津市区发起总攻。何思源着急了。他知道天津的枪声一响,北平的解放仅在旦夕之间,他必须尽最大努力,争取北平和平解决。从天津求和谈判的失败他悟出一条教训:必须紧紧抓住军方首脑人物不放,否则一切和平努力均会付诸东流。可是傅作义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何思源至今不托底,他曾找过傅手下的几位心腹军官探听,回答总是:“老总的主意在他心里,他不说谁也不知道。”

何思源想,只有把民间的“求和”气氛搞得浓浓的,才能给军方施加压力,要想取得这种效果,单靠他四处游说,包括利用报纸、广播制造舆论显然不行了,得有个包括社会各界人士的组织出面作用才大。于是,他找到了许惠东。此人是北平市参议会议长,与何思源相交甚密。何思源的“荣誉市民”称号就是他主持下的参议会授予的。何思源知道,在一定程度上,傅作义在借助许惠东对社会各界施加影响。何思源返平后,许惠东已经几次主动与他接触。对“和平运动”,许惠东也比较积

极。

没等何思源开口,许惠东已经笑咪咪地握住他的手,语调亲切地说:“仙槎兄,您如果不来找我,我也会马上去看您的。全市各界将在市参议会召开‘华北各界和平促进会’成立大会,您是本市的‘荣誉市民’,请您作为特邀代表参加。”

许惠东讲的是实话。因为何思源返回北平后短短一周内,由于报纸广播的传播,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和平人士”。在北平的国民党上层人士中,何思源的胆子是够大的了。傅作义指示要许惠东联系绥、察、热、晋、冀及天津等省市的参议会头头,一起开个会商定个办法,傅作义没有讲是什么办法,但在议定特邀的各界名流时,傅作义点名要何思源参加。许惠东当然心领神会,他也认为,何思源影响大,让他出面很合适。

许惠东的邀请正合何思源的本意。他建议,“和平促进会”组成人员的范围要大些,应当把农、工、商、妇、教育等各界都包括进来。许惠东点头说:“所见相同”。

这天下午的会实际上是在一片慌乱之中进行的。天津城内激战未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当天发表,下午就油印成传单传遍北平。毛泽东提出的8项条件,在参加会的国民党上层人士脑袋里还转不过弯来。代表们没议出什么条条,最后以七省市议长的名义向蒋介石发了个电报,“恳请蒋总统贯彻文告初旨,停战言和”,之后就匆匆散会。

何思源、许惠东他们并不知道,就在他们忙忙乱乱地召开“和促会”成立大会的同一时刻,傅作义派出的第三次谈判代表,在通县西面一家农家大院内,正同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当面谈。但是,这时的傅作义仍处于犹豫彷徨之中。

次日下午3时,天津城经过29小时的激战,宣告解放。何思源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吃晚饭。他砰的一下,把手中的饭碗往桌上一放,大声说:“不行,我得去找傅作义,北平城不能毁在他手里!”夫人何宜文,一位善良的法国妇女,早就习惯丈夫这种急匆匆的性情。她转身从衣架上取下灰长大衣,等丈夫拿着公文包出来后,披到他的身上,然后照例用法语叮嘱一句:“小心些,早点回来。”

中南海大门口戒备森严。傅作义亲信部队两个师驻扎在中南海内外,把方圆仅10多平方公里的红墙内戒备得严严实实的。何思源走进居仁堂时,许惠东正在室内左侧正襟危坐。他大衣未脱,面容严肃,语调低沉地在向傅作义讲述什么。傅作义紧皱眉头,双手插在裤腰内,披着大衣,一言不发地在屋中央走来走去。

何思源发现屋里的气氛有些紧张,便轻轻噓了口

气，控制住刚才的激动情绪，在屋门口站住，说道：“傅先生，我来是——”

傅作义抬头看着何思源，略一思索，即快步向前握住何的手说：“仙槎兄，你来得正好，坐下说。”

何思源朝许惠东点点头，大衣也未脱，站在屋中央，面对傅作义一字一句地说道：“天津被攻下来了，速度之快，大出人们的意料之外，说明国民党的军队不愿打仗了。如果再强迫军队作毫无希望的抵抗，怕是很危险的。请傅先生考虑，迅速采取行动。”讲到最后，何思源又激动起来，不知不觉地把语调升高了。

许惠东忙站起来，满脸带笑地说：“仙槎老兄，别急嘛，傅先生找我正谈这事呢。”傅作义接过话简单明瞭地说：“你的意思我明白。我们刚商定明天召集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讨论北平问题。请你以市民代表的名义，由惠东陪同，明早先到各军走走，比如石觉、李文、黄翔以及二〇五师青年军、装甲兵团、宪兵团等等，征询他们的意见。”

傅作义转头对站在一旁的许惠东叮嘱说：“通知七省市的议长参加中午的聚餐座谈会，刘瑶章市长也出席。商妥办法后，推派代表出城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正式表示。总部郭宗汾副总司令、安春山军长、李参谋长等，我分别派人通知。”

傅作义请何思源“到各军走走”，所提出的都是蒋介石在北平的嫡系部队。傅作义对他们的底细不甚清楚。让何思源到这些部队里去游说，显然是利用这根“针”，去挑挑那些中央军老总的神经，试探他们会有什么反应，以利傅作义最后决策。特别是何思源曾经有CC系的身份，这种人物的游说更具有说服力。

因身负重任而处于兴奋之中的何思源与许惠东并肩相携，乘傅作义派来的专车，精神抖擞地环城周游。他慷慨陈辞：“都是中国人，要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要顾念200万北平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千年文化古迹”，“军人之职责并非以一战决高低，为百姓利益求和决非怯弱”等等。虽然各军首脑人物接待他的态度冷热不均，不约而同的都众口一词：“对不起”，“不清楚”，“听上面的，没意见”。其实何思源也明白，这些军人肯定心里有数，只是不能说出来罢了。想到这，他干脆以“傅总司令所嘱托”的名义，无所顾忌地敞开鼓动起来。

已经与中共地下组织接头，正准备起义的九十二军军长黄翔，事过多年曾回忆说：“看到何老先生那真诚恳切的样子，当时真想给他照张像留下来。”

下午3时，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的市参议会灰色的小楼前，停满了各色小车，几乎把路堵死。等何思源等人从最后一个军部匆匆赶来时，各界人士已经到齐，

只等许惠东宣布这个特别的座谈会开始了。

傅作义有意把这次军民联谊座谈会搞得规模宏大。大厅里摆了5桌，菜肴十分丰盛，这是在鸿宾楼定做的。除“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的20多名成员外，“华北剿总”所辖的几十名蒋系、傅系将领以上高级军官都奉命前来赴宴。还有一大批记者闻讯赶来，站在大厅周围，使本来就不大的会议厅显得更小了。

许惠东致了一段简短的开场白后，几个议长、议会代表先后站起来讲了话。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要求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大概是因为国民党军人在场，发言中要求中共方面停火的呼吁更为强烈。军人们一言不发，有的干脆盯住桌子上的菜点，换着盘子夹，一口口地慢慢咀嚼品尝。

会议首先商定，以“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名义公开致电，“请先行停战并早日协商”。当许惠东提出推派代表赴香山访中共领导人叶剑英时，会场里立刻活跃起来。穿过两军对垒的火线去见对方的首领，这得有点胆量，敢冒风险。有人首先提出何思源，大家一致赞同。何思源坐在左边第二桌，满面堆笑地注视着大家，他注意到在商议群众团体代表和参议会代表时，会场内就叽叽喳喳地热闹起来了。推来推去，结果是几个群众团体推出自己的代表，而参议会的人借口这是民间活动，一个也没参加。最后，会议拟定11名代表组成“和谈代表团”，何思源被推选为代表团团长兼首席发言人，决定次日（17日）上午9时从市参议会徒步出发，出西直门径直奔香山而去。

“现在请‘和谈代表团’团长何思源先生讲话。”许惠东笑吟吟地边拍着手边向何思源走来。何思源马上站起来，双手下垂，恭恭敬敬地向四周点了点头：“诸位先生，诸位将军——”他话语微顿，发现军人们已经开始在陆陆续续地退出会场。有几个军人临出门时含笑向他点点头。他用手整了整上衣，几步走到大厅中央，敞开嗓门儿说：“诸位的信任思源我深为感谢。就国共蒋、毛二位先生的通电内容和出城和谈的条件，我想讲几点意见。几天前我在南京时看到白崇禧的湖北参议会和河南张轸的通电，都是些陈词滥调，政客故伎。我们不要那样，我们要简单直说，一是要求将北平改为北京。北京人最讨厌叫北平而不称北京，这个要求是最符合民心的；二是要求在北京设中央政府。说句俗话，北京人以前最喜欢自称‘天子脚下之臣’，越靠近中央越好；三是按中共毛泽东主席的八条进行改革。刚才一些先生提出的那些，如干部留用、军队改编等等，那是中央政府应当操心的事，我们不要管。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民意。”

大厅里响起一阵掌声，旋即安静下来。他觉得气氛很好，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准备把自己上午在守城的国民党部队中游说的情况介绍一下。这时，他看见几个熟悉的面孔在记者群中闪过。“又是军统方面派来探听消息的，”他想着，转头看看许惠东，许向他递递眼色，意思是赶紧起草通电。何思源点点头，又觉得意犹未尽，于是胳膊一挥，摆出山东大汉那股子豪爽气派：“北平城必须免致生灵涂炭，这是人心所向，谁也无法阻拦！”

掌声比刚才更热烈了，甚至记者们也把本子往腋下一夹，劈劈啪啪地鼓起掌来。何思源的心情好极了。在草拟通电内容时，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帮着参议，何思源注意到有几个记者模样的人在抄起草好的通电内容，写好一段抄一段，然后匆匆送走。他知道这还是军统那帮人在搞小动作。突然，他想，应当通过张均把这天的事传给中共。于是他对许惠东说，“我先去办点事，晚上七点请七省市市长到我家商量出城谈判的事。”

何思源一天没回家，怕妻子担心，本想回家稍事休息一下，再去张均处，不料一进家门，市警察局局长杨清植和市参议会副议长唐嗣尧紧随其后跟了进来。这两个人属军统特务，何思源当市长时同军统矛盾较深，平素同他们少有来往。

那二位见何思源冷冷淡淡的样儿，讪笑着表示：“何先生奔走和平，为地方造福，照顾不够。”两个人在里外两间屋里转了转。何思源不言不语跟在他们后面，心里直犯嘀咕：“莫非这些军统特务也想找出路？”想到这，他的脸色好看多了，话跟着也多起来，竟把去找张均一事弃之脑后。等到送走这两位“稀客”，再想起要去看张均时，已经快到7点，他只好让他过去的机要秘书李同伟代他跑了一趟。

何思源同七个议长的讨论直到深夜，意见很难统一。这时，秘书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趴在他耳边低声说：“先生，房顶上有动静，好象有人。”何思源腾地站起来说：“我去看看。”转身从抽屉里取出小手枪，举着手电筒，同秘书一起走到院子中间。

时至午夜，刺骨的寒风刮得房周围树木枝杈呜呜作响。何思源举着手电筒上房下的照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回头对秘书低声斥责道：“你看差了吧！”转身走进屋内。几位议长已经穿好大衣，准备告辞。

妻子在家提心吊胆地守候了一天，直到这时才同丈夫说上话。何思源把这一天的经过对妻子简单叙述了一遍，又激动起来，说：“北平快和平解放了，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等着庆祝吧。”他把妻子送进里屋，自己和衣坐在床上，心想“明天上午到香山，一定要见到叶

剑英才好。”

谁也未料到，一直担心出现但又觉得不大可能出现的事件发生了，致使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和谈之行被迫推迟。

“炸死何思源！”

当何思源在南京城里频频活动之时，毛人凤就盯上他了。只因何思源滞留李宗仁副总统私邸而无法下手，毛人凤便命令手下人设法阻止何思源返回北平。然而何思源却秘密地回到北平，而且公然在各种场合鼓吹“和平”，瓦解军心，使蒋介石大为恼怒。他命毛人凤派人到北平除去何思源。毛人凤立即召集主持暗杀业务的军统第二处处长叶翔之、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刘绍复和军统西南站少将站长沈醉，先后研究了两次。据沈醉回忆：“原来准备等何出门时，在他住宅附近用手枪暗杀他，但是考虑到那样做凶手逃走不容易，以后才决定用定时炸弹放在他住宅屋顶，凶手可以从容逃走。”沈醉说：“由于蒋介石特别痛恨一些国民党高级人员背叛他而投向共产党，同时为了防止其他地方也效法北平办法，所以要拿何思源来做一个榜样，好警告别人。”

确定了爆炸方案后，为了保证成功，毛人凤令叶翔之率4人即刻飞往北平。行前毛人凤又电令军统北平站站长王蒲臣协助叶翔之行动，“必须置何思源于死地，以儆效尤”。王蒲臣在征得叶翔之同意后，命令其主任秘书指使军统北平站豢养的有名飞贼段云鹏，并由该站爆破队长亲自率领4个人配合行动。这天下午杨清植等2人突如其来来到何家“慰问”，原来是查看房屋方位，床铺摆放位置，以保证行动成功。

深夜，当何思源与七省市市长们正拟定和谈条件时，军统这一行人潜入了与何宅相邻的韶九胡同12号院，爬上何家房顶。在安置定时炸弹时，竟险些被何家秘书发现。

1月17日凌晨3时——

轰！——一声巨响把何思源震醒。他懵懵懂懂地坐了起来，听到里屋好象有“呜呜”的哭声和呻吟声。他还没弄明白那是什么声响，便迅疾下床，向里屋跑去。大儿子何理路同时也被惊醒，迷迷糊糊地跟在父亲身后……

轰！——又一声巨响，满屋烟尘。何思源感到有东西砸在手臂和小腿上，一阵剧痛，险些倒在地上。身后的儿子已被烟雾裹住。他跌跌撞撞地推开里屋门，听见妻子痛苦的呻吟声。他心头一惊，忙扑了上去，双手使

劲地扒开压在妻子身上的瓦砾碎木……

许惠东很快获知消息。他让儿子驾车赶往何家，把伤员送往邻近的协和医院抢救。经医生检查，何思源一家6口人，一死五伤。还在上中学的小女儿何鲁美当场被炸死。夫人何宜文、大儿子何理路头部中弹，流血不止，正在抢救。其余3人均身负轻伤。

直到手腿缠上纱布躺倒在病床上，何思源才猛然醒悟到，昨晚秘书并没有看差，自己错怪了他，丧失警惕，方遭此大祸。他悔恨不迭。当首先赶来“慰问”的警察局副局长白世维告诉他是“中共攻城打来的炮弹”时，他淡淡一笑。白世维的军统身份何思源是清楚的，他更清楚这帮心狠手辣的军统特务是不会放过他的。

何思源斜靠在病床上，闭上眼睛，只觉得耳朵里仍在嗡嗡作响。凌晨那两声巨响，象一盆凉水浇下，使他从头天的极度兴奋中冷静下来。当他从瓦砾中扶起昏迷不醒的妻子时，竟呆住了。他一直想到蒋介石对他会下毒手，但当这一时刻终于出现时，他又觉得来得这样突然。他很清楚这是蒋介石干的，可万万没想到老蒋竟会这样绝情，连他的妻儿老小都不放过！他眼前恍惚闪过小女儿血淋淋的身躯，“她不会死，她还小，还那么活泼可爱”。妻子被人抬上担架，有人扶着他跟在妻子后面，他看到她满头金黄色的头发上，沾着一块块的血污。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她，这位善良的法国女人为了他，遭受了多大的磨难呀。

他记起了1942年，也是这个时候，日本宪兵在天津把他的妻子和4个儿女作为人质抓起来，威胁他，让他投降。经过25天的周旋，妻儿才获释。那正是数九寒天，母子5人只有一被一褥，吃的是冷饭冷菜。妻子毫不妥协，严辞拒绝日本人要她劝降的要求。

“今天又遭此惨祸……”何思源想，本应自己被蒋暗算，却让妻子“顶替”了，如果两颗炸弹同时爆炸，他何家恐怕就难有人活着了。他怀着深深的负疚之情默默祝愿妻子顽强挺住，早日康复。当听到小女儿鲁美的死讯时，他没有落泪，双眉紧皱，嘴闭得紧紧的，他在想，“要出城去见共产党，已经走到这一步，为了这，家里人死的死，伤的伤，决不能半途而废！”因此当许惠东携和谈代表团成员到医院探望，并征求他的意见时，何思源坚决表示：“一定要参加和谈，就是走不动，抬着我也要出城去参加和谈。”他恳切地说，“和平事业是大事，他个人被炸是小事，不能因小失大，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耽误了大事，我就是为此付出生命也是光荣的。”

于是当场商定，第二天(18日)下午两点，“和谈代表团”出发。

当晚，何思源借助卫生界老同学的关系，秘密转移

到市立北平医院地下室。对外称伤势严重，谢绝一切探视。

同时，他让一直守候在他身边的李同伟去找张均，请张均“以医护人员的身份一起出城”。何思源想，凭张均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身份，可以向对方表示自己与其他代表情况不同，自己不便说的话，可以让张均转达。

“抬着我也要出城参加和谈”

对何思源来说，此行事关重大，在一定意义上，将决定他后半生的生活道路。但他并不认为此番出城能最终决定北平的命运。多年的从政经验告诉他，就国民党方面来讲，北平城和平解决的主动权实际掌握在傅作义一个人手里，他们这些人不过是促使傅作义下决心，或者是为傅作义接受和平制造舆论罢了。尽管如此，何思源还是把全副精力投入“和平运动”之中。

因为，他除了要向共产党表明自己目前的政治态度外，他还急于想知道共产党将对他采取什么态度。

1949年1月19日的《华北日报》，以“北平和局又望实现，促和代表昨日出城”为题，在头版头条这样报道：“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10位代表于18日下午二时许，乘公共汽车从电车公司北厂动身，3时20分经西直门，向西郊开去，向共方呼吁和平，此次出城代表计有……(略)等9人，北平市荣誉市民何思源氏亦扶创参加，何氏受弹伤后，身体并未复员，行走尚有困难，但为了替两百万人民呼吁和平，他忘记了身体的痛苦，毅然决然地始终其事，参加这个有价值的行列。……”在这一行人中，由于有两名代表临时退出，又补选了知名人士，前中国大学代校长吕复，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参加。

报道此事件的众记者忽略了一个细节。搀扶何思源走下小轿车，又一起踏上代表们称之为“和平号”公共汽车的，还有一个中等身材、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手提贴有红十字的药箱，一声不吭地坐在何思源身旁。如果算他在内，除司机外，此行应当是11人。

这位年轻人就是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联络部联络员张均。昨天，李同伟向他表示何思源的要求时，他有些犹豫。他这次是单独行动，没法请示上级。但从与何思源的接触中，他深感这位老先生热情极高，心意至诚，使他无法拒绝对方的要求，他终于答应了。中午见到何思源时，何再次强调请他设法引见中共高级领导叶剑英。

这一天从清晨起，北平市的中外记者倾巢出动，四

处探听代表们出城和谈的动向。北平城内的广播电台不间断地向城外播出即将出城和谈的消息和全部代表的名单。何思源全家被炸的教训使代表们分外小心。他们临时改换集合地点,从各处秘密地向西直门方向聚集。驻守西直门内外的国民党一〇四军和九十四军,已分别接到“给和谈代表放行”的命令。在西直门内,宪兵队要全体代表下车登记。何思源由于手臂负伤,请市总工会代表、31岁的王乔年替他签了名。然后,每个人都戴上打有“铃”字的白色臂章,返身上车。

下午3点25分,“和平号”缓缓驶出西直门城门洞,署有“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字样的两面白旗分别插在车头两边,迎着凛冽的西北风飘扬,很远的地方也能看得清上面的大字。许多人不时从一排排平房的小窗口里探出头来,向他们招手。远处战壕里,国民党士兵枪口向下,倒举步枪,有的枪托上系有一块白毛巾,向他们挥动。一群学生模样的人,跟在他们的车后跑了一段,大声叫着:“和平!和平!”

何思源感动极了。他侧倚在木头靠背上,念叨着“真是人心所向,人心所向哪!”他兴奋起来,转头向吕复大声说:“老兄,到时候你这个大学校长可要多讲几句呀。”吕复笑道:“仙槎兄,你是首席发言人哟!”张均高兴起来,说:“畅所欲言嘛。”何思源点点头。忽然他侧身俯向张均耳边,低声叮嘱道“张同志,小心点,这里面有国民党党部的人。”说完又兴致勃勃地同周围的人聊了起来。

汽车折身向北,沿着动物园西墙外向西颐公路徐徐驶去。公路西侧栽满密密麻麻的木桩,木桩外即是布雷区。车到白石桥,桥面被拆,无法通过,只好掉头向南至车道沟村。这里已是国民党军的前沿阵地。公路上布满铁丝网,铁丝网两边接连好几层路障;路两旁水泥碉堡的枪眼里,探出一根根黑色的枪管。看来,这里的国民党守军也获知他们此行的目的,见汽车来,例行公事地询问几句,便痛痛快快地剪断铁丝网,移开路障,让“和平号”通过。路旁土丘上螺旋形战壕蜿蜒向四周伸展,空气中充斥着紧张的战斗气息。

“嗒嗒嗒!”突然一阵枪声响起,车上的人都愣住了。有人喊:“趴下,趴下!”大家才纷纷滑到车座底下。何思源慌慌张张地侧过身,想躺在椅子上,只听张均在他耳边喊道:“不要紧,是往天上打枪!”便直起了身子。

公路旁跳出两名解放军战士,嘴里喊着:“停车!停车!”司机没听见,加速向前驰去,手持冲锋枪的战士立即向车前地面扫了一梭子,柏油路面扬起一层白烟,车子这才猛刹利住。坐在车门旁的王乔年拉开车门,摇晃着手中的白旗,走下车,不一会儿又转身上车,两名解

放军军人紧随其后,登上车来。王乔年指着何思源说:“这是我们代表团团长何先生。”手持冲锋枪的小战士接口问道:“何先生?是何应钦吗?”何思源忙摇摇手,站起身,解释说“不,不是,我叫何思源。”手持匣子枪的军人向前一步,自我介绍说:“我是人民解放军连长,奉命在这里迎接各位。”

自去年12月14日,人民解放军几十万大军忽然降临北平城下,闪电般解放北平四郊以来,海淀镇解放已经一月有余。何思源一行人徒步走进海淀南街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这时,全镇灯火通明,街道上人来人往,非常热闹。集市上悬挂着一盏盏小电石灯,一片幽幽的灯光下摆着热气腾腾的馒头、烧饼、面糊、燕麦粥,人们或坐或立,吃着,说着,嘻笑着。最吸引代表注意的是肉市上鲜嫩嫩的猪肉特别多,令这些城里人格外眼馋。何思源嗟叹不已,不禁想起城里那一片漆黑,那死气沉沉的景象,想起市民们愁眉苦脸可怜的神情。他嘴里不由自主地念出声来:“真是两重社会两重天哪。”张均在一旁笑着点点头。

尽管解放军招待得很热情,何思源仍然无心认真吃饭。他低声嘱咐张均,赶快向上级反映自己的要求。张均点点头,起身离去。这时,院子里响起一阵脚步声,房门被推开,几位军人走了进来。先前接待他们的那位政治主任指着前面两位笑容满面的军人介绍说:“这是我们纵队政委莫文骅同志,副政委欧阳文同志。”

33年后,莫文骅将军仍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这个代表团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何思源先生左臂上缠着绷带,一问才知是蒋介石的特务机构企图谋杀他,在他的住室中安放了定时炸弹,炸死了他的女儿,炸伤了他本人”,“当晚,我们和11名代表进行了交谈”。灯光下,他们的脸上显出不同的神色:有的焦躁,有的疑虑,有的神情淡漠,莫测高深,“何思源先生开口了,他说:‘现在国共双方,城下对峙,枪炮一响,文化古都顷刻变为灰烬。我们代表北平的各界人民,请双方以大局为重,实行和平解决。’我说:‘保护文化古都,大家都要尽心尽责,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责无旁贷。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已经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我们当然希望和平解放北平,但现在的关键在傅作义将军的态度。’一个代表提出:‘贵军不要逼得太紧了,要给傅作义将军一个思考的时间,给他一条路走。’欧阳文同志当即指出:‘摆在傅作义将军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接受我们的条件,另一条是顽抗到底。不是我们给他一条路走的问题,而是他走哪一条路的问题,人民更不允许他以和谈为名拖延时间,继续与人民顽抗。’代表们又提出一些问题,我们一一作了答复。最后我问‘诸位对毛主席

的八项条件有何意见和看法?’何思源先生当即表示:‘毛先生的意见本人赞同。这次傅将军对惩办战犯的条款还有疑虑,因此,战犯问题是否待成立人民政府之后,由法庭考虑为好。’灯光照耀着代表们一张张激动的脸,因为他们是代表北平各界群众,而不是代表政府的,所以双方只交换了一些解决北平问题的意见,不可能达成任何具体的协议。”

当他们在海淀镇槐树街1号开始会谈时,有些代表在介绍傅作义当年镇守涿州的事迹,称傅作义为“涿州良将”。莫文骅笑道:“此一时彼一时,不要忘记现在北平城外的形势。”还说:“我们可以让出一块地,让他把队伍拉出城来,我们较量一下如何?”可是不知为什么,何思源竟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听任有的代表反复要求解放军“休战10日,双方军队首长直接商谈”,“免去傅作义战犯一条,事情解决才有可能”等等。直到莫文骅站起身说:“请何先生转告傅作义”时,何思源才慌忙站起来表示“一定转告”,还说“本人赞同毛泽东先生的八点意见”,提出“能否允许晋见毛先生或者叶剑英先生”。一位解放军军官说:“毛主席不在这里,叶主任很忙,但可以转达你们的要求”。

因为时已夜深,代表团被邀在海淀镇留宿一夜。

第二天,一位解放军军官很早就来到代表们的住所,他很客气地告诉大家,叶剑英主任因为忙,不能与诸位见面,但他和毛主席都听到了大家的要求。纵队政治部在海淀镇有名的饭馆“海顺居”预订了丰盛的酒宴,为代表团饯行。宴席上,彼此谈笑甚欢。这时,莫文骅容光焕发地赶来送行。何思源双手紧紧握住莫文骅的手,恭恭敬敬地说:“莫将军,贵军的要求我们一定向傅作义将军如实转达,一定敦促他接受毛先生的八项和谈条件,早下决心,完成北平和平解放之重责。也请将军向毛、叶二位先生转达我们的心意。”

上车前,几个解放军战士把几大包宣传品放到车上,还向代表们分发毛泽东主席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以及和谈八项条件的传单。

下午1点半钟,“和平号”从海淀镇出发,一路顺风,45分钟后进入西直门。何思源同其他代表一起,沿途谈笑风生。康同壁对何思源说:“你虽然失去了一位小姐,但你的成就是很大的。和平成功后,200万北平人民会感谢她的。”她建议,给何鲁美小姐授予“和平小姐”的荣誉称号。全车人热烈鼓掌表示赞成。

何思源回到家里,等待着见傅作义。次日,当他打开报纸,看到这样一则报道:“消息灵通人士称:北平和平局已近成熟,可能日内揭晓,大部问题均有原则之决定……又悉,当局对八项问题即将有重要文告发表。”

何思源顿时明白了,在另一个秘密进行的活动中,傅作义与中共已经达成协议,傅作义已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条件,北平和平解放就在即日。对于他,以公开身份呼吁和平,制造社会舆论,促使傅作义放下武器,使北平城免遭战火之灾的任务已经完成,他没有必要再去见傅作义了。

他分析得不错。就在他们出城的那天,傅作义会见了头天傍晚首次进城的解放军代表,平津前线司令部作战处处长苏静。当他们返回在北京饭店聚会时,就在他们正南面数百米处,东交民巷傅作义的联络处内,“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的具体条文已经全部拟就。当晚,傅作义草拟的起义电稿已经送交中共代表手中。

22日,傅作义发表文告,公布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傅系新编骑兵第四师率先开拔出城,接受改编。

31日中午12时30分,人民解放军四十一军从西直门开入城区。

2月3日,北平200万人民举行盛大的入城式,热烈欢迎解放军。

何思源随着倾城出动的人流来到正阳门外。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宏大壮观的场面,第一次感受到如此众多的人民发自肺腑的欢呼声。在浩浩的人海之中,他突然感觉自己竟是那样渺小,那样微不足道。

(责任编辑 徐 孔)





宋希尚

宋希尚 智堵 黄河 大缺口

● 周乃光 尹文欣

1933年中秋之后，一个雨天的傍晚，一位方脸大耳、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人，带着一身雨水，匆匆赶到北平协和医院门口，彬彬有礼地朝人打听：

“请问，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李仪祉先生住在哪一间病室？”

门房领他来到李先生的病室。

李仪祉身染重病，正忧心忡忡地仰卧在病床上叹息，一见这位中年人进来，不由得喜出望外，挣扎着坐起来，连声说：“好好好，宋希尚，可把你盼来了。”

宋希尚问：“老师，你为什么急电召我？”

“我召你是为堵黄河决口的事！”李仪祉告诉宋希尚，不久前，黄河发生本世纪以来最大的洪水，河北境内的石头庄、冯楼一带决口，洪水滔天，受灾地区遍及冀、鲁、豫等5省67个县，黄泛面积达1.1万多平方公里，灾民360万人。当局已严令李仪祉立即组织黄河水灾救济会，专责堵口抢修。

“可是我重病在身，无力前往啊！”李仪祉双眼射出热诚而信任的眼光，望着宋希尚说：“我想委托你去办。”

“什么？”宋希尚吃了一惊，“老师，我怎么能胜任？”

“你不必推托。”李仪祉十分肯定地说，“我经过再三选择，你是最合适的人选。我已经去电给政府，举荐你出任黄河水灾救济总会工程师，回电这一两天就能到。”

宋希尚不再说什么。十八年前，怀着“学得一技之长，以报效国家”的愿望，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因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很受学校主持人、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的赏识。李先生一再教诲学生，要以大禹治水的精神，把祖国的水患变成水利。毕业时，李先生亲笔为他书写了一句赠语：“我奉江河为赠品，君收云雨作回礼”。这话如同金文镌刻在宋希尚的心底。现在，先生把黄河交给了我，这堵口的任务我不承当谁承当？

宋希尚向李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先生，学生听你的吩咐。”

李仪祉的脸上泛起了笑容：“我相信你一定能办好这件事。”说着，紧紧地握住宋希尚的双手，然后郑重其事地交给他一串钥匙，吩咐说：“我手头有关黄河的所有资料交给你了。”

二

黄河岸边，一排新搭的工棚，构造简陋而粗糙。北风呼啸着从木板门的细隙中钻进来，把桌子上的桅杆

灯吹得忽明忽灭。红红的火苗跳动着，照在宋希尚满面愁容的脸上。宋希尚受命后，当即交卸了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工务处处长的工作，赶到黄河缺口。一到任，他就带上工程技术人员，到受灾地段细细察看险情，发现这里险段地带河床松软，如果采用中国历代传统所用的打桩法堵口，等于在沙滩上筑高楼，很难奏效。宋希尚亲自询问过河边的老农，过去堵口也打过桩，可是没用。

宋希尚曾留学美国，并去欧洲的德国、比利时、荷兰、英、法、瑞士6国考察过水利建设。在国外，象这样的堵口工程则要采取平铺层迭法，不但工程量很大，耗资也大，而且技术条件也不具备。宋希尚知道，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只能调集两万多民工，而且大多是以工代赈的灾民。作为堵口工程的总工程师，他必须在这样艰难条件下，尽快找到一个既省费用、又能奏效的方法，赶在明年春汛下来之前，把数里长的大缺口堵上。

夜深了，半轮寒月，高挂中天。工棚里灯火已残，宋希尚依然把头埋在黄河的水文资料里。不远处，黄河的涛声一记一记地拍打着他的心扉，他苦苦地思索着……

想遍了各地的水利设施，宋希尚想起了自己家乡。他的家乡在浙江省嵊县，就是唐代诗人李白所吟咏的“自爱名山入剡中”那地方。秀丽的剡溪如一条彩带，自西向东蜿蜒而来，可是一旦遇上连续暴雨，温驯的剡溪也会破堤毁田，大水涌城。人们为保堤，采用竹片编成的柱形篾笼，装上卵石，放入溪中护住堤坝，以抵御洪水冲击，两岸良田由此得以保住。家乡父老真是勤劳而智慧。想到这里，宋希尚心头豁然一亮，“竹笼装石，来一个平铺层迭，不是等于给河堤筑了一条石砌的长城么？宋希尚赶紧拿起铅笔，作了一番计算。一个直径1米、长6米的竹笼，装满卵石是2.5万斤，10个笼子扎在一起就是25万斤，这样压上10层，至少是250万斤，不但能有效地拦住洪水，还可以压实河堤下松软的河床。这真是个好办法！宋希尚又考虑了一阵。他想到这里是北方，找不到竹子，要到南方去调运，恐怕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干脆用铅丝，简单易行。想到这里，宋希尚喜不自禁，带上试算的草稿，大衣一披就出了工棚。

啪！啪！啪！宋希尚敲开了工程处宿舍的工棚门，把正在酣睡的技师、技术员们一个个从热被窝里叫起来，高兴地对他们说：“立即研讨施工方案！”

听完宋总的说明，大家都认为这个卵石串连沉底法可以就地取材，成本低，速度快，技术要求也不高，便于民工一起动手，真是堵黄河缺口的最佳良策。

宋总堵口有良策，灾区人民有救了！消息传开后，

人们奔走相告。制订好施工计划后，宋希尚又亲自赶到北平协和医院，向李仪祉作了详细报告。李仪祉只说了一句话：“这是中国水利史上的一个创举！”

三

尽管是枯水季，黄河依然翻着滚滚黄涛，掀波逐浪地奔腾而去。石头庄至冯楼一带，两万多名民工沿着河堤一字儿排开，运卵石的运卵石，打铅丝网的打铅丝网，流水作业，分段施工。宋希尚率领工程处技术人员来到工地，废寝忘食，日夜轮班在施工工地作现场指挥。

宋希尚连日连夜泡在工地上，一个月下来，身上掉了10斤肉，眼眶也凹陷进去。妻子给他连写了三封信，他都顾不上回家。李仪祉听说了，让黄河水灾救济会的秘书用车去接宋希尚到北平休养半个月。宋希尚皱起了双眉：这么紧张的时刻，我怎么能离开工地呢？他拜托秘书转告李先生：“谢谢李先生一番好心，请让我堵上黄河缺口再去见他。”他让汽车原路回去。

转眼到了第二年5月，一年一度的黄河春汛到来了。雨织成一张张密匝匝的大水网，把石头庄、冯楼一带投入了大水的世界。

宋希尚一脚高一脚低地行进在泥泞的小道上。8个月来，日夜施工，黄河决口已赶在春汛之前胜利合龙。今年春汛来得急，连日下雨，河水暴涨，宋希尚放心不下，又亲自督促着让人们做好抢险的准备。刚才他听人说，黄河水灾救济会又来人了，一到就上了大堤，宋希尚急急赶来。

民工中多有认识宋希尚的，见总工程师冒雨赶来，以为出了什么事，纷纷围拢来询问，有人还给他端来了开水。宋希尚连忙摆手：“快走！快走！守住岗位，注意观察！”

雨幕中，一个老者在两个年轻人搀扶下，正冒着大雨在新筑的堤坝上吃力地走着。见那熟悉的苍老的身影，宋希尚吃了一惊：怎么，李仪祉先生带病来查看工程了？

宋希尚急忙追上去，向李仪祉先生深深鞠了一躬，说：“先生，这么大的雨，何劳你的大驾，你就放心吧！”李仪祉伸出颤抖的双手，拍着宋希尚的肩头：“放心！放心！我本来就放心，我看过就更放心了！宋希尚，你干得不错，难怪灾区的百姓称你是今世大禹！”

洪峰汹涌而下，黄河咆哮着。但是宋希尚用卵石串连沉底法堵住的决口稳如泰山，纹丝不动！

（责任编辑 赵友慈）



记国家危亡之际的 吴佩孚

● 张树昌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2月，对在华北沦陷时期保持民族气节、不当汉奸的吴佩孚下褒奖令，并实行国葬。蒋介石特派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代表他主祭，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孙连仲与北平市长熊斌陪祭，国民党军政要员，吴佩孚旧日袍泽及各方亲友，不约而至者几千人。由拈花寺起灵，沿途观者如潮，实为光复后北平最隆重的一次大出殡。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后期直系军阀的头子，在中国近代军阀混战时期，他曾显示出杰出的军事才能。1920年直皖战争中，他率领直系军队打败了比直军多一倍的皖系军队，迫使段祺瑞下野。吴佩孚声威大振，国外报刊称吴是“中国当代第一号人物”。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直军又大败奉军，奉军被赶出关外，吴佩孚达到鼎盛时期。此时，他拥兵数十万，虎踞洛阳，野心勃勃，幻想以武力统一中国，真有“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

然而，1923年2月，吴佩孚撕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残酷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受到全

国人民的唾骂。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由于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使直系一败涂地。以后，为了对付国民革命军北伐，吴佩孚又与张作霖握手言欢。但在国共合作的北伐中，两次被打得丢盔卸甲，走投无路，只好归依四川军阀杨森。从此，开始了他的晚年生活。

总结吴佩孚的前半生，这位北洋军阀直系头子，确实是穷兵黩武，祸国殃民，特别是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更是罪不可赦。但其晚年，不愿再参与军阀纷争，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利诱和威胁，决不出卖祖国利益，绝不当傀儡和汉奸。这和国民党政府里出现的“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相比，吴佩孚的晚节又实属可嘉。

**“中国人家里的事，
应该由中国人来管”**

吴佩孚兵败入川，投靠杨森，据说是因为1922年夏四川军阀内战中，杨战败退出四川暂居鄂西，后在吴的支持下再度入川。杨森为报此恩，才迎吴入川的。吴入川后

居白帝城（今四川毕节县），韬光养晦，闭门读书，练字写诗，不问世事。为了对抗亲英美的蒋介石集团，在中国重新挑起军阀混战，日本当局打算扶植吴佩孚东山再起，特派日军驻上海舰队司令、海军少将荒城二郎，日海军驻上海特务机关长秀藤大佐，专程前来访吴，转达日方意旨，愿意帮助山炮500门，机枪200挺，步枪10万支，以及弹药被服，并赠银元100万元。

对日本的企图吴佩孚早已识破，他不愿为日人驱使，婉言拒绝了日人的所谓援助。他说：“我过去有枪何止十万，有钱何止百万，我还是失败了。由此可知天下事的成败利钝，决不在于有多少枪多少钱啊！我们中国人家里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管。日本人的好意，我吴佩孚敬谢不敏了。”使两个日本人非常难堪，只好灰溜溜离去。后来，他怕日本人再来，也为躲避一些失意政客想利用他的威望登门游说和纠缠，就迁到大竹县去了。吴佩孚蛰居四川时，曾自撰一副描画自己的对联：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就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

进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此联言语，吴佩孚确实说到做到了。在旧军阀中，得意时，不纳妾，不积金钱；失败后，不出洋，不进租界。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所以，一直被世人传为佳话。

寓居北京 心系国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由四川迁往北平。车到丰台，少帅张学良亲自到车站迎接，吴见张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日军攻占东北的经过，张学良据实告之。吴闻后大骂张学良：“国仇你不报，家仇你不报，你老子的棺材已经竖起来了。”吴接着又说：“你怕抗日，我帮你抗日，我不是为名为利，我左手拿回东三省，右手交给你。你有仇不报，笑话，笑话！”张学良是在蒋介石“绝对不许抵抗”的命令下放弃东北的。他代人受过，受国

人痛骂，现在又被吴佩孚痛骂一顿，真是有口难辩。从此，再也不敢见吴佩孚的面。只是每月派人给他送些生活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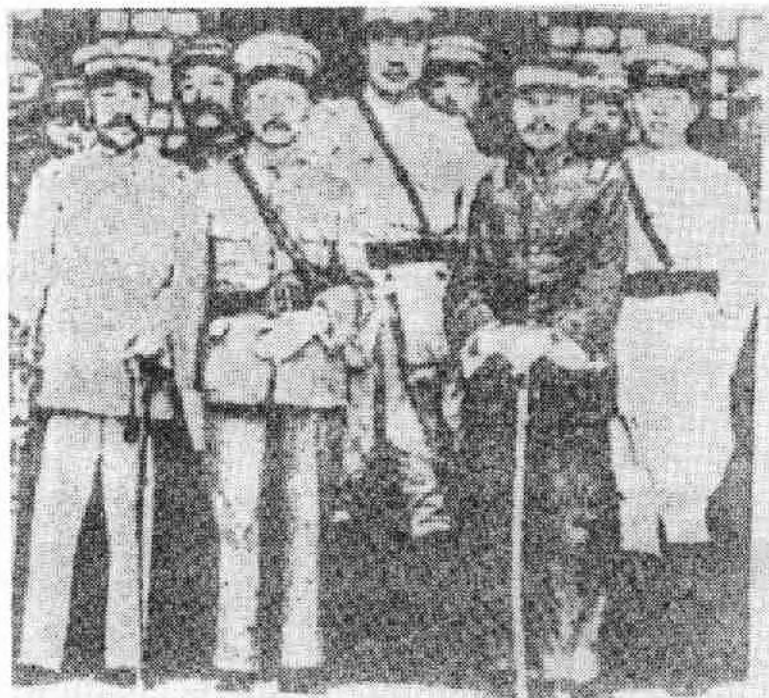
吴佩孚迁居北平后，在东城什锦花园公馆闲居。北平沦陷后，虽身陷虎穴，但仍和在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有书信来往。1938年12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奉蒋介石的命，派吴佩孚的旧部刘涓英潜来北平，并带来孔祥熙的密信一封。刘在吴家潜住8日，二人常常彻夜密谈。刘返重庆时，吴除复信孔祥熙外，又囑刘涓英见蒋介石时，代为面陈三事：一、政府自武汉失守迁渝后，必须修明内政，彻底肃清贪污，以收人心；二、在外交上必须加强，善于运用，英美两国绝对不能坐视日本把中国灭亡，将来攻东京日都者，必为美军矣；三、日本早晚必败，共产党已在华北发展，蒋公对共产党应妥谋善后

之策。

巧斗敌特 不啻汉奸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武装入侵华北的同时，又策动汉奸发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并企图拉吴佩孚“出山”当傀儡，以实现它吞并华北之目的。吴愤然作色道：“自治者，自乱也”当即表示拒绝。“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又请吴佩孚出任北平维持会长，他也严词拒绝。1939年初，日本侵略者决定把伪华北临时政府和伪南京维新政府（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后成立的伪政府，1940年并入以大汉奸汪精卫为首的伪政权）合并为一个全国性的汉奸政权。曾把末代皇帝溥仪推上伪满洲国皇帝宝座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又极力想拉吴佩孚担任这个全国性伪政权的头子。吴虽再三表示拒绝，但日特纠缠不放，并大造谣言，说吴已接任伪职；同时唆使平津浪人，通电拥吴。

为了逼吴佩孚公开表态，1939年1月30日，由日方出面组织了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130名中外记者参加。日方把准备好的讲话稿交给吴佩孚，叫他到时念一念就行了。然而，吴佩孚却有自己的打算，他想既然私下谈话拒绝无效，就只有借记者招待会公开拒绝了。因此，表示同意出席记者招待会。日本特务认为拉吴出山当汉奸的阴谋得逞，暗自高兴。不料，吴佩孚在记者招待会上，并未宣读日本人交给他的讲话稿，而是向日本侵略者提出三个条件：第一，日本军队必须撤出中国；第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第三，日本应以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的交涉对象。并严正指出，如果日方不答应这三个条件，中国就



直奉联合时期吴佩孚（前排右二）与张宗昌、张作霖、张学良（前排右一）等合影

无法实现真正和平，他也无法出山任职。吴佩孚这一招，使在场的一百多名记者为之哗然。人们佩服吴的民族气节，同时也为他的安危捏着一把冷汗。最感难堪的是日本侵略者，吴佩孚的讲话就好像一篇讨倭檄文。土肥原气极败坏，一面通知检查机关扣留中外记者电报；一面将吴佩孚并未念的那个讲话稿由同盟社排发，以欺骗世人。但由于吴佩孚不出任伪职的态度十分坚决，既不为敌人的高官厚禄所诱惑，又不为侵略者的威胁所吓倒，敌人虽排发了讲话稿也无济于事。

吴佩孚巧斗日特、不当汉奸的爱国行为，得到全国人民的称赞。中国共产党对吴佩孚晚年的爱国表现也给予高度评价。晋察冀《抗敌报》1935年2月5日在头版以《吴氏已严词拒绝》为题，详细报导了吴佩孚与记者会面的经过：“香港一日电，沪讯，敌欲诱惑吴佩孚出任伪职，进行甚忙，日前喉使平津浪人通电拥吴，且散布谣言，谓吴已接任伪职，并邀中外记者一百三十人，三十日与吴会见。事先由敌特机关备妥讲话稿，当场发表，不料吴于接见时所议内容与敌方预定原稿完全相反，吴不但未表示接受之意。且提出三项条件，谓非如此，不得真正和平。外国记者感到惊讶，即敌监视人员也为变色，乃急令检查机关扣留外国记者电报，同时，将敌所预拟之谈话稿，由

同盟社排发，以期欺骗。而吴态度甚坚决，任何威胁之话，非所惧也，平津人士闻之甚慰”。

1939年2月，董必武同志在《日本企图搬演新傀儡》一文中，对吴佩孚评价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不出洋，也不居租界……吴的不出洋、不居租界的口号，表现了他不愿依靠外国人讨生活的性情，在他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的事实。第二、吴氏作官多年，统治过几省地盘，带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积蓄，也没有置器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代的那些军阀都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董必武在文中还勉励吴佩孚“自全晚节”。

吴佩孚的爱国行为，使中国人感到快慰，然而，日本侵略者却对其恨之入骨，时刻想置他于死地。1939年冬，吴佩孚牙疾发作，右颊肿痛。12月4日，日本特务川本方太郎介绍日本医生为他开刀拔牙，当天暴卒于什锦花园公馆。吴佩孚以身殉国后，其好友杨云史给他送了一副挽联云：本色是书生，未见太平难瞑目；大名垂宇宙，长留正气在人间。此联可为吴佩孚一生的总结，也是较公正的评价。

（责任编辑 丁 末）

本刊发行部启事

由于新订户不断增加，要求补购旧杂志者越来越多。1991年——1992年底合订本、1993年合订本均已售完，请勿再汇款购买。

欲补购单行本者请注意：1992年底以前的杂志，仅存少量的总第5期、第8期；1993年以来的杂志，总第17期、18期、19期也已售完。欲购我刊尚存书者，请从速。

汇款购书务请将姓名、地址、邮政编码书写清楚，以免误投。

以 民 谣 为 鉴

略记人民公社时期几首民谣

● 尤 淇

中国最早的一部诗集是孔子编写的，名曰《诗经》，距今已有2500年了。它历经时间的磨砺，非但没有褪色，反而光彩愈艳。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诗歌大半来自民间，是流传于人民口头的歌谣，有的歌颂与天斗与地斗的劳动，有的赞美纯正的爱情，有的抨击统治者的荒淫无道，有的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们原来都是既浅显而又明白的带有韵味的口语，能朗朗上口，所以能随风流传。经孔子用文字加以改写以后，便成了形式整齐、文字艰深的诗词，失去了民歌民谣的真色。当然，孔子的功绩也不可抹煞，如果没有他的收集和改写，这些宝贵的歌谣便早已失散。

孔子尊称民歌民谣为“诗”，甚至称它们是诗的魁源——“诗经”。他常对他的众弟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简直把诗歌看作是立言立德的最高手段了。这话可能有点偏颇，但从历史经验看，在特定的情况下，歌谣的作用也确实了不起，是别的任何表达手段所无法取代的。

我国在人民公社时期，许多干部一开口就说“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简直把人民公社捧上了天，一点缺点、问题也没有。

农村情况是不是真是这样呢？

广大农民得不到从正常的民主生活渠道反映真实情况的权利，更无处发表不同的意见，他们便不得不借助民歌民谣的形式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1978年到1980年的3年间，我在安徽农村采访，听到了许多抨击人民公社的歌谣，这是农村真实情况的无顾忌的流露，也是人民出自内心的呼声。我把它整理了一下，作了下列大致的分类：

一、农民对“左”倾急性病的抨击：

说是天堂上得去，说是金桥人能过，说得稻谷满田头，只有画饼不顶饿。

二、农民对多劳少得，分配不公的抨击：

一锄二锄缴公粮，三锄四锄队长管，五锄养老鼠，六锄防灾荒，七锄不入帐，八锄才是我口粮。

还有一首讲社员无财权的民谣：

工分工分，争到天明，能值多少，都说不清；要想用钱，急死老人，不走队长后门，会计不给支领。

三、对“大呼隆”生产的抨击：

一遍哨子（吹起床）不买帐，二遍哨子（准备下田）探头望，三遍哨子（出工）慢慢晃。

也有这样唱的：

一遍哨子不理睬，二遍哨子慢慢来，三遍哨子拖它半天也不碍。

四、对在田间出勤不出力，浪费劳动力的抨击：

男打扑克女打牌，老头尽抽旱烟袋，青年吵架打起来，踏烂庄稼不要赔。

另一首民谣则说：

捆在一起劳动，绑在一起受穷，有事不准请假，会磨洋工的成了英雄。

五、对公社、大队脱产干部太多的抨击：

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干部多了害死人。

另有一首民谣说：

庙多菩萨多，到处忙磕头，一处磕不到，汗水白白流。

六、对农民没有财权因而不爱惜公物的抨击：

死只大牯牛（集体的），不如死只狗（个人的）；丢了拖拉机，不如丢只鸡。

另一首说：

土地是国家的，财产是集体的，哨子是队长的，工分是会计的，只有裤叉是自己的。

七、对生产队分工过细，互不联系的僵硬作法的抨击，同时对包产到户后农民自主生产的赞扬：

专人（队里的专责分工）扶犁梢，庄稼象鸡毛；专人扛大锹，大水没了稻；自家扶犁梢，粮食吃不了，换下烂棉袄，牛肉炒辣椒。

八、对蹲点干部脱离实际的抨击：

点子越多越糟糕，尾巴越割越不掉，贫下中农不依靠，四清越搞帐越毛。

九、对包产到组的抨击，因为要一天到晚忙于算帐：

干部忙得满头汗，社员搞得团团转，分多分少会计说了算，三包一奖太麻烦，钱粮奖励难兑现。

十、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赞扬：

承包合同好，自己作主了，收下就拿到，不怕再平调。

联产承包就是好，一家老小齐操劳，八十大公掌大局，六十爷爷扶犁梢，四十阿爹把粪挑，大小青年工副跑，婆媳下田把水洗，八岁娃娃看青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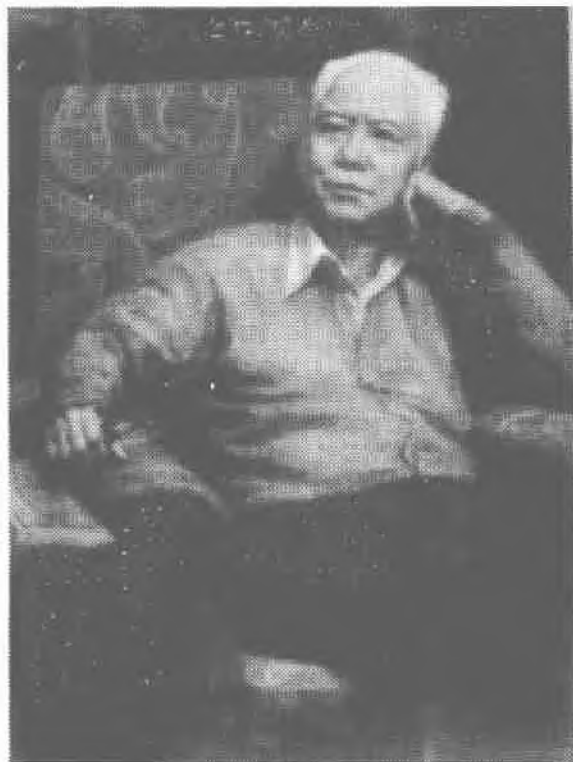
大米小麦样样有，吃喝不用愁，杀了肥猪吃荤油，山芋干了喂牲口。

……

以上几首歌谣只是浩瀚海洋中的一小部分，但已充分说明人民公社制度对我国农业经济的破坏，对农民造成的灾难，这些歌谣是我国那段不堪回首的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文作者是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凌辰）



姚雪垠画像

编者按：著名的老作家姚雪垠同志，在与《光明日报》高级记者陈英茨同志的这次谈话里，对郭沫若同志《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的某些重要史实与论断，提出疑议。并说，他的这些疑议，曾致信郭沫若请教，得到郭的赞同。这些情况，过去未公开发表过。现在发表出来，估计会对“甲申”的研究起到积极作用，也会引起有心人的兴趣。姚雪垠与记者还就李自成的悲剧，谈到了今日我党我国反腐倡廉这个大问题，并对历史学学术领域进一步破除迷信、实事求是的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编者以为这些看法和议论，也是很值得重视和深思的。这篇文章是陈英茨同志在重病卧床期间特意为本刊写的，谨在此一并致谢。

《甲申三百年祭》疑议

——老作家姚雪垠访谈录

● 陈英茨

350年前的那个甲申年，明王朝被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推翻了；然而不久，大顺军也从胜利的高峰急转直下，并很快失败了。50年前，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失败的教训。

为纪念这两个“甲申”，去年学术界、史学界举行了多次座谈并撰写文章，特别是结合当前的反腐倡廉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笔者也请姚雪垠谈了他的《反腐防骄话甲申》一文的思路。

日前，笔者在同姚老谈及这些纪念活动时，姚老意犹未尽，又谈了不少关于“甲申”的问题。他说：从纪

念“甲申”的座谈和文章看，说明我们的党是一个郑重的党，因而敢于正视自己党内发生和存在的问题。只要真正正视了，问题就会逐步得到解决，我们党就有希望，就能永葆青春。

他说，50年前郭文（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下同）发表时，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是毛泽东对郭文十分重视，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让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那时，党还没有腐败这个问题，但因骄傲而招致失败却有过多，因此，毛主席特别强

调了防骄。

另一种反应是国民党，认为郭文是以谈历史影射现实，因而大加攻击和反对。原因很简单，就是当时国民党的腐败与明王朝的腐败有极其相似之处。这从郭文引证的一段崇祯皇帝的《罪己诏》中就可看出：“……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横征；才议缮修，便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献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官厌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对于一个党，一个政权”，姚老又接着说，“能否鉴戒历史的教训，能否接受现实的批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共产党重视汲取历史教训和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胜利了。国民党反之，在大陆就彻底失败了。”然后又补充说，“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国民党连崇祯都不如！”

姚老认为，研究历史，很重要的一点是研究兴亡史。因为，为什么兴，为什么亡，这里的经验教训最多。对于明末和大顺军的历史的研究，姚老感到很遗憾的是，50年来进展甚微，主要还停留在《甲申三百年祭》的水平。郭文虽在政治上起一定积极影响，但作为一篇历史著作，我以为缺陷是不少的。

首先是郭老在写《甲申三百年祭》时，他十分推崇的李岩，经过我多方考察，实际上有没有这个人，还是一个疑问。郭文引《李自成传》：“杞县举人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但李精白不是河南杞县人，而是安徽颍川卫人。据清道光年间修的《阜阳县志》卷十二说，李精白远祖是山东曹固村人，有一个叫李天的，随徐达征元有功，授颍川卫右所小旗，升为总镇。县志是根据“李家氏乘”所记。1958年修的《阜阳县志》也讲：李精白是颍川城内人，称“都堂李家”。颍川的州治就是阜阳县。《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和《山东通志》都有李精白的名字，下边也都注“颍川进士”。

再说李精白的儿子，据史载，李精白确有两个儿子，一名麟孙，一名鹤孙，没有一个叫李信后改名李岩的。鹤孙早死，麟孙后改名栩，不喜读书。崇祯8年，高迎祥率义军攻打颍川卫时，他事先逃往山东，后回来团练地主武装。崇祯15年秋，袁时中驻兵阜阳东北王老人集，请李栩议事，席间把李栩杀了。那末，是不是杞县有个叫李信后改名李岩的举人投了闯王呢？清初

修的《杞县志》中，有一篇《李公子辨》。内称：“《樵史》谓杞县有李公子名岩者，与牛金星同为己卯举人，其父甲科部属也。岩因发廩赈饥，致百姓杀宋知县，劫仓库，奉岩投李自成为谋士。弟牟亦为贼持……然阅时未久，故老尚存，其人其事，影响全无，是不可不辨也。”又说：“谓其为己卯举人，则己卯杞县惟刘诏一人而已。谓其父为甲科部属……况明季杞人未有为部属者也；谓杀宋知县，则宋玫也，崇祯元年自永城调杞，四年行取，仕致工部侍郎……此后县官，并无宋姓。”

杞县的邻县有个睢州，睢州有个叫郑廉的人被李自成的部队掳去数月，他后来搜集资料写了一部《豫变纪略》内称：“如杞县李岩，则并无其人矣。予家距杞县仅百余里，知交甚多，岂无见闻？即不幸而陷贼者，亦未闻贼中有李将军，杞县人。”杞县属于开封府，相距很近，康熙年间修的《开封府志》，也不承认杞县有李信其人。

姚老说，对于这样一个传说的而非历史的人物，郭文却将他作为着力主线人物称赞，说“有了他的入伙，明末农民运动才走上了正规。”又说“在李岩入伙之后，接着便有牛金星、宋献策、刘宗敏、顾君恩的参加，这几位都是闯王部下的要角。从此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便迥然不同了。”实际上，这是作者的臆断，而非历史的真实。刘宗敏是李自成的早年伙伴，崇祯10年冬，才有牛金星、宋献策参加，顾君恩的参加是崇祯16年，李自成破钟祥之后。宋、牛等参加之后，也没有设官分治，建立政权，这是李自成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说他“流寇主义”，即是指此。李自成只是到了崇祯16年，才开始考虑设官分治，但也没有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而匆匆北伐，攻占北京。

李自成自起义以来，历经磨难，有成功，也有失败。在多年的经历中，总结了经验教训，已经接近成熟，他们一大批骨干，也有了很大提高。例如李自成从入河南到破洛阳，一百天左右时间，人马便扩充到二三十万。这样大的队伍，军纪那么好，就是基于起义将士有个很好的觉悟，即便真有李岩其人，也决非李岩个人的功劳。这种捧李岩的说法，实际上是贬低了李自成，也贬低了广大起义军将士，是英雄决定一切的一种历史唯心主义。其实，就从郭文来看，也说“他究竟立过什么军功，打过什么得意的硬仗，史籍上没有记载，”只是说他“对于宣传工作做得特别高妙。”“编口号使小儿歌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就凭这，就起了那么大的作用？不能这么说。

在谈到姚老自己写的《李自成》中，把李岩和红娘子写得那么有声有色，姚老说，历史不容虚构，但小说

允许虚构。至于何以流传出李岩等这个故事，姚老说还没有搞清楚，可能战乱时期，总会有人望风捕影编造故事。例如《白毛女》等，再加以文人渲染，就使得一些人信以为真了。

在抬高李岩的同时，郭文又极力贬低刘宗敏，特别是认为刘宗敏在进京后，其所做所为，对李自成的失败起了极其重大和直接的作用。例如郭文说：“刘非刑拷掠官，而他的追赃也有些不分青红皂白。虽然为整顿军纪——杀人无虚日，而军纪已失掉了平常的秩序。特别是他绑吴襄而追求陈圆圆，拷掠酷甚的章法，实在是太不通政略了。后来失败的大漏洞，也就发生在这儿。”又说：“像吴三桂那样标准的机会主义者，在初对于自成本有归顺之心，只是尚在踌躇观望而已。这差不多是为一般史家所公认的事。假使李岩的谏言被采纳，先给其父子以高爵厚禄，而不是刘宗敏式的敲索绑票，三桂谅不至于‘为红颜’而‘冲冠一怒’，‘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挟降官，搜括脏款，严刑杀人……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也都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实在非同浅鲜。”

姚老说，其实，搜括脏款是大顺军的一贯政策，李自成自崇祯13年冬进入河南以后，即提出“随闯王，不纳粮”和“三年免征”的口号。刘宗敏在京城追赃，是李自成交给他的任务，并且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他追赃所得款项全部作为军费运往西安，刘宗敏没有入自己腰包。

姚老说，郭文中关于刘宗敏为追陈圆圆拷打吴襄，迫使吴三桂降清的说法绝不可信。按李自成在崇祯15年冬破河南汝宁，对提到的明宗室亲王不加杀害；16年破西安，也未杀秦王；17年破太原，不杀晋王；3月进北京，对崇祯的三个儿子即太子永王、定王都予优待。对西安、太原等地的文武官员，更是大力劝降，优礼有加。刘宗敏知道吴襄是镇守山海关外宁远的总兵官，是吴三桂之父，怎会为一个陈圆圆，做此违背大顺军政策的傻事、错事？当然，这不是说刘宗敏不搞女人，他进京后，不只搞了宫里的嫔妃宫女，还把一些宫女分配给自己的下属，有些妃嫔宫女因受礼教的束缚，或拒绝受辱，或受辱后投河上吊的就很有一些人。

《甲申三百年祭》称李岩曾谏自成四事，其中一项是“遣官招抚吴镇，许以侯封吴镇父子。”李自成批了“知道了”，并不行。

实际完全不是这样。而是李自成等进北京后，就对吴三桂和南方的左良玉等进行招降工作。他给左良玉等写了招降信，内容是“大顺国王，应运龙兴，豪杰响

附，唐通、吴三桂，左光先知大命有在，回心革面，朕嘉其志，俱赐彩缎黄金，所将兵卒，先给四月军粮……”。这一招降檄文载于《平寇志》卷十和《国榷》卷一百。据《国榷》等书载：李自成派人招降吴三桂时，还携去白银万两、黄金千两、绵缎千端，封吴三桂为侯的勅书一道。崇祯原来封的吴三桂是伯，李自成给他加了一级。

姚老说，吴梅村写的传诵一时的《圆圆曲》，不是纪实作品，而是加了许多想像和虚构的文艺作品。他撰写的《绥寇纪略》，错误百出，却被《明史流贼传》所采用，贻害至今。郭文采用了吴梅村的说法，使得这一谬误更加严重。关于陈圆圆的传说很多，而且大多互相矛盾，这里不详谈了。不过，如果真的吴三桂纳过陈圆圆，陈也不会住在北京，而会同吴三桂住在宁远，因为当时的高级军官，大多带家属住宁远。作为总兵官，吴三桂带陈圆圆并不稀奇。况且总兵官这样职务，不许擅自离开军营。不奉朝廷召，不许随便进京。吴那样爱陈，怎么会不带在身边呢？《国榷》卷一百就讲：“后襄入京，三桂遣人随襄（入京），宏遇处买沅（即陈圆圆），即遣人送之平西。……伪权将军刘宗敏……索沅，襄具言遣送宁远。”

吴三桂没有拒绝闯王的招降而又没有降闯是当时可能是缓兵之计；另外，吴虽是一介武夫，也知叛明有损名教，除万不得已，决不肯为。还要考虑到，吴的舅父祖大寿等降清后很受重用，祖等也曾向吴劝降。降闯是叛明，降清则是叛国，更会落个骂名千古。因此，吴对双方都在推托观望。

郭文和三百年所传的吴三桂之“请”清兵，原因很多，但绝非“为红颜”。而且清兵之入关，也非受吴“请”之故。满族的皇太极在继位之后，辽东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西边统一了内蒙古，东边臣服朝鲜，国力空前强大。崇祯9年，改后金为大清，正式称帝（清太宗）。从此，入主中原就成了大清的国策。反观明朝灾旱频仍，饥民遍野，盗贼蜂起，并结成不少民变武装和农民起义军。朝廷内部，文官聚欢无度，武官抢掠成风，已如一棵被蛀空的大树，随时有倾倒的危险。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之下，乘明朝新亡，李自成立脚未稳，率兵入关，就成了最佳时机。

据史料记载：多尔衮统率清兵从沈阳向关内进军的时间是崇祯17年4月9日，4月15日即到达翁后（今阜新市境内）。李自成率6万大军由京北上讨伐吴三桂，是4月13日，吴闻讯后即派使者向清兵乞援，4月15日与清兵相遇于翁后。

原来多尔衮的进军路线是从遵化和密云两处过长

城进击北京,绕开吴三桂镇守的山海关。由于吴三桂乞援,才改由山海关进关。也就是说没有吴三桂的乞援,清兵也是要入关的。吴三桂的“请”,仅仅是改变了清兵进关的路线而已。

作为以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学者,应该十分重视社会经济这一基础。军事、政治虽也有重要作用,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抛开这点而认为主要起因于陈圆圆,实际是重复了“女人是祸水”这一滥调。以致连清初的全祖望都讲:“吴逆进退失据,无可置辩。主谓其以陈沅叛闯,则亦近乎下流之归。”

关于明亡的原因,《甲申三百年祭》突出的讲了是源于腐败,这当然是不错的。但这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面是经济的江河日下和近乎崩溃。邓小平同志在《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中讲:“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再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动乱多起因于无粮。“无农不稳,无粮则乱”,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的小农经济十分脆弱,许多贫苦农民,平常年景不就是糠菜半年粮。一遇灾荒,立即断粮,如果一连两三年灾荒,连中农也会食不果腹,动乱就不可避免。此时,如果国力充足,统治者又较开明,就会赈灾济贫,轻徭薄赋或者减免,那就能渡过灾荒或者将灾荒和骚乱减到较低限度。如果仓廩匮乏,再加腐败泛滥,必然引起大乱。而明末却正是后一种状况。

《甲申三百年祭》为了突出包括崇祯在内的腐败,引用了《明季北略》卷五中的一段话:“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两,镌有永乐字”。而且是在李自成撤离北京后发现的,“皇库扁钥如故”。实际上这条记载是不真实的。史亨的《痛余杂记》、王世德的《崇祯遗录》、李清의《三垣笔记》、毛奇龄的《后鉴录》,都否认这一点。胡介祉的《茨村咏史新乐府》一首题曲为《内帑疑》诗的小序中说:“熹宗在位七年,昏庸侈靡,神宗四十余年,积蓄扫地无余矣,兵兴以来,帑藏悬罄,常将累朝所贮银瓮、银盃、尊、鼎等重器,转入银作局倾销充饷银,故饷银多有‘银作局’三字。人所共见,空乏可知。”史亨的《痛余杂记》曾引在户部任职的吴履中的话说:“吴宣山曰:吾尝司计,请发内帑,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

如果库内真有那么多年银锭,在明王朝面临亡国亡头的情况下会不使用?李自成进京后会不打开?

据毛奇龄《后鉴录》载,大顺军拷索所得的七千万

两银子,“侯家十三,阉人十四,官眷十二,估商十一;余宫中内帑、金银器具,以及鼎耳、门环、铜丝镶嵌,剔剥殆遍,不及十万。贼声言得内帑,恶拷索名也。”这都证明国库中没有多少钱,国民经济到了这般状况,还能不亡吗?

当然,这不是说腐败不重要。当人民饿殍遍地,而统治阶级和达官富豪还在穷侈极欲时,怎能不激起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所以说,腐败正是起着火上浇油的作用。

“李自成进北京”,三百多年来一直成为家喻户晓的形容腐败忘本的一句俚语。大顺军在京总共不过40多天,腐败却像瘟疫般扩散开来,以致涣散了士气,削弱甚至丧失了战斗力,与清兵一战而败。但是,李自成的失败,主要还是战略上的错误:一是在占领地区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二是长期执行不纳粮和三年免税政策,无充足粮银,便养不起多少兵,李自成兵力最盛时也不过30万人。再就是不应匆忙占领北京,而应首先占领山东、河北等地,控制住漕运,解决给养问题。他说:“50年来,史家一直把李自成攻占北京看作伟大的胜利,其实这是不对的。所以我在小说《李自成》第二卷第43章,借李岩在路上写给李自成的一封长信中,提出了他的战略建议。这封信完全是我写的,表述了我的观点,即不应占北京。退一步讲,即使占领了北京,也应像刘邦‘还军霸上’那样,守卫边塞要地。这就不多谈了。”

姚老非常赞赏邓小平同志两手抓的方针,特别对他讲的“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姚老说,小平同志这些话是几年前讲的了,但现在还没有过时,还有很大的针对性,特别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这两句。不要说下不了手,就是已经下了手的事,群众仍有不满意的。例如,在有的单位连接时发工资都困难时,而单位的领导却违纪花几十万元买高级轿车。有的经政府查处了,也只是罚一点款了事。而且那点轻微的罚款也是由公家出,不伤购买者一根毫毛。再如有的省市查处了一些夜总会、歌舞厅等高消费和“色情服务”场所,来这儿消费的竟有80%以上是公款开支的。查处的结果呢,不过收审或劳教几个妓女,而挥霍者却安然无事。集团犯罪也越来越多。国家的企事业单位坑害国家,据有的海关统计,在走私案件中,企事业单位也占到80%以上,也只罚款了事,这怎么能让群众信服?

姚老说,过去我们那样艰难而能取得胜利,就是与群众同甘共苦,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现在有些党员干部忘了这个优良传统,只求自己舒适,而不关心群众疾苦,个别的甚至大吃大喝,花天酒地,这种情况不改变,怎能让群众满意?

姚老说,去年纪念“甲申”的座谈和文章,谈得最多的是腐败问题。这个问题当然重要,但我个人以为,还要注意防骄问题。毛主席说,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几次重大挫折,都是因为骄傲。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几次重大挫折,我也以为是因为骄傲。所以,为长治久安,今后也应防骄。改革开放十几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有了巨大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有了显著提高,举世瞩目,有目共睹,这是铁般的事实。然而有些干部,其中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我以为也产生了沾沾自喜、自满和骄娇二气。具体表现是看成绩重,看问题轻,不那么爱听不同意见和批评意见。这种状态不改变,反腐败是不会彻底的。且很可能获得一些成绩就感到满足。人民是腐败的最大受害者,一定要注意倾听群众的声音和评价。

姚老说,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曾向毛泽东提出“兴亡圈”的问题。毛答,这个循环圈中国共产党能解决,其办法就是民主。对于毛泽东这一光辉思想怎样付之实践,他自己没有解决好,特别是在晚年。此事应引起高度重视。

姚老郑重地说,无数经验教训证明,不论是解决建设问题,还是防止腐败问题,都必须依靠民主。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发展那样快和取得那样伟大的胜利,就是由于党内和党外民主较好。五六十年代的“左”和造成那样大的挫折和失败,压制和破坏了党内外的民主,可以说是一个极大原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但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并加以制度化、法制化,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实在是到了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时候了。

在访谈即将结束时,姚老说,郭沫若是一位文化巨人。他的许多著作包括文艺作品,在我国的文化领域是有着重要地位的。他也是我尊重的师长之一。他的虚怀若谷也使人钦敬。1977年1月,我把《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前言》一稿和的一封信寄给了郭老,说“其中谈一些历史问题,我没

有十分把握……前言中关于对刘宗敏和李信的评价,和你从前的意见相左,正如先哲之言曰: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这也算是学生同老师争鸣吧!不妥之处,务请赐教,以使改正。”郭老当时在病中,看了前言后即给我回信,说:“前言我一口气读完了,我完全赞成你的观点。祝贺你的成功,感谢你改正了我的错误。”

姚老沉吟很久,又感慨地说,50年过去了,当前一些学术和史学界同志,至今仍停留在《甲申三百年祭》水平,很少有新的创见,不仅奉为圭臬,还有不少溢美之辞。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是郭在学术上的地位。再说是毛泽东的肯定。其实,毛是一位大政治家、军事家,他虽然酷爱史书,但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读史,读史的目的也主要是为政治服务。不可能像一个历史学者,对断代史,或历史中的某个问题,进行细微的研究。姚老说,多年以来,我们受个人崇拜和迷信权威的影响和束缚,不敢大胆探索和创新,唯恐被认为异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学术研究是很难有进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许多方面有了很大改进,但有些方面还进展不大,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从纪念“甲申”的文章和座谈发言中,不也明显的看到了这一点吗?

(责任编辑 杜晋 舒元坤)



姚雪垠与本文作者陈英茨

李大钊身边的一对革命情侣

——谭祖尧与李婉玉

● 罗学蓬



谭祖尧烈士像

公元1927年4月28日下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血雨腥风的时刻。

北平，京师第一监狱内，高墙环绕，军警林立，黑云如帐，悲风呼啸。随着一串叮叮当当的铁镣电地声，以李大钊为首的20名革命志士，大义凛然地登上了耸立在监狱内院的绞刑架，以自己宝贵的生命，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

在这一批殉难的烈士里，有一位来自四川江津的年轻人，叫谭祖尧。

1922年，刚满19岁的谭祖尧考入了国立北平艺术专门学校西画系。二十年代的中国，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压榨和剥削，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谭祖尧到北平后，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并在斗争中表现出卓越的组织能力，受到李大钊先生的器重。1923年，谭祖尧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李大钊手下的一员干将。当时，李大钊先生既是中共北方区的负责人，又是国民党北方部的执行委员。谭祖尧则身兼两处的秘书。这时，陈独秀创办的以李大钊、鲁迅为主要撰稿人的《新青年》已经停刊。谭祖尧便建立了“新军社”，并创办《新军杂志》，为团结北平的进步青年，宣传马列主义，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时人誉《新军杂志》为《新青年》的再现。谭祖尧逐渐成为进步青年中的著名领袖人物。

一次，中画系举办画展，谭祖尧与几位西画系的同学前去观看。蓦地，一幅笔法细腻的工笔画吸引住他的目光，使他在画前驻足良久。那画左面一丛芭蕉，旁边一个妙龄女郎亭亭玉立，若有所思地遥望天际，淡雅清

新中似透出浓浓情意。右面则题有一首七绝：

碧玉年华初上头，
何妨顾影学风流。
闲来却倚芭蕉立，
绿透春衫未解愁。

谭祖尧不仅对诗画颇为欣赏，此画的作者李婉玉，更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这李婉玉，经常为《新军杂志》撰稿，谭祖尧知道她文章犀利，文风泼辣，却未料到她的诗画也如此出色。两人虽是同学，但一个在西画系，一个在中画系，一直无缘认识。谭祖尧观赏良久，对同学感慨道：“真是诗画双绝，倘能画成扇面，倒是一件高雅之物。”他全然不知李婉玉此时正站在他身后，听见他这话，莞尔一笑，悄然离去。

对大名鼎鼎的谭祖尧，李婉玉早已仰慕在心，如今得着这么一个好机会能与之结识，她自然不会放过。

几天后，这位胆识过人的姑娘只身来到西画系，拜会谭祖尧。

这倒让谭祖尧又惊又喜，出现在他眼前的李婉玉，布衣素衫，清丽脱俗，犹如一朵出水芙蓉。

通过交谈，谭祖尧了解到李婉玉乃是一个大家千金，其父在北平海军部供职，她幼乘庭训，有很深的文学修养。

李婉玉拿出一把精美的杭州折扇，递给谭祖尧，大方地说道：“谭先生，这是我特意为你画的，请你也在上面题一首诗吧。”

这分明有一点考考谭祖尧的味道了。

好在谭祖尧也是个才思敏捷之人，他将折扇展开一看，扇面上的诗画与画展上的条幅内容一般无二。他起身去桌上提起毛笔，在砚台上润润笔尖，略一思忖，便挥毫写道：

休教年华付白头，
横刀跃马追风流。
春衫绿透增惆怅，
不为家愁为国愁。

谭诗紧步李诗之韵，然情志意趣，则远非李诗所能比。

“好一个不为家愁为国愁！”李婉玉失声赞道：“谭先生忧国忧民，志向高远，真是令我汗颜啦！”

自此以后，谭祖尧与李婉玉往来更为密切。在谭祖尧的帮助下，不久，李婉玉便参加了共青团。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日子里，她利用其家庭的有利条件做掩护，担任了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方部的地下交通员，成为谭祖尧亲密的战友和恋人。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



被张作霖杀害的李大钊（左下）
和谭祖尧（右四）等烈士

奉军作战期间，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入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被守军击退。日本遂联合美、英、法等八国公使，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通牒，要求撤除大沽口防务。时称“大沽口事件”。帝国主义的这一霸道行径，激起了北平学生和民众的无比愤怒，3月18日，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和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群众大会。谭祖尧是这次大会重要的具体组织者之一，李婉玉也自始至终参加了这场斗争。会毕，万余名群众拥往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请愿，要求段祺瑞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不准其干涉中国内政，并反对执政府勾结张作霖发动内战。在日本军阀主义者的唆使下，执政府的卫队竟用大刀、刺刀向手无寸铁的群众砍杀。激愤的群众在谭祖尧等人的率领下，宁死不退，向铁门冲击。卫队开枪了，当场遭射杀而死的群众有47人，伤者无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后，段祺瑞在全国舆论的谴责下被迫下野，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入据北平。其晨，广州国民革命军已挥师北伐，在此后的日子里，下长沙，取武汉，两湖直系军阀被驱逐，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被击溃，大军即将挥戈北上。而日本和张作霖认为，北平国共两党的活动，对他们的心腹之患，需在大战之前坚决铲除。

霎时，古都北平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李大钊带领谭祖尧等3名得力助手，避进了苏联大使馆附属的中东铁路局驻北平办事处的屋子里。即使是在这充满危险的日子里，他们仍然和外界保持着联系，继续与军阀势力进行斗争。

当时，谭祖尧如果愿意的话，他有两次机会可以逃避开这场斗争。第一次是3月底，在海军部工作的李婉玉的父亲，探听到张作霖即将对躲进使馆区的革命者下毒手的消息，派人带口信要谭祖尧马上离开北平去

广州，他可以托朋友为谭暂谋一事作为安身之处，但谭祖尧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回复道：“干革命就不能怕死，我宁为玉碎，不愿瓦全。我坚决跟李先生干革命，决不回头。只要李先生留在北平，我也决不开！”

第二次则是谭祖尧的江津同乡，小学、中学的同学，时在北大读书的龚灿滨先生冒险前来通风报信，告诉他情况紧急，必须马上离开。谭祖尧带着他，一同来到李大钊的住地苏联营房。李先生问了消息来源，向龚表示感谢，然后在室内踱了几步，口气很肯定的说“这地方是苏联大使馆，按《辛丑条约》，中国军警不得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我认为张作霖是故意放出空气，逼鸟出林，他好在外边动手……哼，进使馆区抓人，他不敢冒此大不韪。”接着，他又对谭祖尧说，“离开，北平的党组织就会解体，至少党的工作会停顿下来。北平嘛，我无论如何不能离开！”

谁知道，4月6日的半夜时分，张作霖悍然派出一千多名军警，开进东交民巷，在苏联使馆营房区强行捕去了李大钊先生，还在馆楼上捕去了谭祖尧、路有于、范鸿劼3人。躲藏在四川会馆的北师大学生、共产党员吴平地也同时被捕。其余在各大院校被捕的大约有五、六百人。

事后证明，各国公使团（苏联除外）为了消灭“异党”领袖，秘密与张作霖勾结，不惜暂时放弃一点特权，允许中国军警进使馆区抓人。

在李大钊和谭祖尧等人被捕的同时，敌人还抓走了李婉玉和她的妹妹李柔玉，把她们同李大钊的家人关押在一起。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事后回忆道：

“下午约摸四、五点钟，谭祖尧同志的未婚妻李婉玉也被带来了，还有她的妹妹李柔玉……婉玉告诉我，她的父亲是张作霖手下一名海军大官，很有势力，但是她没有跟着她父亲走，而是参加了革命。她和谭祖尧同志感情很好，当形势恶化时，她曾几次劝谭祖尧化装离开北京，可是谭祖尧说什么也不走……”李星华还说：“我很佩服婉玉的勇敢，她在拘留室里常常和那些坏家伙作斗争，连女禁子都有点怕她呢。”

4月28日下午，李大钊、谭祖尧等20名志士殉难后，龚灿滨与乡人吴清汉出面向江津在京人士募款160元，买了两具棺木，两匹白绸，前往京师第一监狱领出谭祖尧和另一位江津籍烈士吴平地的遗体，雇汽车送往南郊陶然亭四川义地安葬。李婉玉在母亲的陪伴下，也赶到义地为谭祖尧送葬。当薄薄的棺木揭开时，只见两位烈士的颈上各有一圈乌痕，谭祖尧胸前还有碗大一团血斑，可能是生前遭毒打所致。李婉玉目睹惨状，奋身扑向遗体，跪伏棺前抚尸痛哭，直至昏厥。

江津籍画家朱近之先生回忆道：“我当时和祖尧一起考入北平艺术专门学校，他是西画系，我是中画系。祖尧是我老乡，婉玉是我同学，我们三人的感情非比寻常。我和婉玉参加革命活动，主要是受了祖尧的影响。祖尧自参加党以后，不仅要里里外外联系组织工作，而且每次斗争无不

亲自参加，战斗在第一线。诸如‘首都革命’、‘五卅反帝斗争’、‘三·一八’惨案……诸役，他都冲锋陷阵，奋不顾身，非常英勇。在‘三·一八’惨案中，他因救护大钊先生而负伤，送医院抢救而后愈。

“我回四川之前，祖尧、婉玉和我相聚在北京前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话别。婉玉擅琴，那天她抱琴而来，要去赴城南崇教寺‘琴会’。他们本是来送我的，可我坚持要先送婉玉去城南。我抱琴和祖尧送她上车，待她坐定后，我就跟她说：‘婉玉，我将于巴山蜀水间，敬待你和祖尧相伴归来。’她开心地笑了，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

“祖尧牺牲后，婉玉曾与我通了若干次信，她在最后一封信中写道：‘祖尧以英杰之姿，年富有为，而乃以爱恋我，甘赴危境，致罹于难。悔恨当时我未能决然离去我家，和他一道出奔，而今悔恨莫及，此生此世，何以自处？惟有抱恨终天而已！’她真是悲痛到了极点。”

后来，李婉玉因悲伤过度而神经失常，时常怒目圆睁高呼：“打倒刽子手张作霖！”她悄悄买来一把匕首藏在腰间，要杀死张作霖为祖尧和遇难的同志报仇。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她独自离家出走，来到座落在西城的顺承王府（张作霖官邸）旁的一条小胡同口，彻夜未归。第二天，有人发现她已经被冻死在雪地里。装敛时，家人才发现她的腰间别着一把雪亮的匕首。

谭祖尧和李婉玉的悲壮爱情故事却会长留人间，激励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奋勇向前！

（本文照片 李启君摄）

（责任编辑 孙 中）



绞刑架



王思玷画像

月黑星殒

——文化先驱王思玷
人生三部曲

● 山 民
— 民

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飘着血腥味的浓雾沉重地压在鲁南大地上，一切生灵都在昏睡，只听见坚硬的马靴的踢踏声，冰冷的枪声和梦呓般的被害者的呻吟，旋即又归复于死灭般的寂静。

当我们，这晚你半个多世纪的同乡发现这一切时，是那样地震惊和悲哀：一个用青春的激情和知识的力量开化蒙昧的乡亲的教育家，一个用孤愤的笔警醒昏世的作家，一个把满腔热血泼向黑暗作最后一击的猛士，31年的岁月竟被尘土埋得如此之深。没有人知道你生的价值，也没有人知道你死的价值。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伟大的灵魂——茅盾先生，你的7篇小说都是经他阅发的，也是他给了你那样高的肯定啊。如今，你的作品已经编辑出版了，而你还像一颗尘埋的珍珠，还没有被今人所发现。

序 曲

兰陵，这块飘着兰花的馥郁与美酒的馨香的土地，这个荀子讲过学、李白题过诗的古镇，在你童年的画布上本应涂满七彩迷蒙的梦幻，如今却抹上了鲜血淋漓的现实。

你两三岁，记得的第一件事是祖母讲的八国联军

火焚圆明园；呀呀学语，你背会的第一首诗是母亲教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豆棚瓜下，你听到的第一个故事是千人“公车上书”到六君子菜市口就义。嗣后，孙中山、黄兴、谭嗣同、章炳麟、邹容、秋瑾、陈觉民等掷地有声的名字和他们传奇般的事迹，便一点点刻入你的心底。

6岁，你跟从本镇一位叫王思颖的老师读私塾。儿时濡染的忧国忧民思想，使你对于那些诗云子曰实在提不起兴趣，幸亏你的塾师是清末不得第的秀才，受戊戌变法的影响很深。他教你摹写的第一张字帖便是一首极悲壮的诗：“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自此，谭嗣同这震聋发聩的歌声便悬挂在你的壁上，缠绕在你的心头，成了你人生悲剧的序曲与主题歌。

教 书

“兰陵区立第一小学”的牌子挂起来了。由于一部分孩子上过私塾，学校直接分高级、初级两个班，共60多名学生。和县里联系，派来两位老师，一位带英语，一位带体育。你的大哥思璞代高年级国语。他们三位拿薪水，算正式老师。你和三弟思珉说什么也不拿薪水。

你说反正家里还有饭吃，不要那几块大洋。为平民教学要真正尽义务，才能做到梁启超所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

一踏上讲台，你就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你面对的仿佛不是30个奶声奶气的学生，而是四万万昏睡的国民。你仿佛是身在学生游行的队伍中，用力地挥着三角旗，大声呼唤：神州陆沉，同胞醒来！

你教初年级国语，第一课是“人”。你在黑板上写下了两个“人”字，问学生：“你们看这两个字一样不一样啊？”

学生一齐回答：“一样！”

你说：“是的。人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其实不一样。人除了男女之外，还分两类：一类是好人……”

不等你说完，孩子们抢着接下去说：“一类是坏蛋。”

你立刻激动起来。开始给孩子们讲坏人与好人。讲丧权辱国的慈禧太后，讲狗仗人势的奴才荣禄，讲买国贼李鸿章、曹汝霖、章宗祥；然后再讲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讲以血报国的谭嗣同，讲邓世昌、秋瑾、孙中山、黄兴……，这一切，六七岁的孩子当然听不太懂，但你却在他们幼小心里埋下了爱和恨的种子。

讲地理，你先用黄色粉笔在黑板下画一张中国地图。然后讲中英《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俄《璦琿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以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政府同11个强盗国家签订的《辛丑条约》。随着这些条约的签订，你用红笔在地图上的不同位置切割着：香港、九龙、东北、西北、山东……，讲着讲着你支撑不住了，竟当着全班学生的面痛哭失声。

也许就是你的那些课，使兰陵一带的许多青年，后来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创 作

春天的一个晚上，你还在这里一边帮他整地种辣椒，一边听他讲不幸的身世，讲几场凄风苦雨如何夺去了他娇儿爱妻的生命和土地、牲畜，一个温暖的小家只剩他一个孤苦的老头了。当时并没有引起你太大的震动，这类故事你听得太多了。不久，你听说这个苦老头子黄二没熬到吃新麦，又连病带饿死去了。而今又是狂风暴雨，看到园中被折断的辣椒枝躺在冰雹泥水中呻吟，想着黄二悲惨的一生，你心中汇成一股忧愤的激流。

忽然，几道闪电划亮了你心中的乌云，一个念头也

闪电般地冒出来：写小说。为什么不象沈雁冰先生说的那样“为人生”而写作，用文学去控诉这血泪斑斑的现实，去唤醒昏梦沉沉的苍生？也许是天缘吧，为什么恰恰今天晚上你才注意到《小说月报》十二卷五期那一小块《征文启事》？为什么征稿的题目恰恰是《风雨之夜》？霎时，你看到风雨之下，黄二和你的许许多多乡亲们艰难地挣扎着呼号着，最终却被风雨吞噬了……就这样，你的处女作《风雨之下》竟然一挥而就。

如豆的灯光下，你几乎是不停笔地写着。从正月十五元宵节甜美的希望写到风雨摧毁了主人公的三季庄稼，写到主人公的妻子病故，5岁的儿子卖掉，活泼的少女在逃荒路上淹死。你的眼里盈满了泪水。你原构思中的主人公的结局是同现实中的黄二一样，丢下半间破草屋，你又不忍心了。这个世界上的悲剧已经太多了，希望又是那般渺茫，多给人们一点生的勇气吧。你拭去泪水，没有让主人公死去，而是在他讲述完妻子儿女的不幸后，你热切地安慰说：“老头！不，老头！强暴的风雨神不久就要下台了，要换上些好的风雨神，降些和风甘雨，生长你们的田苗五谷，盼望着吧！盼望着吧！”可是我尊敬的姑公，你的这种安慰令人愈觉悲凉。因为你这里诅咒的“强暴的风雨神”已经不仅仅是“风伯雨师”了；而你热切呼唤的能“降些和风甘雨”的“好的风雨神”又在哪里呢？

十年之后，茅盾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提到这篇小说时说：“作者对于农民生活的熟悉，在这里已露端倪。”先生哪里知道，你和农民的血肉深情呢？

第一篇小说发表以后，很快，你写出了第二篇小说《偏枯》。这又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患了半身不遂的泥瓦匠刘四。一窝乳燕般嗷嗷待哺的四个孩子。一个满溢着母爱，却被夫病儿饥折磨得精神上几近崩溃的女人。卖掉了没有土地的农民唯一的生产品——锄头和一只生蛋的老母鸡，便切断了生活资料的全部来源。为了不致于全家饿死，只好咬牙出卖自己的骨肉。买主将来，分离在即。小说如一台独幕剧，刻画了一家人妻离子别前瞬间的行为与心理。

你当然无法知道，十五年后，一代文学巨匠茅盾先生给了你这篇小说那样高的评价：“我们又看见了很细腻地表现了卖儿卖女的贫农在骨肉之爱 and 饥饿的威胁两者之间挣扎的心理的《偏枯》……不但在题材上是新的东西，就是在技巧上完全摆脱了章回体旧小说的影响”，“使用活人的口语，用‘再现’的手法，给我们看一页活的人生图画。”“三千字左右的短篇，然而登场人

物有六个，而这六个人物没有一个不是活生生——连那个还在吃奶的三儿也是个要角，不是随手抓来的点缀品。而在六个登场人物之外，还有一个不登场的人物，买了那阿大去的和尚却也时时要从纸背跳出似的。”（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你当然也无法知道五十年后，人们从现代文学洪流中沙里淘金编选的五六种文集，都收入了你这篇不足三千字的作品。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们尽管还不知道你是谁，却给了你的作品以极高的评价：

“郑振铎在《血和泪的文学》中说：我们现在需要的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似乎要比‘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甚些吧”，但“可以说，文学研究会作家中几乎没有这种描写被压迫者的血和泪的创作，惟有在《小说月报》、《文学周刊》上发表过几篇并未加入过该会的作者的创作，如利民的《三天劳工的自述》和王思玷的《偏枯》等……这些作品在题材上突破了当时一般作家热衷于描写的学校生活和恋爱故事，在技巧上也有所创新，没有抽象的议论，注重口语的运用。”（见林志浩著《中国现代文学史》）

1922年11月，《偏枯》在《小说月报》十三卷十号发表。从此，你的创作进入盛期。之后两年多里，仅《小说月报》一种杂志上接连又发表了你的《刘并》、《瘟疫》、《归来》、《一粒子弹》、《几封用S署名的信》。另外据你的亲友回忆，你还在《东方杂志》、《文学周刊》等刊物上发表过诗歌、散文、小说等。

一个老实本分的农人，种了一片高粮。这红头绿杆的高粮，“吃着他的肉。喝着他的血，浴着他的眼光”长大了。可这即将到手的粮食，忽然遭到地痞的盗窃。农人父子当场捉住了地痞，贼脏俱在，送交官府。按理，窃贼必定受到惩处，家人的财产理应得到保障。善良的农人盼望着，他哪里知道这个社会或官而盗，或盗而官，官盗一家，“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先是保长捎信暗示向农人要钱，农人不敢相信，反以为当官的决不会图钱。于是保长纵虎归山，农人盼来的是更大的灾难：高粮更多地被偷，未成熟的地瓜被糟蹋，驴被杀，驴骨埋在他祖茔里。进而，这地痞又持刀辱骂，并要杀他全家……哪里还有天理王法？哪里还有平民百姓的活路？你怀着一腔忧愤写下了《刘并》。

四篇反映农民生活的小说成功发表以后，使你坚定了用笔鞭挞黑暗，为乡亲呼喊不平的决心。在剖析了三类农民的不幸之后，你的目光很自然地搜索到这灾祸的直接来源——军阀混战。

于是1923年夏天，你开始创作第五篇小说《瘟疫》

十多年后，茅盾先生说：“《瘟疫》的题旨是在老百姓怎样怕兵。军阀铁蹄下的山东人的作品对于兵的感情不会好的，他用了‘幽默’的笔调写一个小村上的居民怎样用消极的手段来挡那些丘八太爷的驾。”

当茅盾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已为了无数“小村上的居民”不再受丘八之害，而流尽了自己的热血，长眠于地下了。

这是历史的巧合吗？在你的《瘟疫》发表65年之后，一本专门研究北洋军阀的书《武夫专制梦》中写道：“作为拿枪的人来说，发财的路有两条，一条是升迁，二条是抢劫。升迁之路太阻塞了，于是乎军阀部队中的抢劫行为就象瘟疫一般弥漫。”这本书不仅对你上篇小说的主题作了准确的解释，而且堪称你下面两篇小说的最佳注脚。

你的第六篇小说《一粒子弹》，便从这里开始。

看来“根”的当兵还不只是为了“吃粮”，而是为了升官发财。“根”是听了舅舅“哪个官不是兵变的”一句话，欣然跟舅舅入伍的。当他第一次穿着军装还乡时，那样骄傲地炫耀自己“羽毛丰美的雄鸡”般的神姿和不久即可升官的美梦。接着，你无情地揭示了那梦的结局：一口阴惨可怖的白木棺材。而在进入棺材之前，你又让“根”说出了他临死前的醒悟：“我的死是不值得的……。人生的蜡烛总要点在人群经过的通衢上，不要送入风雨的场所……我走错了路，走入了弹箱里去了……”。

“子弹是必须炸裂的。这里不炸的，再送到那里去炸……终于还是要炸的。”

这是多么沉重的忏悔和警世的呼喊啊！

沈子久替兄当兵，由伙夫、班长升到排长。顺利的升迁使他春风得意，曾三次回兰陵招募新兵，便又很快升到团长。但在几次白刃相见之后，他清醒了军人的位置。接着在不久前一次战斗中，所带三个营全军覆没。子久幸免于死，便逃回了故乡。就是他，是那晚一次长谈，帮你写完了你一生的最后一篇小说《几封用S署名的信》。用今天的说法，这或许可称为纪实文学。小说中的“S”就是“沈子久”。

我们仿佛看到S脸上露出令人辛酸的苦笑：“我与我的表兄相处在敌人的地位，也不是稀奇的事，也不必忧伤了。因为我们俩同是做的买卖，不过他卖的皮袄，我卖的是扇子。如果夏天战胜了，便赚了我们的扇子，赔了他的皮袄；如果冬天战胜了，便赚了我们的皮袄，赔了我的扇子。我们俩，总有一门赢，倒比两人同做一桩买卖，不巧就会赔得精光，强得多呢。但是，我的心全然不承认这个理解。”

小说的结局是在又一次血战中，S所在的军队胜了，敌军中的“表哥”就死在他的手下，成了他升迁的资本，他要升为督连长了。而这次升迁加重了他的痛苦，他终于完全清醒了，在最后一封给老师的信中写道：“啊，先生！我并不是绝对反对战争的人。我也不是不赞成牺牲的人。但是，要分清死在民众祈祷之下的，才是牺牲。死在肉商的货店里的不是牺牲。……这买卖式的雇工式的，也算得了战争吗？”

啊，王思玷先生，到这里，您通过对一个下级军官的心理描写，终于完成了对军阀战争的分析批判：给全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不过是几个军阀巨头以及他们的大小爪牙，用无数老百姓的头颅垫高他们的官位罢了。

12年之后，茅盾先生对这篇小说的评价是：“他终于抛弃了最初纯客观的态度，热情地诅咒‘内战’的罪恶。他用了书信体，他不写战地的情形，不写士兵，他描写一个下级军官怎样由‘升官发财’的梦跌在现实的泥淖里，终于觉悟了他在那无名目的混战中的真实的地位”，“在十三年（1924年）的非战文学中（他这篇发表在那时的《小说月报》的非战文学专号），已经是很好的了。”

起 义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

家居了几个月的你，回到学校，走上街头，组织追悼会，宣讲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怒斥军阀政府的祸国殃民。

5月底，“五卅”惨案发生。你再次带领学生上街讲演，反帝反军阀。

7月初，广东革命军誓师北伐。你高兴地拿着报纸奔走宣传。

9月28日，终于在兰陵西南里的底阁镇爆发了一场农民起义。起义的目的是响应将开始的革命军北伐。发起人是一个蓬头乱发的人。这场起义在中国现代史上虽然微不足道，但却最终

把你从文坛推上了金戈铁马的战斗旅程。

9月27日，是你终生难忘的一天。你在底阁同袁永平等商定第二天的事情之后，夜已深了。他们劝你歇息，你却执意回家一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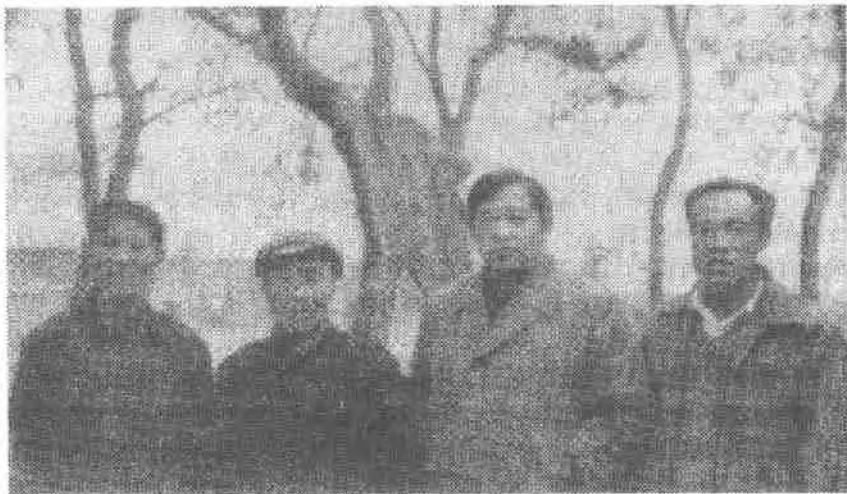
你没有惊动一双可爱的女儿，默默地立在床前。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响起，爱妻素贞进来了，左手端着一盘你最喜欢吃的辣椒炒羊肚，右手中是一盘切好的月饼。你猛然想起今天是农历八月初十，中秋节要到了。你心头一沉，眼角湿了，忍不住轻轻唤了一声：“素贞！”

素贞回转身来，一脸泪水。

你拉住妻子的手让她坐下，然后满满斟了两杯酒。你端起一杯酒抖着手递给素贞，素贞没有接。你自己一饮而尽。妻子抬起头愣了半天，双手捧起自己面前那杯酒站了起来，几滴清亮的泪珠接连滴入杯中，溅起一串酒花。

底阁镇处在临沂到徐州的交通线上，本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小集镇。可在1925年9月28日上午，一下子从地下冒出了50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他们已被天灾和兵乱剥夺得一无所有，一无所有的人还怕什么呢？

刚收过的一片庄稼地上，誓师大会召开了。会场中，一杆白底红边黑字的大旗在秋风中猎猎飘舞，上书：“国民革命军山东游击队第一支队”。司令袁永平依然须发蓬乱，一身短打扮，精神矍铄。被袁永平任命为秘书兼参谋长的你，依然是礼帽长衫。当你代表司令历



左二 王思玷长兄思璜之子王纶和；左一 王纶和之子王毓龙；
右二 本文作者 靖一民；右一 本文作者 王善民
(背景为王思玷小说《偏枯》中的“白果树”)

数军阀战争给鲁南人带来的灾难，提出“拿下临沂城，打倒张宗昌”的口号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呼叫。

起义队伍当天下午开到兰陵镇，与郯城刘敢陈率领的山东游击队第二支队会合。

9月29日，袁刘两军挥师北上，计划从向城东进临沂。你骑着一匹白马，挎着妻子亲手缝制的那个绿书包，和袁司令一起走在队伍前头。从兰陵到向城25里，路两旁插满了乡亲们自制的各色旗子，挤满了送行的人们，还有几百名青年人陆续加入了你们的队伍。“乡亲们！我们打丘八（咒骂军阀语）去了！”他们愉快而激动的呼喊，使你不断地想到你的最后三篇小说。现在你的战士们同样是“一粒子弹”，但却不是毫无价值的炸裂，而要即将射向制造兵灾者们的胸膛了。

队伍开到向城，便遇到了敌人，在江苏同孙传芳争战大败而归的鲁军黄凤岐，却在此处跃武扬威的挡住了去路。

战斗打响了。你这个地道的书生，第一次上阵非但没有紧张，反而有一种莫可名状的兴奋和激动。你的任务是协助袁永平把握战局和下达命令，但你还是歇机会到前线打了一阵子，尝受了挥戈跃马手刃仇敌的快慰。

一见敌人，你的战士们一个个象狂怒的狮子，有的哭着、有的骂着扑向敌阵。这种阵势，黄凤岐和他的部下在多年混战中从未遇到过。战斗进行了不到两小时，黄军全线崩溃，甚至都没敢回临沂，带领残兵向北仓皇逃去。

向城一战，你们缴获了1000多支枪。军威大震。一大批附近的青年农民又投入军中，黄军的一些士兵在弄清了你们这支队伍的身份后，也纷纷投诚。第二天，你们的队伍已发展到30个大队，近两万人。浩浩荡荡，东进临沂。

10月4日凌晨3点，你们逼近临沂城下，正准备发令攻城，忽见城门大开，走出一支40多人的队伍，为首的还打着一面大旗，大书“欢迎袁刘二军进城！”

一不战，二不降，欢迎进城，搞的什么名堂？你和袁永平在马上愣住了。

原来山东督军张宗昌驻临沂的五十五旅徐源泉当时未在临沂，只有留守的3个营的兵力。而向城一战看到了你们来势凶猛，于是请示张宗昌来了个缓兵之计。率众出城迎接你们的是三营营长王金彪。他宣称，决定倒戈反张，并请苏军白宝山部下的蒋毅来临沂商量，共同举事北伐。你深知军阀的赌棍流氓习气，竭力劝阻袁

刘二位不要轻易进城，应将部队驻扎在城外休整，以观虚实。可袁刘二位不听，他们以为是向城一战镇服了敌军，临沂驻军真的要弃暗投明了，结果全部人马开进城内。

第二天，苏军蒋毅果真来到临沂，和鲁军王金彪设盛宴为你们接风。并请来临沂有名的戏班子演戏，慰问你们全体官兵。而在袁刘二位沉醉在美酒戏乐之中时，苏军的一个师已连夜兼程从苏北开到临沂。接着王金彪、蒋毅脸色一变，逼迫你们在24小时之内退出城外。

你们在城中只呆了14天，为了保存实力，只好退出临沂向沂水进发，开始了辗转流离。

1926年元旦刚过，张宗昌便派他的心腹翟文林出任临沂镇守使。3月，翟文林便诱降了袁永平和刘敢陈的部下侯六合（袁、侯后被杀，刘下落不明）。你在劝阻袁、侯二人无效之后，便和你的几个学生离开界湖，继续在沂水、沂源、苍山一带活动。你坚定不移的信念是，保存力量，迎接北伐。

1926年9月28日，你们回到家乡兰陵北车辋附近的孔庆。天上下着大雨，你们的衣服全湿了，又冷又饿。你想起你的一位中学同学住在这村，希望找到他在此暂避风雨，吃顿热饭。那时大村都有土围子，有地主的民团把守。你让队伍停在围子外，你带着你的学生张洪勋、车志远骑马来到围门前。想不到这个村的民团十分反动，看到你们就开枪了。你冒着弹雨大声呼喊那位同学的名字，说你是他的同学王思玷。可对方毫不理睬。很快，一颗子弹打中你的胸口，你一头栽下马来。车志远、张洪勋二人悲愤交加，一方面为你包扎伤口，一方面要下令让战士们攻打进去。你躺在地下缓缓地摇摇头，用最后的气力说：“不，不能硬拼了。听说北伐军7日已攻占汉口，吴佩孚仓皇溃逃。张宗昌、翟文林也长不了啦。把弟兄们……带回兰陵……等着迎接北伐军吧……遗憾的……”

话没有说完，你就在风雨之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殷红的热血浸透了你的灰布长衫和素贞亲手为你缝制的绿帆布书包，染红了生你养你的土地。一颗彗星就这样沉重的殒落了。全军官兵失声恸哭，泪水和雨水送走了你的英灵。

你的最后一篇小说中不是写道：“死在民众祈祷之下的，才是牺牲”吗？历史和民众是公正的，他们将永远记住你的名字——王思玷。

（责任编辑 王 恂）



杨小楼演《甘宁百骑劫魏营》

天津卫

“打”红

杨小楼

● 刘连群

杨小楼，原籍安徽潜山县人，名三元，梨园子弟。祖父杨二喜，是老徽班武旦演员，精于武术，戏曲舞台上的耍流星就是他首创，闯荡江湖多年，后到北京天桥卖艺，安家落户。父亲杨月楼，文武老生，名重一时，在“同光十三绝”的图像中绘有他扮演的杨延辉，因在《长坂坡》、《水帘洞》中的出色表演，被观众称为“活子龙”、“杨猴”，曾接替程长庚担任著名的三庆班的领班人。杨小楼8岁入小荣椿科班学戏。经班主杨隆寿开蒙，工武生、老生，又得名师姚增禄、杨万清等人亲授。他天资聪慧，又勤奋用功。却因个子长大，演武戏“长胳膊拉腿”，不够边式、利落，被讥讽为“象牙饭桶”，意思说扮出来看着挺魁梧，没有真本事，叫他“杨大个子”。他在《恶虎村》中扮演一个配角李五，还被人数落说：“他呀，长胳膊拉腿的，也就来个翻出场跟头的下手活儿呗。”

在他14岁那年，父亲月楼病危，对他放心不下，请来换帖弟兄谭鑫培，让他在病榻前拜谭为义父，临终相托，谆谆叮嘱，方闭目而逝。谭有8个孩子，都以

“嘉”字排行，给他起了“嘉训”的名字。此后，小楼一度寄居谭家，学艺得功，但不久嗓子就倒仓了，搭班演戏一直不顺利。有一次，武生王八十演《挑滑车》，他饰演配角岳飞，已经扮上戏了，王八十扫了他一眼，对后台管事说：“你瞧他那么大个子，羊群里跑骆驼，多难看，赶紧换人吧。”管事无奈，只好让他卸妆另换别人。受到如此羞辱，他转天就辞班不干了。

艺途连受挫折，小楼渐渐心灰意冷，开始迷上了道教，寻求身心的解脱。白云观的观主见他慕道心诚，为他摩顶受记，发给衣钵、戒牒，并取法名“嘉年”。小楼除了常去白云观打坐，还不时往西山戒台寺参拜，非道即佛，修身养性，一心要脱离红尘。由于师兄何佩亭等苦口婆心的开导，杨小楼那颗冷却的心又热起来，重燃起希望的火焰，毅然停止修道，重返艺海。

但是艺途对于杨小楼来说，仍是坎坷而多艰的。他先搭双奎班，给与杨月楼齐名的武生鼻祖俞菊笙充当配角，同时观摩学艺，但该班不久就解散了。杨小楼到了天津，在聚兴荣园的义盛合班任武行班底，演武戏中的小角色，默默无闻，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第二年，他又搭该班，境遇仍没有什么变化，那时他已经21岁了。

二

据老艺人回忆,天津过去有个叫八里庄的地方,湖泊纵横,林木茂密,环境优美而僻静。那里有座庙,逢年过节香火颇盛,平日门庭冷落,就靠出租庙内的几间小屋贴补开支。杨小楼发现了这个地方,就租下一间小屋住了下来。

每天清晨,外面还是黑漆漆的,杨小楼就起床了,出门去喊嗓、练功,把学过的戏一出出地演练。他练得很认真,很苦,为了压腿,他拴了个绳子套,把绳子搭在松树的高枝上,手里攥住一头,一只脚伸进套里,然后吊到头的高度,只用一只脚站着,姿势如同“搬朝天蹬”,嘴里则背戏词,练念白。每逢吊起来的脚累了,往下垂,就用手里的绳子拉上去,直到实在坚持不住了换另一只脚。如此倒替着用两只脚搬着朝天蹬背戏,戏背熟了,腿上的功夫也渐渐不一般了。

回到北京,他又到城南窑台练早功,不论风霜雨雪,从不间断。平时,他利用一切机会观摩前辈艺人的演出,向俞菊笙、谭鑫培、周奎奎等名家问艺,多方汲取艺术营养,为日后突破困境积蓄资本。

不料,有人突然出面阻止他的努力了。这不是外人,而是他的母亲杨老太太。

身为名伶之妻,在艺人世家生活了大半辈子,杨老太太自然希望儿子能够继承父业,也成为一代名角,因此一直是尽心尽力地支持小楼学艺的。可是,戏班子里关于儿子的风言风语,越来越多地传到老人耳朵里,说小楼不仅演戏长胳膊拉腿的,笨手笨脚,而且嗓子也不行,荒腔走调,沙哑难听,照这样下去将来顶大来个底包零碎什么的,还在戏班里混,不是给他那英雄一世的老爹丢人吗!杨老太太是天津人,性情爽快,最讲个外面儿,终于沉不住气了。有一天,她把琴师请到家里,让儿子唱几句给自己听听。小楼唱的是《长坂坡》里赵云那段“黑夜之间破曹阵”。只两句过来,她心里就凉了。送走琴师,她失望而惋惜地打量着儿子,狠了狠心说:“孩子,老天爷不赏饭,咱们别干这一行了,给你死去的爹留点名声吧。”

小楼听罢,垂首侍立,默然不语。他能够说什么呢,嗓子自打倒仓以来,至今没有缓上来,唱得确实不成样子。现在老人抬出维护家族荣誉的理由,实际上也是心疼他的艰辛,为他的前程着想,他有什么道理好为自己争辩呢。

可是,他终归不是几年前那个脆弱的他了,经历过出世而又入世的一番内心的苦斗,他不再肯让外界的

力量轻易改变自己人生的航向了。表面上,他俯首贴耳听从了母亲的安排,娶妻成家,脱离戏班子,守着祖上留下的家业过起了平静的小日子,心里却另有打算。

从不再跑戏园子那天起,他突然闭上嘴巴哑口无言了。到非说话不可的时候,便用手势比划。晚上,他不和妻子同房,自己在后院的一间小屋里住,把门窗都遮得很严;外面听不见一点动静,谁也弄不清他在里边干什么。

这样的日子,过了足有三个多月的光景。盛夏的一个午后,闷热难当,忽然疾风骤起,阴云四合,雷声滚滚,一场暴雨铺天盖地倾泻下来。就在瓢泼大雨洒向地面的当口,不知何方传来一声:“开山哪!……”高亢嘹亮,穿云裂帛,闪电般击透了满天隆隆的雷声!

“开山哪!”是京戏《水帘洞》中的戏词,齐天大圣孙悟空出场前要喊这一句。

正在屋里和邻居老姐妹斗纸牌解闷的杨老太太听见了,没好气地骂道:“那个缺大德的,看我们杨家不出唱戏的了,故意跑这门口喊嗓来啦!……”

杨老太太的骂声未落,啪唧啪唧地从屋外跑进一个人来,身上淋得精湿,却满脸喜色,两眼放光。

来人咻哧跪倒在地,叫道:“娘,孩子的嗓子行了!”

老太太半天没缓过神来,直怔怔地盯着儿子,颤声问道:“刚才那一嗓子,是你喊的?”

小楼连连点头:“就是孩儿……整整,一百天了!”

“对。孩儿禁声百日,今天到了期限,刚才借着雷雨大作,斗胆喊了一声,竟真的行了!”

“啊!”杨老太太恍然大悟,“赶情你不哑,是故意禁声调养嗓子?”

小楼喜不自禁地连声答应。

“阿弥陀佛!”老人家双手合十,朝天祷告:“老天爷总睁开眼了,也不枉杨家几代做艺,我儿一片诚心。孩儿呀,还不赶紧给你干爹报个信儿!”

小楼应了,起身便往外跑。

“慢着,拿着雨伞,别浇病了身子!……”老人忙不迭地追着喊,茫茫雨幕中哪里还有儿子的踪影。

在大外廊营的谭鑫培家里,小楼向义父陈述了禁声养嗓的经过。谭老先生听得半信半疑,从来只有用喊嗓、吊嗓来练嗓子,没听过靠不出声音静养出一条好嗓子的。

老先生半躺在烟榻上,扬了扬手:“你唱两句听听……”

小楼唱的仍是赵云那段“黑夜之间破曹阵”,果然声宏气足,高低自如,不同凡响。

“好!”谭鑫培兴奋地坐起身子,“是奎派嗓儿,又是一个‘杨猴子’!”

杨小楼的嗓子就这样奇迹般的好了起来。

周围的人们发现,杨小楼不但嗓子好了,身上的功夫也有了很大的长进。原来,他在禁声的日子里,始终没有放弃钻研表演,早晨仍然悄悄地去城外荒郊练功,下午到戏园子里看“蹭戏”,夜里则躲进小屋里冥思苦想,琢磨名角的优长,分析自己的短处,绞尽脑汁地想办法解决。一来二去,针对自己身高腿长的体形,摸索出一抬、二边、三趋、四颤的路数,在臂与腿的运用上,分别创造出独有的“猿臂”、“虎臂”、“鹤臂”、“鹰臂”、“颤步”、“盖步”、“蹉步”、“趋步”、“排步”、“偷步”,这样以短补长、扬长避短,渐渐形成了一系列适合自己条件的表演方法,高大的身躯由此显出了优势,闪现出独特的雍容、帅美的神韵。

这时的杨小楼,应该说已经较全面的具备了腾飞的条件,到脱颖而出的时候了。可是在北京这个京剧的大本营,在强手如林、元老众多、规矩森严、成见较深的环境里,一个多年没有被人放在眼里的年轻人,要以一种新的面貌闯出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前门外的庆乐园缺少武生,一个叫于惠的武丑演员全力推荐杨小楼补缺。头一天贴“杨小楼”的名字,观众反应冷淡,上座寥寥。于惠灵机一动,转头让他用“小杨猴子”的艺名贴演《铁笼山》,人们因怀念老“杨猴子”,爱屋及乌,才开始有了些反响。但这并不等于内外行承认他具备子承父名的资格了,连对他百般提携的义父谭鑫培,骑马从庆乐园门口经过,看见写有“小杨猴子”的海报,却用马鞭一指:“嘉训好大的胆子,敢贴他爸爸的外号!”

想要破土而出,需要更换一块新的土壤。

命运把天津赐给了他。

三

猴摊煎饼——乱了“套”了。

用天津卫流行的这句歇后语,形容当地曾冒出过的稀罕事,最恰当不过。两家戏园子,几乎相继贴出了同样内容的海报,同样的场次、时间,同样的戏码,主演也公然是同一个人——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杨小楼!

舆论大哗。演戏不同于放映电影,能够在几家园子之间利用时间差跑片,戏是要由真人登台的,除非分身有术,一个演员是绝不可能同一时间在两个戏台上亮相的。可是,那海报是怎么档子事?找两家戏园子去问

问,回言都说自己的海报保证没错,一准按时开演,邪了!

这大约是1902年左右的事。起因是杨小楼同时接受了两家戏园子的定银。按说杨小楼初出茅庐,是不敢出于贪财之心或故意制造耸人听闻的噱头而脚踩两只船的。艺人和戏园子打交道,信誉最为要紧,一旦失了信用,谁还敢约你演戏呀,等于把今后的生路都堵死了。事实上,杨小楼当时非常为难,对两边都不敢得罪,一再借故推托,称病不出。这说明他并非有意惹乱子,而是其中出现了某种阴错阳差,形成了两家戏园子“两虎相争”的局面。这大概也属于猜测。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麻烦事,又说明天津的演艺界是有眼光,杨小楼在北京的庆乐园一显露头角,就同时被两家戏园子的灵敏的嗅觉捕捉到了,而且都不带成见,不计较资历和名气,有一股子魄力,敢捧一个几年前还是武行班底的后生之辈。不能不承认这体现了天津卫的特点和风格,难怪梨园行都把它当作“走红”的风水宝地。

然而,两家戏园子的纠纷却越闹越火,火药味儿越来越浓。一方面各自召集人马,要大打出手;另一方面重金延聘知名律师,准备对簿公堂。非法的与合法的阵势都摆开了,颇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

这时,开始有人出头说合了。这次先出面的是一家店铺的掌柜,与两家戏园子都很熟。他原以为凭着老面子能把疙瘩解开,避免事态扩大。不料往来跑了几趟,说破了嘴皮,双方依然态度强硬。无奈,这位掌柜只好自下台阶,说出一番不卑不亢、体面退出的行话:“了事不成,不是我无能;你们事有事在,我轻拿轻放……”话虽不多,极为得体。但他撤了,僵局还在,且有愈来愈僵的趋势。终于有一位帮会中的“大辈”亲自出头了。在聚合成饭庄摆局,下帖子约请两方当事者一聚。此公资深望重,门徒极多,平时凡事不出面,只要一出山,发了话,就要算数的。两家戏园子的掌柜不敢不来,虽然坐一张饭桌上吃喝满心不愿意,也得硬着头皮应承。“大辈”等不得劝酒三杯,扯些江湖上的闲话,然后书归正传,劝慰双方几句,就推出“了事”的方案来。无非议定先在谁家出台,后在谁家上演,各演几场,占先者从经济上给予对方适当补偿,互相谦让,就不要再闹了。“大辈”的话不多,多了就失身份;当事者却不能不听,不听就是给脸不要脸,后患无穷。还不如就坡下驴,见好就收,事情就这么了结了。

风波平息,只等接角儿打炮开戏,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一下子都转移到了杨小楼身上。茶楼酒馆,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的话题都是杨小楼:这是个嘛角儿?他师父是谁?谁的儿子?愣让两家戏园子差点为他豁上命,

上法庭打官司?准有拿手的玩艺儿,要不然他们吃饱了撑的?……顺着这个逻辑推下去,越推越觉得莫测高深,越推越认为杨小楼了不得。也由于他过去实在没有什么名气,许多人没有看过他的戏,即使看过也没有注意,就更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刺激起强烈的好奇心,急于一睹为快,很快就把戏票抢光了。

观众提前进入了最佳状态,戏就好唱了。杨小楼接连推出《水帘洞》、《长坂坡》、《艳阳楼》、《挑滑车》等剧,长靠、短打、箭衣戏兼工,果然一炮打红,轰动津门。《水帘洞》中的一句“开山哪!”先声夺人,戏园子炸了窝,观众在台下狂呼:“好‘小杨猴子’!”人未出台,先认可他借用乃父的外号了。连续几场演出,剧场气氛空前火热,掌声不绝。那些天,天津卫到处在谈论他的戏,称赞他的扮相、嗓子、武功,津津有味,赞不绝口。更有人情不自禁地摹仿他的唱做,如醉如痴。在胡同里走,身后猛不丁就会有人来一句杨小楼在《艳阳楼》中的念白:“呔,闪开了!……”吓别人一跳。就连饭馆里的跑堂,端着盘子穿行于顾客中间,也爱学这一口,激起众人大笑。

杨小楼在天津红得地动山摇,震波很快传到了京城,成了各戏班子里热烈议论的中心话题。渐渐地,连过去对他不屑一顾的领班人,戏园子掌柜也坐不住了,说:“当是谁哪,把个天津卫搅得翻了江的,原来就是杨嘉训哪!按说,他的玩艺儿倒是长进了,咱们也约他唱几出吧!”于是,他人还在天津,大本营约角的人就跟上来了。当时,谭鑫培正在北京同刘鸿声唱对台,急需加强自己的阵容实力,捷足先登,约义子助阵。杨小楼一回北京,就到了他的班子里演压轴戏。以谭在菊坛的地位和声望,这一安排表明杨小楼已堪委重任了。

四

北京,同庆班后台。

这天的戏码,大轴是谭鑫培的《失空斩》,前面的压轴戏是杨小楼的《连环套》。在义父的班子里演戏,杨小楼更加兢兢业业,不敢有半点疏漏,总是提前到后台扮戏,做好上场的准备。谭老先生则从容不迫,往往到小楼的戏快演完了才到,由跟包的人员侍候着化妆。可是这天杨小楼一进后台,发现义父已经在扮戏了,不禁意外地问:“今儿个,您来得这么早啊!”

谭鑫培一边勾画着眉毛,一边回答:“啊,我晚上有事,得早点回去。咱爷俩的戏码倒换一下,我先唱,大轴改你的《连环套》。”

“这,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杨小楼一下怔

住了。同庆班的大轴是随便唱的吗?人们最后等着看的是谭老板,换了别人,万一不认可,起哄或者提前起堂(退席)怎么办?

谭鑫培似乎没有注意他的忧虑神情,勒完头,就上衣箱那儿穿行头去了。

《失空斩》唱完了,紧接着就是《连环套》。饰演黄天霸的杨小楼,到出场时还忐忑不安,惟恐台下不认帐,但他上场一看,仍然是黑压压的座无虚席,不仅没有人早退,而且给了他一个碰头好,他这才放下心来。戏一场一场地往下演,他放开了手脚,铆足了力气,表演渐入佳境,“拜山”一折的大段念白,“保镖路过马兰关”那句西皮倒板,观众都报以热烈的彩声,剧场的气氛极为热烈。

又是一场成功的演出。这是他第一次在北京演大轴戏,而且是在谭老板主持的最负盛名的班子里,份量非同小可,散戏时他很兴奋,也很庆幸,为没有给义父砸锅而松了一口气。

这时,他忽然发现义父从台侧走了过来,不动声色地打量了他一下,点了点头,说:“嘉训,刚才你见施大人那‘三跪’,再催着点就好了!……”说完,转身先走了,把他丢在那儿直眨巴眼睛。

原来,谭鑫培一直没有离开后台,也根本没有什么紧急事,就是想给他提供一个演大轴的机会,一来助他的声势,二来亲自考查他的实力和影响。老先生在台侧整整看完一出《连环套》,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幼年丧父、学戏以来一直磕磕绊绊的义子,确实是红了。同时他心里完全清楚,论小楼台上的玩艺儿,的确不错,可要是没有天津卫那一场风波,闹腾出了名气,观众是会不会在自己的戏之后,还有耐心看一个后生之辈的。如果人家不看,或者不肯当一回事的认真看,玩艺儿再好也不是白搭吗!

这就是今天所谓的“名人效应”。两年后,杨小楼的名气传入清宫,被遴选为“内廷供奉”,进宫为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演戏,倍受恩宠,身价百倍,成为梨园芸芸众生中屈指可数的“大腕”了。

天津卫两家戏园子的掌柜,要命也想不到,他们那场龙争虎斗的真正赢家,竟是那个被他们当作掌中之物争来夺去的年轻艺人。

在后来长期的艺术生涯中,杨小楼没有停止新的探索和进取,不断提高武生艺术的审美要求,文武兼备,昆乱不挡,博采众长,为我所有,终于成为继黄月山、俞菊笙、李春来、杨月楼等武生名家之后,有重大突破,唱念做打俱精的新一代武生大家。他的武功,在传统要求的冲、勇、猛、脆的基础上,一方面融入各路

拳术,讲究内功,丰富原有的武打程式和路数;一方面掌握动与静、快与慢、轻与重的辩证关系,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疾徐有致,变化自如,寓美于勇,快中见帅,而且长靠、短打无一不精。他的做工,雍容大度,细腻传神,不温不火。一招一式具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善于体现人物在规定情境中的内在的思想感情;他的唱、念,嘹亮醇厚,古朴爽朗,慷慨激昂,节奏鲜明,有掷地作金石声之妙,以情带声,声情并茂,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他在“四功”上的精深造诣和全面发展,把武生表演艺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杨小楼对武生表演艺术的重大发展,还在于他创立了“武戏文唱”的表演风格。在他以前的武生艺人,单纯强调勇猛,把火爆、冲快作为衡量艺术高低的唯一标准,不注重用各种艺术手段刻画人物个性和复杂的内心感情。谭鑫培、杨月楼虽然有所创新,但他们后来均不以武生为主,削弱了他们在武生行当中的影响。而杨小楼是终身从事武生表演的,他把武打同唱念做紧密结合起来,同刻画人物、表现剧情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从塑造人物形象和戏剧情节出发,全面运用“四功”,把武生表演艺术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为塑造典型形象开拓了广阔道路。他的戏路很广,拿手戏很多,在每一出代表作中都创造了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饰演《长

坂坡》中的赵云,被誉为“活赵云”;与梅兰芳合演《霸王别姬》,人称“活霸王”;在《水帘洞》、《安天会》中,准确地把握“猴学人”的角色特征,把一个齐天大圣演得活灵活现而又神气十足,“小杨猴子”的称号由此被世人首肯;在《恶虎村》、《连环套》等剧中,他极为生动而深刻地刻划了绿林叛徒、朝廷鹰犬的黄天霸形象,又有“活天霸”之赞许。他在舞台上表现人物内心感情之真切,给合作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梅兰芳回忆同他合演《霸王别姬》,他饰演的霸王一握虞姬的手腕,凝视悲呼:“妃子呀!……”梅兰芳的眼泪就抑制不住地涌了上来,一下子被带入了生离死别的凄然情境之中,而这感受是与别人演出时没有过的。强烈的、难以抵御的艺术冲击力和感染力,正显示出了“武戏文唱”的优势和艺术效果。

杨小楼的表演艺术,包括他的艺术主张、追求及其所创立的舞台特征和风格,构成了京剧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武生流派——杨派。

根据杨派武生艺术的巨大成就,梅兰芳在《我心目中的杨小楼》一文中,把杨小楼与谭鑫培相提并论,认为他们的表演“显示着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的趋于完整”,谭、杨的名字就“代表着中国戏曲艺术”。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杨小楼(右)便装照

编者按 “千古伤心文字狱”“八方泪洒马南邨”。这是人民日报全体同仁献给邓拓同志挽联的上下联末句。这位当代文豪不幸在“文革”中含冤离世，身后却留下血凝翰墨，泪润华章。人们捧读再三，不禁感叹不已！

不久前出版的《邓拓诗集》，是由邓拓同志的夫人、老一代新闻工作者和著名播音员、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丁一岚同志亲手搜集编辑，并撰写了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的前言。为纪念邓拓同志诞辰（1912年2月6日）83周年，本刊特转载丁一岚同志的文章，以飨读者。

诗思·诗情·诗魂

——我喜爱邓拓的诗

● 丁一岚

少年时期，在语文老师的指教下，我就喜欢学习并背诵旧体诗词，念起来词句很美，朗朗上口。那时家中姐妹时常看些旧书，几个人争相背诵《木兰辞》、《长恨歌》、《葬花吟》之类的古诗词，作为文字游戏，也颇有兴味。抗日战争爆发，我到了华北敌后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当时战斗紧张，能看到的书很少，学生时代学的东西不能再继续，更没有学习古典文学的机会。因此，对于旧体诗词我虽然爱好，但只能算是个诗盲。

到了晋察冀，就听说边区宣传、新闻岗位有位领导干部叫邓拓，还听说他是才子，写文章出手快，出口成章，写得流畅锋利；又能写诗，倚马可待；字也写得好，潇洒挺俊。

1938年，邓拓是晋察冀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1939年，我在平山县妇女抗日救国会当了报社的通讯员。因为写稿往来，我们通信了。他那热情流畅的语言，秀丽潇洒的笔迹，按现代话说，对我颇有“魅力”。通信一年后，我们相见了。

邓拓和我第一次见面是在平山县的一个小山村，相见后，月夜中他送我回住处。第二天，我就接到他的信和一首诗，诗曰《初晤》：“山村曲水夜声沉，皓月霜花落木天。盼澈清眸溪畔影，寄将深虑阿谁边？矜持语短长悬忆，怅惜芜堤不远延。待得他时行篋里，新诗绮札读千篇。”每次接到他的信和诗，我自然异常喜悦，总是仔细吟哦再三、再四，爱不释手。爱情诗常有浪漫色彩，他的一首《对花》诗，后两联是“山高路远声声怨，院静阳和日日斜。安得生成飞燕翼，轻身一掠入君家。”这些诗更增加了我对他的爱恋。以后因为我们仍在两地工作，平时只好写信，交流感情，加深了解。邓拓给

我的信感情热烈而深沉，每信必有诗，他的热情和诗把我征服了。1942年3月，我们结婚了。

1944年秋，因工作关系我们又分居两地。一次反扫荡前夕，他以诗代言，寄给我长长的《战地歌》四拍，深切地表露了真挚纯洁的缠绵情意。其中写道：“漫负笈携囊早登程，且休回首，向莽莽平沙去处舞干戈，莫念那恒岳巍巍云里人（注：邓拓字云特）。”“别离滋味浓还淡，欲诉又笺残，想将心绪谱奇弦，弹与知音人不见。”最后两句里“独立西风里，珍重复珍重！”我极其珍惜他给我的这首长诗。1948年，解放战争胜利在望，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请他把这首《战地歌》抄在丝绸上。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抄家成风。为了保存这方诗绢，我小心翼翼地把它缝在棉衣内襟里。历经漫长的十年灾难后，它才重见天日。

我喜爱邓拓的诗，当然不仅仅限于他写给我的情诗。邓拓一生大约写了500多首诗词。他的诗词风格多样，有的写铁马金戈的战斗或火热喧腾的建设，诗情豪放慷慨；有的歌唱自然美景、儿女柔情，情思绵绵，清新绝尘。这许多诗词在十年浩劫中全遭劫毁。最近这些年，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的全家费尽艰辛搜集他的诗文。现在这个集子里刊登的400多首，是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完全的邓拓诗词了。

“诗言志”，对邓拓来说，他在这方面是体现和运用得较好的。他有目的地把诗词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记得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时间不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处于初创时期，当时国家山河破碎，人民颠沛流离。邓拓在战争环境下办报，他写出了“发奋挥毛剑，奔腾起万雄，文旗随战鼓，浩荡入关东”的豪迈诗句，

热情奔放,充满民族解放的信心。他有相当多的诗配合斗争形势的发展,用来教育人民、激励人民。我认为他的诗艺术地体现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有位朋友赞叹地说:“邓拓的诗是政治和艺术结合为统一的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广大军民在生与死的斗争中历尽艰难,含辛茹苦,邓拓以诗词为武器,激励战友,鼓舞人民。

边区参议会副会长于力老先生(原燕京大学教授),关心时局,在敌人梳篦式的残酷的“扫荡”中,每天仍然能看到新的晋察冀日报,十分欣喜,特写《阅报》诗赠邓拓:“新报犹然排日来,可怜鬼子妄相摧,饶他东荡西冲猛,扫着村村裂胆雷。”报社的同志们为了坚持出报,艰难地迂回游击战斗,付出了血的代价。邓拓紧张地指挥战斗行动与编报出报,同时还从容潇洒地不忘写诗。他给于老和诗说:“挺笔荷枪笑去来,巍巍恒岳岂能摧。攻心一纸歼顽寇,更听千村动地雷。”战争中有些战友牺牲了,邓拓彻夜难眠,他含泪写出祭战友的诗句,如“塞外征魂心上血,沙场诗骨雪中灰”,苍凉悲壮。当然他并不气馁,坚定地鼓励报社同志“莫怨风尘多扰攘,死生继往即开来。”邓拓的诗思诗魂就寓于他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之中,而他不惜生命为之终生奋斗的理想,又通过他的诗词表露出来。

邓拓的诗词在边区干部中争相传诵,和他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的报社战友更加喜爱他的诗。因为这些诗词喊出了时代的、民族的心声,抒发了我们每一个战士共同的战斗激情和崇高理想。那十几年血与火的战斗生活使人终生难忘。1964年夏天,邓拓在内蒙古和两位晋察冀日报的老战友周明、方夷军见面,共同回忆往事时,邓拓写下了《内蒙忆旧》诗赠给他们,诗句是:“当年北岳起烽烟,血洒林峦夕照边。午夜蹄声惊短梦,山村灯火照无眠。马兰路上青春影,鸽子河边战斗连。廿载艰辛回首处,东风卷地换新天。”后来许多战友看到这首诗,都很喜欢,纷纷请老邓书写下来,装裱好悬挂在室内。谁能料到,1966年“四人帮”妖风泛起,老邓写的诗成了这些战友们“参与”“三家村反党集团”的罪证,诗幅被没收或撕毁,有关战友惨受折磨。诬陷与残害革命者的狂人们,肆意歪曲诗句,假造罪证,编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这些狂人是多么无耻、疯狂,又是何等愚昧呵!

战争年代过后,邓拓又以他的诗笔歌颂祖国建设,抒发对祖国壮丽河山和悠久文化的热爱。现有400多首诗词中,绝大部分是1949年后写的。如《歌唱天安门》:“举国欢腾起舞时,天安门下动遐思;春秋大事书万卷,不教英雄纪念碑。”《颂十三陵水库》:“群山环抱



开国大典,丁一岚和齐越(右)曾担任现场播音。
1985年,又重上天安门

平湖,碧云绿水江南景;飞来北国,妆扮原野,浑成妙境。四十万人,半年劳动,功勋彪炳。看帝陵寂寞,沧桑一变;天与地,都惊醒!”(节录《水龙吟》上半阙)类似这样的内容的诗词,在邓拓诗作中不胜枚举。

邓拓酷爱祖国的壮丽河山。由于采访、视察、养病,他到过不少地方,游历了祖国不少名山大川。壮丽的山河触发着邓拓的诗思灵感,这方面的诗约有一百五六十首。他真像个行吟诗人,一路调查访问,一路观赏,一路吟唱,写出很多组诗,如《长江旅途口占》、《江南吟草》、《南游未是草》和《内蒙吟草》等等。这些诗仿佛随口占来,轻松别致,浮想联翩,字里行间处处露出诗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情怀。随便介绍两、三首,如《捣练子——勘川中记者》:“毛锥动,彩云生,蜀水巴山若有情。展望高潮奔日夜,文章常助百家鸣。”短短的27个字,生动地描绘了山河美景,大好形势,并且对新闻工作者提出鼓励与期望。《访郑板桥故居》:“歌吹扬州惹怪名,兰香竹影伴书声。一枝画笔春秋笔,十首道情天地情……”全诗50几个字,充满激情地赞美了他所喜爱的画家、诗人郑板桥和秀丽的江南风光。邓拓的一位诗友陶军同志对邓拓的诗曾有中肯的评论:“邓拓自幼酷爱大自然好山好水,酷爱祖国壮丽的

河山。他对大自然的热爱是和他对于中华民族、神州大陆，尤其是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新面貌的热爱是融合交织在一起的，是构成邓拓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邓拓的诗词中内容涉及方面较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其中有一部分是受报刊编者催请的文字债，由于时间紧迫，仓促应酬，有的难免在艺术上显得简单草率。但他写诗的态度一直是认真求实的，在这些诗里也不乏警句箴言。

有一些诗，虽然不多，但对于了解邓拓的思想感情和他的诗词的特色却很有意义，有必要说几句。邓拓一生几次身处逆境，诗，是他内心情愫的倾诉。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开封因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两次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残酷的折磨，丝毫没有消磨他的斗志，他凛然无畏地发出“去矣勿彷徨，人生几战场。”“大千朵犹绝，一士死何妨”的豪言壮语。当时家国残破，令人惆怅，他低吟着：“只身天地余残泪，一眼河山尽断魂。”但是支持他的崇高的信仰仍然坚定如山，他执著地自信“生死浮云浑一笑，人天义恨两无穷。收来病骨归闽苑，莫对清江看冷枫。”经过几十年的浴血斗争，全国解放了，到处是欢腾景象，祖国应该走向昌盛繁荣了，还能有什么忧虑呢？但是没料到五十年代后期，在复杂的党内斗争中，他又一次身处逆境。1958年他被撤下了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职务。他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应对。那时，他只能间或在诗中委婉地抒发他的郁闷，为自己作几句申诉。1959年初，他告别《人民日报》的同志们时，心情沉重，激动地给大家念了一首诗：“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曲指当知功与过（丁注：其实何过之有？），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邓拓为革命事业奋斗几十年，他了解我们党在斗争中成长、壮大的历史。但是当时极其特殊的政治斗争使他感到茫然，他仍然不乏“书生”的执拗和天真。他严守党的纪律，从不随便诉说，但心头抑郁，只有诗才能抒发一点他内心的怨苦，这样的诗曲折幽婉。1965年，在我们的祖国、党和他个人将遭受劫难的前夕，他有一首诗以《记梦》为题写出：“五更风雨梦如飞，烟水苍茫夜色微。话到海山无滴泪，写来笔墨不沾衣。高情消尽千秋怨，碧血凝成万古诗。默向长空寻新路，霞光雾映春晖。”这首诗让人读来心痛，但是坦率地说，当时我并不完全理解他的苦衷。他有一首《颂山茶花》的诗，诗中末句说“断骨留魂证苦衷”，不幸地预示了1966年他最后悲惨的结局。

邓拓生前我没有给他写过诗，1979年“三家村”冤

赠孙方山同志（一九六四年作）

案平反后，为邓拓举行追悼会（这时他已含冤去世13年了），我含泪给他献上一副挽联：“山海风波，心盟永忆。万家恨雪，云际长明。”作为对他31年前写给我的那首“山海风波定白头”诗的应答。

文章本不想写长，但提起笔又有许多话要说，整篇是“夸夫”之词，有些不好意思。当然我知道有相当多的同志和读者喜爱并赞扬邓拓的诗，并不是我个人的偏爱。我现在已年逾古稀，邓拓作古已近30年了，已经“盖棺论定”，我夸夸也无妨吧？！

（责任编辑 王 恂）



张旭明，忠州人，是闻名中外的大画家张大千先生的得意门生。他精心画成的《五虎仕女图》，用工笔重彩的手法，栩栩如生地再现了苏州网狮园内大千先生住处一妙龄女子在五只雄狮和三只胖胖的虎崽的簇拥下亲昵偎依的情形。因此，这幅画亦称《雄狮美女图》或《五狮三虎仕女图》。

画面中央的这位仕女，体态轻盈，婀娜多姿，流露出对虎、狮爱抚的眼神。她的一只纤细柔嫩的手正轻轻地抚摸着冲到她跟前撒娇的一头雄狮；另外四只雄狮也跃跃欲上，十分活泼。前面还有三只胖生生的虎崽，摇着尾巴，挤到她的怀边蹦跳着。画面十分生动感人。

这幅画还有着一段传奇故事。

十几岁的张旭明进入上海美专深造，名画家马孟善还介绍他到全国著名的国画大师张善孖、张大千门下学画。后来善孖、大千又迁居苏州网狮园，命画室为“大风堂”。

苏州网狮园内风景如画。张旭明朝夕观察四周景色，不时写生作画。他三更就起，夜深才睡，十分勤奋，深得二位恩师赏识。有时，两位大师外出游历作画，旭

明常伴随左右。这样耳濡目染，深得两位大师真传。

善孖、大千在沪、宁、杭、穗、黄山及日本东京、大阪等地举行画展，常命旭明作画共展，已见其不凡。其间，常有书画鉴赏家称善孖、大千、旭明为“蜀中三张”。到1933年在黄山举行“三张”盛大画展时，旭明画技已相当成熟，并刻有“大风堂弟子”印章盖于画幅之上，以感激两位恩师教诲之功。

随同他们搬进网狮园的还有一位“稀客”，一只外貌凶猛异常，其实却异常驯服，很懂人性的七、八尺长的东北虎。这只生着扁担花的吊睛白额大虫，之所以会成为张善孖、张大千兄弟俩的爱物，是因为它是两位大画家笔下生风、活龙活现的宠物。

张旭明学画之余，还担负着饲养这只老虎的任务。也许是张旭明心有灵犀一点通，也许是这只老虎颇有人性，他俩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只要他一声口哨，这只老虎便招之即来，按他的口令立起、扑食、剪尾、卧倒、逗乐。总之，张旭明没有辜负两位恩师的重托，把这只老虎驯化得象一条听话的家犬一样；他甚至可以说叫老虎张开血盆大口，把手伸到口里摸它的舌头，它都

不咬，日久天长，这只东北虎长成丈余长，威风凛凛，既不怕人，又从不伤人。

有时，它和旭明玩得高兴了，长啸一声，声震环宇，引得整个网狮园嗡嗡作响。这只老虎常随着旭明在园内的假山便桥上闲逛，在水池边戏水荡漾。旭明甚至骑在老虎背上兜风，偶然被进园的客人看见，吓得目瞪口呆。不久，这只老虎因贪吃一只吃过死老鼠的花猫中毒死去，令张旭明感伤不已。

忧伤之余，善孖先生又从朋友处买得一只虎崽。大千先生闻讯大喜，特地作了《小虎游园图》。这一回，旭明饲养老虎更加细心。凡老虎吃食均由他一人负责办理，将这只虎崽养得胖胖的。

在大千先生的指引下，旭明每天从园内各个不同的角度观看小老虎的跑、卧、跳、剪等动作、表情和眼神，天天对虎写生。现实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由于长期同老虎生活在一起，使他对老虎的习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世人常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世人都晓得老虎的凶猛，却不知老虎喜欢主动接近人，与人亲昵的一面。一次张旭明逗老虎玩时，试探着把手慢慢伸进张开的虎口。老虎眨着两只明晃晃的眼睛善意地望着他，把嘴张得更大。这只颇通人性的老虎歪着头，得意地靠在旭明的头旁，一边用那粘滑、温热的舌头舔着他的手；一边呼呼作响，从肠胃里噎出一种消化食物时特有的难闻的腥臭气息。旭明强忍着差点要吐的恶臭，把头同老虎更亲热地靠在一起，进行着一场令人胆颤心惊的人与虎之间感情的交流。温驯的老虎十分惬意的闭上了眼睛，它知道它的主人绝不会伤害它。于是他定下心来，脸不变色，心不跳，继续轻轻地把手伸得更深，甚至感到老虎卷起横梗的舌头根既软又硬；他要把手抵向老虎的喉头。也许是老虎觉得主人的游戏过了头，也许是手抵住喉头出不来气；老虎才轻轻呷了他一口，在手背上留下了几个令旭明永生难忘的暗红的齿印。张旭明经过这场灵与肉的搏斗，终于明白了老虎的心。

从此，他的虎画风格大变。不管是呲牙裂嘴吞食的虎，还是登上高坡怒吼的虎；不管是四爪扑腾，钢尾剪人的虎，还是四蹄按地威气慑人的虎，眼睛里都有一股子灵气，都富有某种人性的表情。善孖和大千看了，也觉得画虎画到这份上，算画活了，心里很是赞赏。

张旭明画虎是为了提高画艺，孤芳自赏。他心里时刻记住两位恩师的教诲：耐得大寂寞，才有大出息；守得住清贫，才有大作为。因此，他画的画，从不送人，更不卖钱。

五年过后，网狮园内，春日融融，百花吐艳。园南松林下，两位恩师拿出珍藏多年的茅台酒，并备时鲜酒菜瓜果于树旁石桌之上，把盏品味，观画谈艺，祝贺高徒旭明满师。

酒过三巡，两位恩师已有七、八分醉意，便要旭明当面再画一幅虎啸图。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两位恩师有意要考考这位高徒，看他手艺究竟如何。

张旭明掏出文房四宝，从筐中拿出一张宣纸，铺在地上，暗暗沉下心来构思。说也凑巧，恰好这只母虎带着两只小老虎闻着香气，搜索着来到石桌底下，啃那些丢在地上的骨头。啃完后，还追逐阳光下婆婆的树影。送菜而来的大千夫人，急忙将虎赶开。可是，无论你怎么赶也赶不走。原来，这群老虎平时被旭明等宠惯了，认为是大千夫人逗着它玩呢。因此，越是赶，毛茸茸的老虎崽越往怀里钻。惹得大千先生哈哈大笑。

旭明一看也乐了。此时不画，更待何时？心灵手巧地旭明凝聚神思，笔走龙蛇，顷刻间勾画出这幅《三虎仕女图》。他笔一顿，看到自己刚刚画出的三个虎崽围着仕女撒欢，准备题款上印。大千先生轻捻银须低沉地说：“旭明，再画上五只雄狮不好吗？”旭明不知其故，善孖先生喃喃地在一旁开导说：“大千先生的意思是我们的民族很弱，但总有一天要作为一头雄狮立于世界的东方！”



《五虎仕女图》局部 张旭明绘



《晚山云生图轴》张大千作

旭明受恩师指点，急挥而就，画出了五只向仕女围拢来的威风凛凛的雄狮。大千恩师一见，更是喜从中来，当即赏给他三大杯酒。旭明直醉得歪歪倒倒。席散后，他拿着这幅画漫步走出网狮园细看。不料被一位过路的古董外商看见，如获至宝，哪里肯放，当即软缠硬磨，用黄金百两买下。

第二天旭明酒醒后，拿着这百两黄金去见恩师善孖和大千先生，准备作谢师之礼。两位恩师横竖不收。声色俱厉地问：“金从何处而得？”旭明无奈，只好如实道出。善孖和大千先生听了，气得直跺脚，歪扭着脸，没好气地说：“我们还正准备给您画上题诗留念呢，你倒送人了。那好，你用不着给我们学画，你去给别人当钱串子去吧！”这一席话说得旭明羞愧难言。他跟两位恩师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他们发这么大的火。他连忙带上百两黄金千辛万苦找到那个外国商人，把这幅画又赎了回来。

大千先生捧着这幅画，感慨万千，手微微颤抖，沉吟半晌，没有作声。旭明自知做了错事。悔恨不已，扬起巴掌狠狠给自己脸上一掌，几乎要哭出声来说：“大千恩师，我真糊涂啊！”

大千轻捻银须以和缓的口气说：“画收回来了就好。”回四川的路费已为旭明准备好了。旭明含泪跪在地上要恩师题字。大千一把将旭明扯起来宽慰地说：“画上不题了，我送你一张条幅。”旭明接过一看，只见条幅上写着两行大字：“大千愿受贫和苦，黄金千两不画虎！”旭明顿悟，当着两位恩师立下誓言，一戒画虎，二戒饮酒！

善孖、大千见旭明真心悔悟，喜不自禁，大千恩师语调和缓而诚挚地说：“世界无量无边，空广微深，千差万别，包罗万象。而善画者，要胸列万物，摒除物欲杂念，观广探微寻幽，用一只出神入化之笔，将己之大千世界融入世之大千世界。这就是我的临别赠言！”

旭明感激涕零，热泪盈眶。眼前的一切化作了一片多么美好的大千世界，多么纷纭复杂、广漠无边的艺术的大千世界啊！

（责任编辑 赵友慈）



《驯虎图》张善孖作

约590年前，郑和率领船队七渡重洋，揭开我国航海史辉煌的首页；今天，我国海军飞越太平洋，走向世界，举行了跨世纪的远航——

“郑和”号舰 下西洋

● 刘永路



1994年“八一”前夕，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远洋航海训练舰，在第38次破浪远航中度过了7岁生日。至此，她已14次南下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行12万余海里，几乎等于绕地球6圈！这艘舰命名“郑和号”，舷号81，交融着历史的辉煌和时代的风采，数次集体立功，开创人民海军单舰航程最远、在航率最高、所经海区港口最多、出国次数最多的4项纪录，成为中国海军走向世界、走向太平洋的先锋。

巴林塘海峡奇遇。美国航空母舰编队包抄而来，“郑和”号舰官兵沉着冷静，美国人表示钦佩和敬意

巴林塘海峡。1992年3月9日上午，一艘悬挂五星红旗、八一军旗的大型军舰航行在这个太平洋的咽喉要冲。

8时45分，左舷前方出现一架美国F/A18大黄蜂攻击机。15分钟后，2架侦察机从正前方超低空飞来，同时，在周围3海里范围内，还有5架战斗机凌空盘旋。渐渐地，周围海面出现了7个运动着的大、中型目

标。

“郑和”舰与美国小鹰级航空母舰编队在太平洋不期而遇了。

美舰施放电子干扰，我舰雷达荧光屏上雪花一片。

“你们是中国海军舰艇吗？”甚高频电话里传来美航用汉语发出的询问。我舰年轻的见习副舰长唐波用流利的英语回答：“我们是中国海军八一训练舰，正在进行学员远航实习训练！”

“我们也在这个海区训练，愿与贵舰同行”。美军说完，不待我舰回答就关机。顷刻间，一艘曾在两伊战争时打下伊拉克客机的美军巡洋舰从我舰右舷直插而来。离我舰300米时，美舰“哗”地向左大转向，经我舰后方绕到左舷，与我舰等速航行。美军舰只在我舰周围散布开来，将“郑和”号舰围在中间。

“郑和”号舰舰长在驾驶室镇定自若地指挥着军舰按既定航向前进。我舰全体官兵在各自的战位上正常操作。一位少将走进驾驶室，朝起劲折腾的美国人看了一眼，嘴角浮上一丝若不经意的微笑，回到一号教室。他是大连舰艇学院的院长，此刻正在主持三个教室的200余名学员的实习考试。尽管美国人在周围翻江倒海，但考场却秩序井然。事后得知，这次考试成绩好得



印度西部海军舰队司令拉久中将与中国海军“郑和”号舰指挥员互赠礼品

出奇,优良率超过80%。难怪这位院长感叹:这才是真正的考试,不仅考出了过硬的专业技术水平,更考出了军人所应具备的那种沉着冷静、处事不惊的基本素质。

近两个小时,美舰编队离开我舰。临行前他们再次打开甚高频:“贵舰训练有素,不愧是中国海军的骄傲,谨向贵舰官兵表示钦佩和敬意!祝你们一路顺风!”美舰鸣笛向我舰致意。

“祝你们一帆风顺!”“郑和”号舰拉响汽笛向美舰回礼,驶向更远的大洋……

当年,张学思将军在“东方”号商船上立下的誓言,在“郑和”号舰上得以实现,海军有了“海上大学”

时光拉回40多年前。

1950年寒冬,渤海湾海面上翻卷着昏黑冰冷的浊浪,一条并不引人注目的商船——“东方”号悄然驶过老虎滩附近海域,船上站满了身穿单薄棉衣的军人,他们是大连海校(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前身)第一批学员,正在进行海上实习。当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陆军已赴朝作战,而人民海军仅有的军舰却都用于对付台湾国民党军队的沿海袭扰,亟待培养的海军作战指挥人才,却只能租借商船在狭窄的渤海湾里进行海上实习。率船实习的年仅34岁的张学思将军心潮难平,他当众立誓:总有一天,我们要驾驶世界第一流的军舰走向远海大洋!并向学员提出一个口号:“海上为家,岸上作客!”

历史的航船驶进了20世纪末,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海军鼓起向大洋进军的蓬帆。可是,当破冰船驶向人迹罕至的南极洲,核潜艇载着洲际导弹驶向遥远的南太平洋的时候,海军院校学员的海上实习,却依然是乘着陈旧舰船,徘徊于我国近海沿岸。培养现代化海军人才与落后的实习舰船产生了强烈的冲撞。教官们大声疾呼: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海军何以走向大洋?

素有“海军军官摇篮”之称的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提出的“造院校实习舰,办海上大学”的论证报告,深深打动了共和国海军的决策者们。

1987年4月,我国第一艘远洋航海训练舰在上海求新造船厂下水,交付海军,归属张学思当年任校领导的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于是,“中国军校第一舰”光荣诞生了。她以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的名字为舰名,以我军光辉的诞生日“八一”为舷号。当年,张学思将军在“东方”号商船上立下的誓言终于得以实现。

这艘长132米、排水量6000吨级的现代化新型军舰,可单舰环球半圈无需加油。舰上设有卫星导航仪和GPS全球定位系统等先进的导航设备以及全自动火炮、火箭深弹发射器等武器装备,并设有教学指挥中心和教学彩色闭路电视系统。学员在这艘舰上,可同时进行航海、观通、机电、武备、船艺、医疗等40多个科目的实习训练。从而,使海军学员的海上实习由以往的近海单项航海实习发展为远航综合实习,适应了海军院校培养高技术、高层次人才的需要。

“郑和”号舰交付使用7年,已完成海军指挥学院、大连舰艇学院、广州舰艇学院、潜艇学院、海军工程学院和海军高等医学专科学校等6所院校36批6000余名海军学员的远航实习任务,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大学”。

“郑和”号舰跨越180度子午线横渡太平洋。美国海军惊呼:这是中国海军由近海防御型的“黄水海军”向远洋作战型的“蓝水海军”的历史性转折

1989年4月8日7时45分,在北纬20°57'的太

平洋洋面上，首次代表共和国海军访问美国夏威夷的“郑和”号舰，昂首越过180度子午线，单舰进入西半球。就在这历史的一刹那间，一位年轻的水兵大步跑向舰首（因为军舰长达130多米，舰首是最先“压线”的部分），兴奋地呼喊，他是第一位过180度子午线的中国水兵！一位随舰实习的学员，把一枚“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校徽用锡片层层密封好，沉入海底，他说这是永久的历史纪念！58岁的教练舰长冯缙枢，在全舰官兵举行的中国军舰首次进入西半球纪念仪式上慷慨陈词：“过去中国人谁瞧得起，现在中国人谁敢瞧不起？！我们要把中国人的豪气和威风抖到西太平洋上去！”

4月12日9时许，舰首挂着红色花环的“郑和”号舰，带着中国海军的豪情和中国人民的友谊，驶入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引发了太平洋战争的著名军港，接受了满旗高悬的各种美国军舰和美国官兵的敬礼。友好中也带有挑战。在中心泊位第26区，美国人留下一个刚好等于“郑和”号舰长度的泊位，两端停满了各种舰船。他们备下两艘拖船，打算把“郑和”舰顶靠码头。教练舰长冯缙枢对美国引水员礼貌地说：“我们自己靠！”语气带着中国军人的自信和尊严。

码头上，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杰里迈亚四星上将、第三舰队司令多塞中将等十几位美国海军高级将领和数千名美国官兵，还有夏威夷州州长韦西等社会名流数百人，屏息凝神地注视着中国军舰靠码头的第一个动作。冯缙枢，这位曾是共和国海军最年轻的舰长，而今最老的舰长，镇定自若地指挥“郑和”号舰驶入码头，连下几个干净利落的口令：“停车！倒车！左满舵！”

“哗！”庞大的军舰严严实实、稳稳当当地靠上码头。与此同时，3名中国水兵潇洒、漂亮、准确地撒缆，也使在场的美国人惊讶不已。顿时，岸上军乐齐奏，礼炮轰鸣，“OK！”“OK！”的叫好声响成一片。一位记者现场报道：中国“郑和”号舰以高超的技术和良好的素质，给爱挑剔的美国海军留下了深刻美好的第一印象。

“郑和”号舰单舰横渡太平洋，越过180度子午线进入西半球，全世界都吃了一惊！美国海军惊呼：这是中国海军划时代的里程碑，标志着近海防御型的“黄水海军”向远洋作战型的“蓝水海军”的历史性转折！

“郑和”号舰在海外展示雄姿风采，引起各国水兵的羡慕和海外赤子的自豪

“郑和”号舰停泊珍珠港期间，1000多名美国海军官兵和夏威夷市民登舰参观。此外，还有700多名华侨、留学生和专程来夏威夷的台湾同胞登上这块祖国的浮动国土，感受祖国强大的自豪和乡情的温馨。参观结束后，许多人仍不愿离开，与随舰实习的学员亲切交谈。还有的全家人站在舰尾的“八一”军旗下合影留念。他们说：“在美国土地上看到祖国的军舰，有说不尽的亲切和自豪”。

12月5日，是泰国国庆日。1990年和1993年的这个日子，“郑和”号舰两次跨越暹罗湾，访问了这个古老王国。泰国有400万华人、华侨，他们视“郑和”号舰的到来，象“娘家”来了亲人那样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郑和”号舰的照片和来访消息，被登在各家华文报纸的最显著位置。一位92岁的潮州籍老人，在水兵的搀扶下，颤巍巍地走上舷梯，他抚摸着粗壮的炮筒，眼噙泪花地说：在临终之前，能看到祖国军舰，踏一踏故乡的“国土”，死而无憾了。另有三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上了“郑和”号舰久久不愿离去，他们兴奋地对笔者说：“以前我们只见过外国军舰去中国，今天终于见到祖国军舰来海外，祖国强大了，我们华侨感到扬眉吐气呀！”

“郑和”号舰访问印度期间，一位叫廖水生的爱国华侨，全家七口老少三代都登上了“郑和”舰，只要见



泰国海军用敬献花环方式欢迎中国海军访问曼谷



孟加拉海军乐队与“郑和”号舰乐队合奏《友谊地久天长》

到背照相机的人就不肯放过，他对笔者说：“我自祖上到印度定居已有200多年，今天第一次见到祖国的军舰，一定得留下终生纪念！”为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而光荣牺牲的柯隶华大夫的弟弟、妹妹们，也兴奋地踏上了“郑和”舰，和中国水兵合影留念，他们反复比划着用印度语说：“中国——朋友，中国——亲人！”

“真羡慕你们，有这么先进漂亮的实习舰！”印度、泰国、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海军官兵和学员登舰参观后，对随舰实习的中国学员啧啧赞叹，称道不已。泰国皇家海军学院院长对大连舰艇学院院长说：“我多么希望有一天，也能乘驶和你们一样先进漂亮的实习舰，访问美丽的中国！”

“郑和”号舰首次驶入印度洋。 阿拉伯海大写意。印度航空母 舰高奏《义勇军进行曲》

1993年10月15日，“郑和”号舰满载250多名官兵和实习学员，在湛江解缆起锚，踏上了访问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度、泰国南亚四国的友谊航路，首次由太平洋进入印度洋。

指挥舱里，舰长刘国桢中校瞪大眼睛，注视着航行定位仪，焦急地等待着一个时刻的到来，当舰首压过马来半岛的勃拉藻角和苏门答腊岛的哥打拉查角连接线时，刘舰长大喊一声“拉！”汽笛拉响，随即，舰广播室传来大连舰艇学院院长的讲话：我舰已通过太平洋进入印度洋，时间：1993年10月20日17时45分！中

国海军史将记住这个时刻！

“印度洋，我们来了！”学员、水兵一起涌上甲板，挥舞军帽，高声大喊，都想在这里第一个留下自己青春的声音。水兵刘守鹏即兴赋诗一首——《久违了，印度洋》，诗中写到：“不要说我们第一次来到你身边/我们的祖先曾耕耘过这一片海蓝/今天历史已揭开新的一页/大海的骄子又向你提出挑战……”

1993年10月25日，“郑和”号舰在孟加拉海军F15护卫舰的引导下，缓缓驶入吉大港。

“郑和”号舰抛向吉大港的第二根缆绳刚刚系紧，国际信号班长王方全就发令：“升旗！”

为了表示对被访国的尊重，军舰在靠码头完毕后必须迅速地挂满旗，其升旗速度可反映出舰员的素质和训练水平。当年某国军舰在访问青岛时，挂满旗用了近1小时，而我国的海军呢？只听哗啦啦，全长180米共65面各色彩旗纵贯全舰高高挂起，时间仅仅1分钟！码头上军乐齐奏，车辆停驶，行人止步，军人立正敬礼。

大海和音乐将两国海军军人的心连在一起。

11月6日晚9时30分，“郑和”号舰抵达距巴基斯坦60海里的阿拉伯海，前来迎接的巴方3艘驱逐舰与我舰汇合。我舰正准备起锚，突然发现前方神秘惊险的阿拉伯海面顺流漂来了两张巨大的“流网”，此时一旦启动，就会将动力装置缠死。

指挥员果断地命令：“不动车，不启锚，等待。”

鱼网很快将舰体前后左右缠住。巴方闻讯后，立即派潜水员乘小艇过来解围，因夜黑流急，巴方潜水员仅将露在舰外面的鱼网割掉，剩下的只好等明天再说。

第二天早晨，指挥员立即召集会议，商量自己动手把这片鱼网割掉。为人师表、水性好的大连舰艇学院气象教研室主任吴文凤副教授坐不住了：“我下！”

年过半百的吴教授仅戴着一副水镜，一双脚蹼，一把水手刀就下海了。他下潜15次，将舰体四周全部清理得干干净净。

“郑和”号舰顺利地启动了，踏上了开往卡拉奇的航程。当通过盖西姆保岸防要塞时，巴、中双方互放礼炮13响，又有3艘小艇加入迎接编队，为“郑和”号舰开道，小艇尾部喷出彩虹状的水柱，欢迎中国海军年轻而高贵的客人。

“郑和”号舰进港了。这个港池长和宽只有200米，巴方曾在这里将无数条舰船引入港口，但如需调头，就只好靠拖船一点点地“拱”。

可这难不倒“郑和”舰。“准备调头！”舰长刘国桢一声令下，随即，连下5个舵令，原地180度转向，首尾相换，顺势稳稳地靠上码头。使巴方引水员惊叹不已！

“郑和”号舰进入印度近海，迎面就见到一座“海上城堡”，片刻，学员们不约而同地喊出声来：“航母！航母！”这就是“维拉特”号航空母舰。印度是亚洲唯一拥有航空母舰的国家。

“维拉特”号航空母舰是由英国制造的。1953年由丘吉尔夫人剪彩下水，编入皇家海军，原名为“竞技神”号。1982年英阿马岛之战中，担任英国特遣舰队旗舰。1987年5月12日，以两亿美元的价格卖给印度海军。该舰有句格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强大无比！”

在“维拉特”号航空母舰宽敞的后甲板上，印度西部舰队司令拉久中将举行晚宴，欢迎远道而来的中国海军军官和学员。

宴会结束，军乐队奏起两国国歌。“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义勇军进行曲》伴着印度洋的轻浪、晚风，第一次在航空母舰，但不是我国的航空母舰上响起……

年轻的军官和学员们不禁感慨万千，议论纷纷：我们要真正走向远海大洋，就必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造就世界第一流的航空母舰！……

在荣誉和风采的背后，却有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付出。一位妻子临产前千里奔波，为赴柬埔寨运送维持和平部队的丈夫生下小“高棉”

“郑和”号舰是我国海军在航率最高的军航，每年约有2/3的时间航行于海上。于是夫妻分居、官兵休假就成为最成问题的课题。曾荣获全军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教练舰长冯缙枢，25岁结婚，61岁离舰，在这期间，他和妻子陈敏一直过着牛郎和织女的生活。“不知道你走不走？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走？不知道你回不回来？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是50年代冯缙枢和陈敏

看过的苏联影片《蓝色的道路》中，舰长妻子的一段独白。陈敏，这位曾在话剧《马兰花》中饰主角小兰的上海儿童剧院的女演员，把这段话默默诉说了35年，只有她才能从丈夫的海一样深邃的目光中，寻找出别人看不到的答案……

1994年初夏，曾被“郑和”号舰运往柬埔寨执行维持和平任务的我军第一支“蓝盔”部队领导人高军上校来到大连，笔者陪他再次登上“郑和”号舰。

“你的孩子好吗？夫人平安吗？”高军上舰遇见第一位熟人，开口就问。

此人是“郑和”号舰勤务主任高德利。两年前，接到赴柬埔寨运送“蓝盔”部队的紧急命令时，离出航时间只剩下7天，而他妻子邹正萍的预产期恰巧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丈夫要出海，妻子谁照顾？舰政委咬了咬牙，特准高德利3天假，要他把妻子送到千里之外的徐州老家托付母亲照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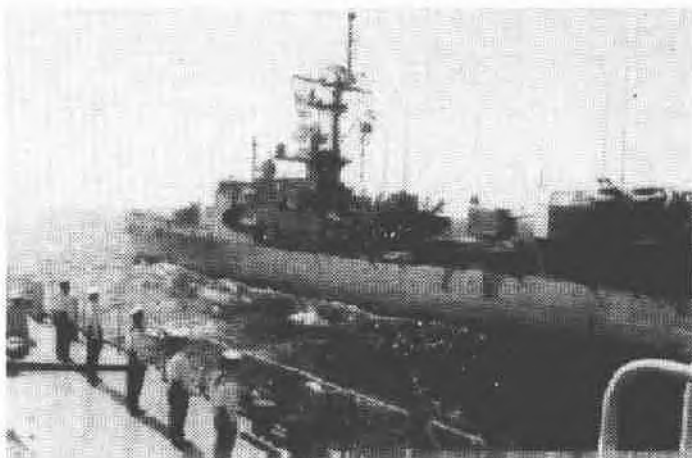
“郑和”号舰荣返祖国湛江的当天，便接到大连舰艇学院院长打来的长途电话：高德利的妻子和副枪帆长王明晨的妻子于4月27日——“郑和”号舰抵柬的第三天，一同产下一对“千金”。不过，高德利的妻子高烧至今未退。舰党委当即决定命高德利乘飞机赶回大连。

“萍，你辛苦了！”二一〇医院病房前，高德利俯身紧紧握着妻子的手，心里一阵阵痛疚。

“德利，你也辛苦了！”邹正萍苍白的脸上露出笑容，“我盼着你回来，好给孩子起个名字呢！”

高德利想了又想：“就叫高棉吧！与柬埔寨高棉族同音同意，让孩子永远记住这不平凡的经历！……”

（责任编辑 王 恂）



“郑和”号舰驶离卡拉奇港，巴基斯坦驱逐舰百里相送

横扫六合军威壮

——秦兵马俑2号坑发掘揭秘

● 王兆麟

1994年，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喜事重重。3月，是秦俑发现20周年；10月1日，是秦俑博物馆开馆15周年；10月中旬又添一喜——秦俑2号坑发掘现场对外开放。

发掘仅七个月即开放迎宾

10月14日上午，在新近建成的秦俑2号坑保护陈列大厅东门外广场，一个将被载入中国文化史册的盛大仪式，世所瞩目的秦俑2号坑发掘现场对外开放典礼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从北京专程前来为开放仪式剪彩。文化部副部长徐文伯、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和陕西省、西安市负责人以及各界人士千余人，满怀喜悦地出席了开放盛典。2号坑的神秘之门终于向亿万仰慕者敞开了。

秦俑2号坑自1994年3月1日正式发掘以来，俑坑的形制已清晰显示，一些重要遗迹、遗物陆续出土。俑坑的北半部先行发掘，已清理到俑坑顶部的棚木遗

迹层，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这些棚木均为粗大的松、柏木，除一部分在秦末被项羽所焚，呈黑色炭迹，大部分保存较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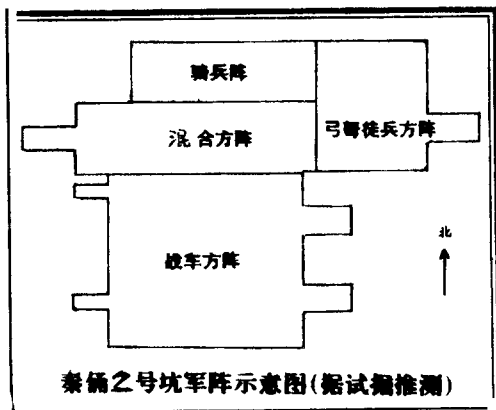
现今共已清理出70多件陶俑、陶马，其中有骑兵的鞍马21件，拉车的马7件，骑士俑14件，立射俑19件，跪射俑16件。由于俑坑顶部塌陷，这些陶俑陶马均被压碎，但仍在原位，未曾被盗掘、扰动。

东西两边的斜坡门道已清理出5个，门道底部车轮碾压的车辙、秦人踩踏的路面等遗迹，清晰可见。在西北部门道的内口和长廊部分，还发现大量的青砖及砖坯等秦代遗物。所有这些遗迹，为研究秦俑坑的建筑结构提供了较完整的资料，在建筑史上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用简单的工具“洛阳铲”探出了2号坑

自1975年8月国家决定在秦俑坑遗址上建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并于1979年秋正式对外开放以来，1、3号坑先后对外展出，唯有2号坑始终没有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原来当1975年秋国家着手在农民发现的秦俑坑遗址修建保护陈列大厅时，秦俑考古队根据在已发掘的俑坑上基建施工不好继续发掘的情况，便组成一支支小分队，寻找新的秦俑坑。他们手持长约2米，铲头弯成半圆形的“洛阳铲”，向地下钻插一次可以进深三、四寸，往上一提，就把卡在铲头半圆口的土和异物残片原封不动地带上。这样不断地向下钻插，就得到了不同土层和包含物，从而判断地下有无文物遗址，是什么样的文物遗址。他们就是靠着这些不起眼的传统工具，于1976年4月23日，在农民已发现的俑坑东北约20



秦俑2号坑军阵示意图（据试掘推测）

米处，探出另一个兵马俑坑。同年5月11日，在农民发现的俑坑西北约25米处，又探出一个俑坑。三个俑坑呈“品”字形分布，考古队按其发现先后，分别命名为1、2、3号俑坑。

这里有个外界未知的情况：1975年夏，秦俑考古队在发现2、3号坑之前，还发现了一个坑，它位于2、3号坑之间，是个未建成的废弃坑。秦俑博物馆馆长兼考古队队长袁仲一认为，1号坑是右军，2号坑是左军，3号坑是军幕（指挥部）。这个废弃坑，从它的位置看，很可能是拟议中的中军，从而构成一组完整的军阵编制系统。这个坑中没有陶俑、陶马，甚至连夯土和棚木都未找到。其原因很可能是它未及修建，项羽就打进了关中，秦王朝很快就崩溃了。

地下布局内涵早经探明

使一些读者感到不解的是，2号坑在1994年3月1日才开始发掘，为什么有些新闻报道就把地下情况说得那么有鼻子有眼？

这倒不是记者们信口开河。原来考古队一旦探知这里有俑坑后，使用“洛阳铲”进行密集钻探，并对1/4的面积进行了试掘，从而基本弄清了2号坑的范围和地下内涵，但为了保护好2号坑遗址和地下文物，考古队于1977年8月底试掘结束后，全部回填，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3个俑坑各有特点。1974年夏开始发掘的1号坑，为大规模的步兵军阵，面积最大（总面积1.42万平方米）、数量最多（共有6000多件兵马俑），以气势雄伟壮观著称。全部发掘并于1989年秋开始展出的3号坑，虽面积最少（仅520平方米）、数量最小（只出土兵马俑72件），但为统率全军的指挥部，地位重要。至于1976年春发现的2号坑，平面呈曲尺形，面积和藏俑数量均居中（面积6000多平方米，推算可出土陶俑、陶马1300多件，木质战车80多辆），它的特点是内涵丰富，步、骑、车、弩兵种齐全（只是没有水师），军阵变化复杂，且保存较好，是秦兵马俑的精华部分。

2号坑为土木结构的地下坑道式建筑，距现今地表平均5米，根据建筑结构和陶俑、陶马的排列布阵，大致可分为4个相对独立的单元。

俑坑的东北部是第1单元——弩兵阵，由174件立射俑和160件跪射俑组成；俑坑的南部为第2单元——车阵，由64乘战车组成，每车4马，它横为8排，纵为8列，车后没有跟随步兵；第3单元位于俑坑中



2号坑大厅东门外景

部，是由车、步、骑3个兵种组成的长方形军阵，战车在前，步兵在后，骑兵在车阵之后作机动或联络之用；第4单元位于俑坑北部，是骑兵方阵，共有骑兵108件。

这4个小阵既相对独立又有机联系，成为一个曲形阵。这在兵书上称作大阵套小阵，大营包小营，阵中有阵，营中有营，可分可合，扬长避短，以应付战争中瞬息万变的情况，呈现出一幅古代军阵的生动图谱，是中国考古史上唯一的发现，为了解当时的军事编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直观资料。

史书记载，公元前260年，秦、赵的长平之战，秦军便是车、步、骑密切配合，先用5000骑兵把赵军切成两段，断绝其粮草，终于聚歼赵军40余万人，成为古代战争史上多兵种合成的著名战例之一。

超群绝伦的雕塑和罕见的兵器

2号坑中的陶俑数量虽没有1号坑多，但品种丰富，其中鞍马骑兵俑和跪射俑为2号坑所独有，雕塑艺术水平很高。

2号坑内有骑兵俑、鞍马各116件，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历史最早、数量最多的一批。这些骑兵一般身高在1.8米以上，身着铠甲，足登皮靴，显得精干利落，气宇轩昂，完全符合兵书上规定：“选骑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七尺五寸以上，壮健捷疾，超拔绝伦”等的要求。我国有关古代骑兵的形象资料极少，2号坑则为有关专家提供了2200多年前骑兵的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2号坑出土的鞍马胸部宽阔，腹背壮实，四肢有力，前腿如柱，后腿如弓，显得轻捷矫健，利于奔驰，形态富于动感，奋鬃扬尾，张口喷鼻，显示出跃跃欲驰



2号坑出土的跪射俑

的神态。它们通高1.72米，身長2.03米，体重200公斤。如此高大的陶马要用泥土塑造并进行烧制，工艺要求极为复杂，到目前为止，已能烧原大秦俑，但原大陶马的烧制，虽经多次试验，都没有成功。由此可见秦代工匠制陶技术水平之高超。

2号坑的弩兵阵面向东方，位于整个军阵前沿的最突出部位。174件身着战袍、手执弓弩的立射俑，位于外围阵表，双脚略呈“丁”字形站立，前脚微拱，后腿后绷，上身挺立，左臂半举，右臂横抱胸前，作持弓弩引而不发的姿态。跪射俑则居阵心，左腿蹲曲，右膝跪地，上身挺直，双目凝视左前方。臀部紧贴左足跟，身体的重量落在右膝、左足和右足上，三个力点呈等腰三角形，重心稳，用力省，便于瞄准，容易射中目标。同时跪坐射击姿态目标小，不易为敌人发现，是防守或埋伏时的理想射击状态。在临敌时，立、跪两种姿态可以轮番射击，形成“百发不暇止”，矢如雨注的态势，弥补了搭箭张弩缓慢之不足。在一阵猛烈的射击，把敌人压得抬不起头时，骑兵便可跃马出击，发动猛烈的进攻。

2号坑在试掘中，发现了铜矛、铜弩机，铜铍及残剑、铜镞等约900多件，其中下列兵器为引人注目的新

发现。

铜铍除1号坑中常见的品种外，又发现了一种特大型号的铜铍，它全长41公分，重100克，铍头重约50克。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大铜铍，要发射这样重的铜铍，没有强弓劲弩显然不行。因此，在这次全面发掘中，也许会发现型号很大的强弩。

秦俑3个坑中出土的青铜兵器多达数万件，但青铜铍仅在2号坑中发现。其形状近似一把无柄菜刀，通长17.5公分，上部中间还留有夹木柄的痕迹。铍虽然也可以用于实战，但它是礼兵器，主要是作统治阶级仪仗，是王权和军权的象征。

现代化的展厅和周密的保护措施

2号坑保护陈列大厅经过精心设计，于1988年11月开始兴建，1994年10月14日发掘现场开放，接待中外来宾。这个大厅建筑面积达17016平方米。大跨度的工地空间设有一根柱子，设计者采用钢管球节点网架式结构。并设置了采光、通风、恒温、恒湿等先进设备。堪称全国乃至世界目前建筑面积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功能最为完善的遗址保护大厅。

秦俑是国之瑰宝，秦俑博物馆和考古队对它们进行认真保护，以使其“延年益寿”。

秦俑保护中难度最大的是防止彩绘层脱落问题。专题科研组经过多年的反复对比试验，采用在俑片上涂抹化学药剂形成保护层，并采取措施，减慢俑片干燥速度等方法，经长期观察效果良好。

俑坑内军阵队列之间的土隔梁出土后，会逐渐风化干裂，如果导致倒塌，不仅破坏俑坑原貌，而且会压坏陶质兵马。他们经过反复对比试验，采用插钢筋、镶夹板进行机械加固，并对加固物进行复旧处理，使之与原土色浑然一体效果良好。

2号坑是在发掘仅七个半月，采取边发掘边展出的形式。这样做，不仅可以让人们看到俑坑当年塌陷后的原貌和不断出土的各种遗迹、遗物，又可以直观了解从发掘、清理到整修、复原，“化腐朽为神奇”的完整过程，亲眼目睹“世界第八大奇迹”如何从2200年前的地下走向当今世界的。这种动态的展示方式，将会引发新的秦俑旅游热。

(责任编辑 凌辰)

“正直刚方”

话

王翱

● 陆茂清

明代清官，首推海瑞、况钟，以居官清正而论，王翱不在两人之下。王翱官至位高权重的吏部尚书，为官一生，“自奉俭素，正直刚方”，赢得“吏民畏爱，朝野重望”。正史及野史中，记载了这位父母官的众多感人事迹，现略取几则，可窥一斑。

拒为女婿调职

王翱有婿名贾杰，在京郊任职。此君心术不正，欲借老丈人的权势，调入热闹繁华的京都，先是转弯抹角，后是直言向王翱要求。王翱每每婉拒，并叮嘱女婿：“尽心公务，毋得萌发私心。”贾杰忠言逆耳，更生怨恨，竟然设计要挟。

王翱夫妻钟爱女儿，每月总要女儿回娘家住几天，女儿回家时，老夫人必亲至城外迎接。贾杰一连数月不许妻子回娘家，老夫人思女心切，着人送信女儿，称自己偶染小恙，要她回来服侍。贾杰本应随妻看望丈母娘，却不顾妻子恳求再三，执意不去，反而忿忿然而言：“你父居吏部尚书高位，调我回京

如秋日之振落叶，殊不料如此愠吝，再不调我入京，我就不认他，你也不许回去！”

妻子回去后，向老夫人转述了贾杰的话，央求母亲向王翱代为疏通。老夫人悉知王翱秉性，且有家眷不许过问公事的“家法”在先，故而只是闷在肚里，不敢贸然提出。

一日下午，王翱回府，脸呈喜色，连说“将酒来”，原来是了结了一桩棘手的公案，心里高兴。老夫人忖度机会来了，亲自挽袖下厨，烹饪了好几盘丈夫爱吃的菜肴，然后陪伴同饮，殷勤劝酒。趁丈夫开怀畅饮之际，讲了女儿久久不来的原因，末了说：“何不应贾杰之求，将他调来，你我既有了照应，又尽了父女翁婿之情。”

王翱搁下酒杯，正色而言道：“此地乃家堂，并非朝堂，女婿调职的事，应由吏部从公权衡，岂容你我夫妻私下议定？”老夫人以为机不可失，絮絮再作恳求。

“你敢破我家法？！”王翱恨老夫人不识大体，勃然生怒，顺手抓起一只碟子掷去，老夫人躲避不及，正中额角，顿时殷红鲜血渗出，

又怨又气，掩面而泣。

盛怒之下，王翱拂袖而起，去内室取了几件替换衣衫，径直去了朝房，一住就是半个月，直至老夫人认错赔礼再三，方才归回私第。贾杰也始终未被调入京都。

诚孙焚卷

明时，辅臣子弟有享受“恩荫”之特权，亦即不通过考试便可“及第”。故而不少才低品劣，甚至手不把笔的纨绔子居然题名金榜。王翱的孙子本系太学生，乃孙只想凭借“恩荫”及第入仕，在校无所用心。殊不料两度榜上无名，原来是王翱从中阻梗。乃孙不服，与王翱评理，王翱只一句“须以真才入学入选。”

秋试又至，乃孙明了自己翰墨不精，考必名落孙山，左思右想之下，有了办法，登门拜访了考官，暗示来意。考官本欲巴结王翱，苦于无机会，立即取过一份试卷给了他。乃孙喜孜孜而归，一连几天闭门翻经阅典，习作八股文，自谓入选在握。

此事不知怎的让王翱知道了，气恼之极，立即把孙子召来，正色厉颜训斥道：“你可登第，我岂忍蔽之？今以不择手段取得试卷，是为不德，有丧廉耻！想天下寒士三更灯火五更鸡，夜以继日攻读，为的求金榜题名。乡试录取名额有定数，你若营私舞弊误中选，既妨了一个寒士及弟之路，又使朝廷失去一有用之才，罪过莫大。快把试卷交来，不然家法从事！”

乃孙不敢违逆，战战兢兢交出试卷，王翱接过，点火化为灰烬。又责令考官，将孙子名字从应考名单中勾了。

归还明珠

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王翱衔命总督两广军务，同僚故旧纷纷与之饯别。太监胡某，本是王翱提督辽东军务时的监军，情趣相投，过往甚密，在王翱赴两广的前夜，置薄宴为之话别。

菜上五道，酒过三巡，胡太监摒退左右，取出明珠四颗相赠。王翱不胜惊讶，避席而言道：“你我相处既久，难道不知我所爱所恶？”胡太监忙解释道：“大人莫非以为我贪赃得来而不受？实非不义之财，

而是先帝所赐。”王翱复又道：“绝无此意，只是恪守洁身自好古训，不受无名之惠。”胡太监诚挚而言：“往日属受大人教益，早欲赠之，因知大人秉性，不敢造次。近确诊已患不治之症，自度不久于人世，与大人今日一别，实为诀别，又身无子嗣，故才敢赠珠以资纪念。盼大人领受，长眠泉下亦就安适了。”说着，情不自禁掉下泪来。

王翱左右为难，沉思一阵后，为勿拂故人意，收下了明珠。回家后缝在棉袄里，秘藏在搁楼上，连老夫人也没有告诉。

次年，王翱回京，得知胡太监已病故，便访其后代，打探得其尚有两个侄儿在，便登门造访。见彼家徒四壁，空空是也，知是清寒之家，便劝做小买卖以资生计，并称愿助一臂之力。遂拆袄取出那四颗明珠授之，又告之来脱去脉，未了说：“踏入仕途以来，未尝受人一物，昔日因感故人心诚意挚而纳之，实代为保管，今又归主矣！”

挨打犹自责

王翱出任吏部尚书后，调吏部主事曹恂任江西参议，曹恂到任不久，便因水土不服得病，未及报告

吏部，便匆匆回京求治。

有人报告王翱，称曹恂不愿去江西，擅离职守回了京都，王翱未经查证而奏告朝廷。代宗降旨诘责曹恂，令其即日回籍。曹恂不服，知道系王翱奏告所致，气愤之余，决作报复。

一日早朝，王翱因时间尚早，与往日一样先入朝房等待。刚跨进门槛，人丛中钻出曹恂，将他劈胸一把抓住，大声骂道：“我自有病回京诊治，为何诬告我擅自离职？”盛怒之下，打了王翱两记耳光。

皇威咫尺，竟发生殴打辅臣之事，被打的又是先朝元老王翱，文武百僚均为之不平。代宗大为震怒，将曹恂打入大牢，交大理寺究审定罪。王翱经认真勘核，始知曹恂生病是真，于是上书代宗，自责失察之过，请求免其责罚。代宗准王翱所请，开释了曹恂。曹恂明了经过后，后悔不迭，自叹弗如，亲往赔罪。王翱温颜劝慰一番后道：“误听流言，咎在我处，何罪之有？”曹恂益加敬佩，病未痊愈即去江西任上。朝臣由衷赞叹道：“王公气量恢宏，不计个人恩怨，足可为人师表。”

（责任编辑 丁 未）

本社启事

近来陆续收到几位读者来信，反映在当地邮局订不到《炎黄春秋》。特敬告各地读者，如在当地邮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社发行部邮购，每月一期单价3.20元，全年38.40元，免收邮费。本社地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邮编：100802 电话：6076801 联系人：杜习。

黄帝纪元推算

●倪民

我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

五千年文明史的概念是：从“共和”上推到禹，一般公认禹起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黄帝至禹约一千年左右，从黄帝到现在已有五千年了。

中国历史有准确的纪年，起自西周共和（公元前841年）。对于共和以前的年代，尤其是帝禹至黄帝的年代，心中模模糊糊，读起中国古代史来，总有一种朦胧之感。

阅读张良洲《炎黄祭》（《炎黄春秋》94/4），看到“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十年岁次癸酉·清明节（一九九三年四月五日）于陕西桥山黄帝陵”的落款，由此联想到“黄帝王朝建立的日期是在纪元前2698年”之说，便产生了一个念头——编《黄帝纪元与公元对照表》，以便对黄帝以来的年代有所了解。

笔者用了一周的工夫，就编出来了。以公元前2698年为黄帝元年，一直编到公元2052年，即黄帝纪元4750年。《炎黄祭》落款注明，公元1993年为黄帝纪元4690年，而拙编《黄帝纪元与公元对照表》里，公元1993年为黄帝纪元4691年，相差1年。

经与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附二《辛亥革命期间所用黄帝纪年对照表》相对照，才知道拙编《黄帝纪元与公元对照表》，与《民报》所用黄帝纪年相同。例如，发生辛亥革命的公元1911年，同是黄帝纪元4609年。当年《民报》所用的黄帝纪年，为多数革命党人所

接受。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文告，即以此为依据，各省响应的文告也多采用此说。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亦采用此说。

有了《黄帝纪元与公元对照表》，依据史籍记载来推算黄帝至帝禹的年代，也就成为可能的事了。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崩，葬桥山。”《集解》：“皇甫谧曰：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一岁。”可知黄帝在位年代，为黄帝纪元1—100年，即公元前2698—2599年。

黄帝的继位人，一说是少昊，一说是颛顼，姑且以少昊继黄帝而立吧。《世本·帝系》说：“少昊，黄帝之子，名契，字青阳。黄帝歿，契立，王以金德，号金天氏。”《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说：“少昊，金天氏，姓己，名挚，是五帝之一。……在位八十四年，寿百岁，崩后葬此（曲阜）。”推算少昊在位年代，为黄帝纪元101—184年，即公元前2598—2515年。

《五帝本纪》说：“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帝王世纪》说：“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一说颛顼继黄帝而立，一说颛顼继少昊而立，姑且以颛顼继少昊而立吧。《集解》：“皇甫谧曰：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推算帝颛顼在位年代，为黄帝纪元185—262年，即公元前2514—2437年。

《五帝本纪》说：“颛顼崩，而玄囂（即少昊）之孙高辛立，是为

帝喾。”《集解》：“皇甫谧曰：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推算帝喾在位年代，为黄帝纪元263—332年，即公元前2436—2367年。

《五帝本纪》说：“帝喾崩，而（其子）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索隐》：“挚立九年，而唐侯（即帝尧）德盛，因禅位焉。”推算帝挚在位年代，为黄帝纪元333—341年，即公元前2366—2358年。

《五帝本纪》说：“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命舜摄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正义》：“皇甫谧云：尧即位九十八年，通舜摄二十八年，凡百一十七岁。”帝尧崩，3年丧期毕，舜方即帝位。帝尧在位98年，加3年丧期，共101年。推算帝尧在位年代加丧期，为黄帝纪元342—442年，即公元前2357—2257年。

《五帝本纪》说：“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帝舜崩，3年丧期毕，禹方即帝位。帝舜在位39年，加3年丧期，共42年。推算帝舜在位年代加丧期，为黄帝纪元443—484年，即公元前2256—2215年。

《史记·夏本纪》说：“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即天子位。”“十年，帝禹东巡，将

至于会稽而崩。”帝禹崩，3年丧期毕，他的儿子启方即位。帝禹在位10年，加3年丧期，共13年。推算帝禹在位年代加丧期，为黄帝纪元485—497年，即公元前2214—2202年。

尧、舜、禹崩后都有3年丧期，因为他们皆是禅让帝位的帝王，受禅人须待3年丧期毕，并得到诸侯的拥戴，方可即位。舜、禹得到诸侯拥戴，先后即了帝位，尧、舜的禅让是成功的。帝禹禅位给伯益，禹崩3年丧期毕，诸侯拥戴禹的儿子启，伯益没能继位，帝禹的禅让是失败。从此，进入父传子或兄传弟的“家天下”时代，一直延续到清末。

关于帝禹的年代，拙编《黄帝纪元与公元对照表》的推算，与《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的推算，前后相差169年。当是由于推算的依据不同，因而结果也不同吧。推算的年代，是大致的年代，仅供参考。

《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对帝禹至共和年代的推算，使我们对夏至清的年代，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中华民国建国于公元1912年，黄帝纪元461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于公元1949年，黄帝纪元4647年。

今年——公元1995年，黄帝纪元4693年。

“黄帝纪元”像一条醒目的红线，从中华民族始祖黄帝连接到今天，连接到世世代代。有了这条红线，我们对黄帝至帝禹的年代，就不感到朦胧了。

笔者作为炎黄子孙，作了黄帝纪元推算。这是一种尝试，不知恰当与否？谨求教于专家、学者和读者，请予教正。

（责任编辑 焕 然）

黄帝至帝禹年代表

上古帝王	黄帝纪表	公元前	说明
黄帝	1—100	2698—2599	加三年丧期 加三年丧期 加三年丧期
少昊	101—184	2598—2515	
颛顼	185—262	2514—2437	
帝喾	263—332	2436—2367	
帝挚	333—341	2366—2358	
帝尧	342—442	2357—2257	
帝舜	443—484	2256—2215	
帝禹	485—497	2214—2202	

夏至清年代表

朝代	黄帝纪元	公元	说明
夏朝	666—1137	约前 2033—1562	推算年代
商朝	1137—1633	约前 1562—1066	推算年代
西周武王至共和	1633—1858	约前 1066—841	推算年代
共和至西周末	1858—1928	前 841—771	东周在内 前 256 年东周灭亡 始皇统一六国起
春秋	1929—2223	前 770—476	
战国	2224—2478	前 475—221	
秦朝	2478—2493	前 221—206	
西汉	2493—2723	前 206—公元 25	吴蜀年代略
东汉	2723—2918	25—220	
曹魏	2918—2963	220—265	
西晋	2963—3014	265—316	
东晋	3015—3118	317—420	北朝年代略
南朝宋	3118—3177	420—479	
南朝齐	3177—3200	479—502	
南朝梁	3200—3255	502—557	
南朝陈	3255—3287	557—589	从元太祖起
隋朝	3279—3316	581—618	
唐朝	3316—3605	618—907	
后梁	3605—3621	907—923	
后唐	3621—3634	923—936	从清太祖起
后晋	3634—3644	936—946	
后汉	3645—3648	947—950	
后周	3649—3658	951—960	
北宋	3658—3824	960—1126	从清太祖起
南宋	3825—3977	1127—1279	
元朝	3904—4086	1206—1388	
明朝	4066—4342	1368—1644	
清朝	4314—4609	1616—1911	

关于纪实文章必须真实的讨论

自本刊总第 22 期发表《刘亚楼发火与吴法宪挨剋》以来,曾任刘亚楼秘书的高春山、赵琼二同志,两次来信,数次来电话,说此文“严重失真”,希望本刊据实澄清。

本刊编辑部就此除多次打电话给作者谷雨同志外,还将高、赵二同志来信的复印件寄送作者。作者亦两次来信给编辑部。

本着对读者负责的精神,现将两方来信和本刊意见摘要发表,以利于沟通编者、作者和读者的思想,同心协力把刊物办得更好。

高春山、赵琼认为《刘亚楼发火与吴法宪挨剋》一文严重失真

高、赵二同志来信主要指出四点与事实不符。来信说:

(一) 文章说“有一年,刘亚楼将军奉命偕同许光达大将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回国后,刘亚楼改变过去的惯例,不先给干部做传达,而是先给战士、职工做访苏报告。这个事例是虚构的。

我们查了国防部外事局的档案和空军的外事档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65 年刘亚楼同志逝世,15 年中,没有刘亚楼与许光达率团访苏的任何记载。何况,一个上将怎么能够“偕同”一个大将率团出访呢!

(二) 文章说“吴法宪挨刘亚楼骂是家常便饭。”这也违背事实。刘亚楼同志既是空军司令员,又兼任空军党委书记。他非常重视政治工作,也非常尊重政治工作人员。空军初建时,中央军委任命肖华任空军政治委员,但不久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从此,空军的政治工作就由副政治委员吴法宪主持。刘亚楼和吴法宪的个人关系一直是融洽的。在党的会议上,不同意见的争论当然有,但不存在刘亚楼“剋骂”吴法宪的事实。吴法宪在“文化大革命”中上了林彪的贼船,成了林彪的死党,这是后来的事。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吴法宪和刘亚楼配合得还是不错的。

(三) 文章说刘亚楼斗气让司机开着“红旗”车超一辆“吉姆”的事,也子虚乌有。

刘亚楼从来没有使用过红旗轿车。刚入城乘坐的是“道吉”车,1952 年用“吉姆”车一直到他去世。国产红旗轿车问世后,军委确实配发过一辆“红旗”给他,但是他没有要,让给了刚刚提升为空军副司令员的张廷发使用。

刘亚楼到北京后的汽车司机,先后只有三个。第一个叫李宝裕,第二个叫王卓,都是老职工。第三个叫王祥,是战士。但王祥十分老实,开车十分稳重,绝不是“楞头青”。

更重要的是,刘亚楼本人一向重视礼让,行路决不争先恐后。据刘亚楼的夫人翟云英同志说:在观看文艺节目散场时,翟云英和其他观众一起站起来,刘亚楼总是拉着她再坐下,说再等一等,让其他同志先走,咱们最后走。

(四) 文章在“放肆的中校”一节中,写一个空军干部在看文艺演出时把脚放在前排的椅子背上,受到刘亚楼批评的事,确曾有过。这是此文所举六件事例中唯一确曾有过的事情。但是,时间、地点、许多情节都写错了。(1) 时间是在 1951 年,而不是 1955 年,当时没有授军衔,因此,根本谈不到“放肆的中校”。(2) 地点是在东长安街路北的青年艺术剧院看话剧“保尔·柯察金”,而不是在什坊院看空政文工团的歌舞。(3) 刘亚楼是坐在第四排,这个干部坐在第三排,他的脚是伸到第二排椅子背上,而不是蹬在刘亚楼肩头两侧。(4) 空军授衔仪式是在东交民巷 22 号的礼堂中,而不是在什坊院。

作者谷雨认为自己写的是“刘亚楼轶事”,“轶事”不排除(与事实)有出入

《刘亚楼》一文的作者谷雨在读到高春山、赵琼对《刘亚楼》一文的意见后,致函本社,做了如下答复:

一、《刘亚楼》一文原稿标题是《空军上将刘亚楼轶事》,编辑改为《刘亚楼发火与吴法宪挨剋》。而轶事与“传”或“史”当有区别,这是众所周知的。

二、《刘亚楼》一文中所记刘亚楼将军的一些轶闻轶事均为作者在空军服役中所闻,且当时空军中确有盛传,并非作者虚构。

三、空军各部队中所传刘亚楼将军轶事不排除有出入，但原则上并无大冲突，若在时间、场所、人名或前因后果上略有不同，这应当居正常现象，不应求全责备。

四、我写刘亚楼将军轶事坚持正面颂扬老同志的思想品德和优良作风，《每周文摘》和《作家文摘》先后予以转载，我因此问心无愧。

五、读者指责我的文章不严肃，如系单纯指轶闻中某些地方与事实有出入，我衷心地欢迎指正，因为这有利于正面宣传刘亚楼同志……

六、最后我要指出的是：传记文学、纪实文学之间也有“边缘传记文学”如野史、外史之类，这个文种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读者一般是喜欢的，他们更多的是注重领会文章的主体内涵，而并不在苛求某件事是否完全真实。

传记文学、纪实文学难免个别情节有失实之处，只要有基本事实和清楚来源，对读者有益，不必求全责备。

编辑部申明：尊重史实为本刊基本原则，不选取有任何虚构的文章

编辑部就双方意见进行过认真研究，意见有三：

一、本刊以记述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要求材料翔实，评论公允，实事求是。其所以为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就是创刊三年半以来刊发的大批文章，具有真实性、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因此，编辑部一再申明：来稿内容必须真实，不得虚构。对此，本期刊首编辑部文章已谈得很充分，这里不再赘述。

二、《刘亚楼》一文得以在本刊刊出，恐与编者和作者对“轶事”的理解不同有关。编者认为，“轶事，作‘逸事’。世人不甚知道的事迹，多指未经史书记载的事迹。”（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轶事”区别于“传”和“史”的，只是它的“世人不甚知道”，“未经史书记载”，而不是“传说故事”和经过艺术加工的文艺创作。如果我们知道作者写的《刘亚楼轶事》“并不苛求某件事是否真实”，“时间、场所、人名或前因后果上略有不同，这应当居正常现象”，一定会割爱的。所以我们只能再次申明：寄往本刊的纪实文章，内容必须真实，不得虚构。望广大作者理解并协助。

三、本刊今年一定把“编读窗”这个栏目办好，反映读者意见，传达编者的希冀，沟通编者、作者、读者之间的联系。

读者、作者对本刊属望殷切

南京石璜： 续订本刊后的嘱托

南京市公教一村11—1楼16号读者石璜是本刊老订户，最近来函续订1995年《炎黄春秋》，并附言说：“贵刊是当今国内独具特色、品位较高的难得的好刊，订阅数年，获益匪浅，谨致诚心的谢意。诚如贵刊1994年第10期《错误批判马寅初的前前后后》一文的按语所说：‘此文沉痛地严谨地准确地叙述了这段历史，是作者想借此提醒今人后人，牢牢记取这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我很赞同这种态度与编辑准则（当然不必篇篇都是沉痛的）。又如田方写的《我和彭德怀交往十二年》，朱开印写的《我的军事外交官生涯》等文，也都好，好就好在真实有一定深度。过去我们中国人知道自己中国的事太少了。自然，千万不可像某些人那样，对历史很不严肃，道听途说，想像编造，抓住一些未经核实的片断材料，就大写其所谓纪实文学，这种文字，千万登不得。”

天津老姬： 北京书摊觅本刊

家住天津体院北二区紫金北里27号的李竹筠女士，已90岁高龄，前不久来京探亲，一个偶然机会看到一本《炎黄春秋》，爱不释手。差家人在北京书摊上寻觅购买不得，来电话给本刊发行部求购。我发行部得知读者系一外地老人，立即将其欲购的杂志送往北京礼士路36号她的亲戚家。李竹筠女士一再表示，并激动地说：“这份杂志将是我晚年的伙伴。”

老将军阎同茂： 来本社购书并探望

原北京军区副司令阎同茂老将军，亲自来本社办公室，补购1994年丢失的杂志，并来探望编辑人员。他说：“我现在退出一线了，每天要读书看报纸刊物。《炎

黄春秋》是办得好的，很严肃，对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介绍，是实事求是的，我周围的一些老同志也这么看。”我社接待的同志说：“以后有什么事，您老打个电话或者让身边工作人员来好了。”阎同茂老将军说：“不，我亲自来是要看看你们，你们辛苦了。不过办一份好杂志，辛苦也是值得的。”

枣树专家： 同样喜读《炎黄春秋》

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西省著名枣树专家谢进宝说：“我是搞自然科学的，可是我也喜欢看《炎黄春秋》。”谢进宝同志由山西调来北京后，手头的《炎黄春秋》不齐，11月的一天，从郊区赶到城

里，补购了一些过期的杂志。他称道《炎黄春秋》的特色和风格，希望杂志办得更好。

北京王雅南： 出国前预订本刊

北京某中学数学教师王雅南，1994年9月随作外交工作的丈夫赴澳大利亚。临行前到本社要求破例预订1995年全年《炎黄春秋》杂志。她说，她家是老订户了，因出国赶不上全国统一征订期，又怕1995年看着不着杂志，所以要求预订，并说每月杂志留在杂志社，1995年丈夫休假时来取。发行部同志欣然答应了这一热心读者的请求。

欢迎为《炎黄春秋》踊跃投稿

《炎黄春秋》杂志是以周谷城为会长、萧克为执行会长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所主办，是历史纪实为主的综合性月刊。本刊坚持以展示炎黄文化成果，讴歌中华历代英杰，回顾民族发展历程，描绘神州人文风貌，讴歌改革开放大潮，宣扬海外华人爱国奉献精神为主旨。高举爱国主义大旗，遵循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倡讲实话，讲真话，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力求真实地反映其本来面貌。防止主观性和片面性，不任意褒贬，不容无中生有地虚构。

本刊创刊三年半以来，以其思想性、真实性、知识性、可读性和史料价值，深受广大读者所喜爱，来信来稿不断增多，许多佳作被国内外数十家报刊转载。为了更好地办好刊物，提高质量，拓宽刊物内容，欢迎学者、作家及热爱本刊的作者和读者，根据刊物的宗旨、内容和风格，踊跃投稿。现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一、为保证内容的真实性，要深入采访，反复核实，掌握可靠的、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如根据有关资料加以整理，请注明资料来源和参考书目。

二、文字力求简明、通畅。来稿一般不要超过15000字，欢迎二三千字的短稿。最好配有清晰的图片（彩色、黑白均可），并写清说明。

三、文字要规范，不要潦草。特别是人名、地名、年月、数字、引文、古文、生僻字、外文等，一定要写清楚。

四、请自留底稿。来稿如不采用，一般不退。如必须退回，请予注明。

五、请勿一稿两投或多投。来稿在三个月内如未见刊用，亦未接刊用通知者，可自行处理。如发现其它报刊已经采用，本刊恕不再付稿酬。

本刊编辑部

《炎黄春秋》1994年(1—12期)总目录

□特稿□(专稿)

甲申三百五十年	94.3	P.4	商传
开国反腐第一案全景写真——处决刘青山、张子善			
高层决策纪实	94.4	P.4	罗先明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94.5	P.4	萧克
当代女包公——刘丽英	94.5	P.8	段向群
陈独秀诗集序	94.6	P.4	萧克
萧克评说陈独秀诗	94.6	P.6	靳树鹏等
轰动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席位写实	94.6	P.7	吴妙发
我随邓小平出访美国	94.8	P.4	凌云
周恩来与胡志明半个世纪的交往	94.11	P.4	杨明伟
美国友人目睹的“乒乓外交”内情	94.11	P.11	司任译

□英杰谱□

刘亚楼发火与吴法宪挨枪	94.1	P.4	谷雨
一个贴身卫士眼中的毛泽东	94.1	P.10	刘荣林
陆定一与前妻唐义贞的生离死别	94.1	P.58	荒坪
国画大师与一代伟人的友谊交往	94.1	P.71	赵友慈
保卫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94.2	P.4	刘森
与领袖和革命家的第二次握手	94.3	P.10	段苏权
田家英与毛泽东的诗词交	94.3	P.14	曾自等
邓小平与三峡工程	94.3	P.20	卢江林等
耿飈在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关头	94.4	P.46	石雷
大将许光达和他的娃娃亲	94.4	P.49	纪流
叶剑英与古典诗词	94.4	P.54	张廷栋
邓小平在解放战争中二三事	94.5	P.38	陈斐琴
陈老总和小藏胞的故事	94.6	P.13	王震学
西安事变前夕，李克农与张学良的秘密谈判	94.6	P.16	刘润生
邹韬奋秘访新四军	94.7	P.37	俞润生
李立三为刘少奇作证	94.8	P.34	李思慎
李立三的绝命书	94.8	P.38	天风
江姐托孤	94.8	P.23	知先

我和彭德怀交往十二年	94.9	P.4	田方
老舍为什么没领到诺贝尔文学奖	94.9	P.70	舒云
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	94.10	P.4	李翼振
东北抗日英雄马占山传奇	94.10	P.13	岳娥
周恩来在颐和园的足迹	94.12	P.4	徐凤桐
胡耀邦七次来广西	94.12	P.8	孙鸿泉

□春秋笔□

毛泽东与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谈话的前因后果	94.1	P.15	邓加荣
济南车站血案——“三不知”			
将军张宗昌之死	94.1	P.22	黄国平
我驾机秘密转移张学良夫妇			
去台经过	94.1	P.42	方雅南
李宗仁“逼”宫始末	94.1	P.46	王朝柱
我在“文革”初期的滑稽人生	94.2	P.11	于光远
侵华日军投降内情	94.2	P.22	张力
蒋介石与周恩来同游南岳	94.2	P.46	梁贤之
蒋介石八大金刚抗战功罪录	94.3	P.26	尹家民
一九四九·南京江面的壮举	94.3	P.38	杨肇林
红卫兵小报兴亡录	94.3	P.40	古阳木
血溅居士林——孙传芳之死	94.3	P.50	黄国平
省委书记——叛徒——烈士——？——陈治平将军的曲折人生	94.4	P.29	童乃元
深入虎穴的特殊将军	94.4	P.58	石湾
西蜀沉戈——罗广文将军起义纪实	94.4	P.70	谢谷等
西伯利亚，一个中国囚徒的诉说	94.5	P.30	于蔚
冯玉祥将军的戏剧人生	94.5	P.24	陆立之
计除活阎王——石友三之死	94.6	P.44	杨玉文
中国的法西斯——康泽	94.6	P.48	立之
陈伯达利用《人民日报》煽风点火见闻录	94.7	P.13	朱悦鹏
轰动台湾的“孙立人案”今破解	94.7	P.19	杨毅周
宋庆龄、宋子文姐弟的分分合合	94.7	P.30	连若雪

□总目录□

康生是怎样扼杀历史学研究的	94.8	P.28	丁守和
章士钊寻踪三格格			
毛泽东感慨赞御妹	94.8	P.48	刘蓬
理想是顽固的	94.8	P.75	钟鸿
卢沟桥事变的那一天	94.9	P.62	柳山
一个中央专案组长的忏悔	94.9	P.22	张嵩山
兴建天安门英雄纪念碑内情写实	94.10	P.23	闫权军
红色牧师的故事	94.10	P.26	王朝柱
两广总督叶名琛误国辱身记	94.10	P.30	吴仰湘
蒋介石行刺陶成章始末	94.10	P.32	张家康
六十年前谋杀蒋介石案的策划者华克之	94.11	P.33	尹骐
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是怎样被毒杀的	94.11	P.77	黄国平
能言善辩的乔冠华	94.11	P.44	吴妙发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问题的来龙去脉	94.11	P.68	马福龙等
反共摩擦 阎锡山挑起晋西事变	94.12	P.24	穆欣
阎锡山以父为质 三次觐见袁世凯	94.12	P.29	徐崇寿
阎锡山在台湾无可奈何的最后岁月	94.12	P.31	徐崇寿
侵华战争从这里展开	94.12	P.56	刘宏伟
皖南事变后陈诚看管叶挺	94.12	P.62	德英

□求实篇□

徐水，梦幻的天堂	94.1	P.28	辛平
最早为包产到户呼号的两个年轻人	94.2	P.54	韩三洲
陈独秀之死	94.2	P.61	靳树鹏
力挽狂澜——记“文革”时期周恩来与“四人帮”斗争的片断	94.3	P.55	穆欣
一九五四年：《红楼梦》研究如何激起政治风波	94.4	P.20	吴晓梅
农村“四清”：十年动乱的前奏曲	94.4	P.38	杨克现
《黄药眠现象》一解	94.4	P.43	黄大地
《黄药眠现象》复黄大地的的一封信	94.4	P.44	文怀沙
我的同学蒋经国	94.5	P.16	陆立之
我所知道的军阀韩复榘不是草包	94.5	P.72	陆立之
辽沈战役中，我所目睹的林彪	94.6	P.19	谭云鹤
李立三是南昌起义的倡导者和重要领导者之一	94.6	P.29	李思慎

难得清醒——一个老编辑对若干政治运动的反思	94.6	P.34	李庄
胡耀邦与真理标准讨论	94.7	P.4	张江明
引起轩然大波的“迎春晚会”真相	94.7	P.7	余思
一本大书的小插曲	94.7	P.11	李冰封
女诗人关露的苦难人生	94.8	P.52	尹骐
“要吃米找万里”民谣的来龙去脉	94.8	P.14	吴象
瞿秋白“多余的话”并非多余	94.9	P.52	林勃
“多余的话”的历史真实	94.9	P.57	陆立之
鬼戏《李慧娘》冤案画上句号	94.10	P.34	穆欣
错误批判马寅初的前前后后	94.10	P.44	辛平
“九一八”夜张学良与胡蝶跳舞纯属谣言	94.10	P.53	荣华等
关于蒋光慈被开除党籍的一些内情	94.10	P.55	张振明

□殒星篇□

将军作战在狱中	94.3	P.64	吴越
贺龙惩罚日本军火商	94.5	P.35	宋川等
郭沫若和鲁迅的笔墨官司	94.5	P.42	黄侯星
忆周扬同志二三事	94.7	P.44	露菲
张闻天在无锡的最后十个月	94.9	P.35	朱亮
战将许继慎之死	94.9	P.46	桂诗新
胡耀邦谈鲁迅杂文	94.10	P.86	田方
黄骅被害与平叛始末	94.11	P.23	晓凌
巾帼英雄——秋瑾	94.11	P.40	严风莲等
冯玉祥在重庆和蒋介石的争斗	94.12	P.64	于志恭
女杰胡筠志难酬	94.12	P.51	李锐

□时代风□ (时代潮)

京城神秘“炒”房人	94.1	P.52	刘长华
税收，最长与最短的思考	94.3	P.72	刘伯正等
人民币是不是毛了？	94.5	P.48	
您认识钱吗？	94.5	P.49	钟卉
第一张人民币问世 标志一个新时代	94.5	P.52	左卉
毛泽东不同意把他的画像设计在人民币上	94.5	P.53	钟卉
银行的钱是怎样进入市场的	94.5	P.50	孙勇
让老外目瞪口呆的中国大款	94.5	P.54	龚雯
明天，信用卡能代替人民币吗？	94.5	P.57	夏日
电视片《毛泽东》诞生记	94.7	P.49	吴晓梅
笔魂——记书法家王明远	94.8	P.42	张飏
感受超人——大气功师刘燕			

探秘	94.8	P.66	于源
水的贫困严重威胁着中国的生存	94.10	P.66	徐刚
大漠儿女情	94.10	P.74	张颢
历史不再回头——记三个私营公心的亿万富翁	94.12	P.44	李德复

□人海浪□ (人海潮)

作曲家付林谈歌星素质	94.1	P.66	李南友
他拥抱泰山	94.1	P.73	银珠儿
一个历史学教授的人生	94.1	P.75	王方越
我的父亲：从写《我的前半生》到“被告”	94.2	P.50	海河
蓝盔部队：未曾披露的新闻	94.2	P.72	黄创新等
韩美林说：“我的路在中国”	94.3	P.22	李南友
“文胆”陈布雷之死	94.5	P.80	王晓华
一张经历非凡的朱德照片	94.6	P.51	乔天富
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的辛酸童年	94.6	P.52	刘益涛
豫剧名旦崔兰田与陈素真	94.6	P.56	毕定良等
下海弄潮的科学骄子——机译专家陈肇雄	94.7	P.64	王初阳
驯服命运的强者——一个知青的奋斗历程	94.7	P.70	高岩
掌上悬壶济众生——掌纹医学专家王晨霞	94.7	P.75	王克明
民初五大总统后裔今何在	94.8	P.60	鲍国之等
“赤子深情终未改，欠多少父老乡亲相思债”	94.8	P.83	刘淮
大难不死 尚待后福——我的“右派”生涯片断回忆	94.9	P.72	公刘
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其人其事	94.10	P.56	王雷
四大家族及其子女的现状	94.10	P.62	马克锋
辅佐梅兰芳成为伶界大王的三名人	94.11	P.83	葛献挺
我所知道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	94.12	P.20	陆立之
蔡畅和陈毅前妻赖月明的两代情	94.12	P.36	赖昌明

□古今谈□

“毛泽东热”中的文坛造假风	94.2	P.68	徐焰
祭炎帝陵 扬民族魂	94.2	P.82	鲁諄
军阀政客与风水迷信	94.5	P.85	刘秉荣
曹操为啥要曹丕当接班人	94.5	P.71	竟陵子
萧何会做官	94.5	P.71	竟陵子
重贿无廉臣	94.5	P.73	竟陵子
毛泽东反批“失街亭”	94.7	P.62	陈雄

中国何以并存两个“世界第八奇迹”	94.7	P.48	刘永国
长春真人万里传道成吉思汗	94.9	P.86	纪流
张学良的龙凤恋	94.12	P.84	纪流
武则天是怎样走向权力顶峰的	94.12	P.74	徐庆全

□古镜台□

清代廉吏于成龙	94.1	P.90	王俊义
郭沫若与“星临轩”牛肉馆	94.2	P.49	刘宏伟
乾隆年间的一次万里长征	94.2	P.77	吴杰
乱世谋臣李泌	94.2	P.83	胡戟
蒙奸德王皇帝梦的破灭	94.3	P.80	李平
拒绝尊号的康熙皇帝	94.4	P.80	彭云鹤
硬骨头廉政名臣范仲淹	94.5	P.58	徐庆全
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查赈			
大员李毓昌被害记	94.6	P.62	肖冰
清末爱国爱民三壮士	94.6	P.71	辛建
从奴隶到宰相	94.7	P.81	徐崇寿
武则天与酷吏政治	94.7	P.84	胡戟
毕升故里在英山	94.8	P.72	马民权
中日甲午战争反思录	94.9	P.41	王戎笙
左倾盲动主义的飞行集会	94.9	P.51	一丁
古代廉吏拒贿术	94.10	P.81	杨开保
西陵山下话嫖祖	94.10	P.82	鲁諄
东汉大经学家郑玄的一生	94.11	P.54	管理成等
中国人你还知道“甲午”吗?	94.11	P.74	张剑
汉文帝提倡薄葬	94.12	P.82	王涛
唐贞观厉行精简勤政	94.12	P.87	官波舟

□文萃苑□ (文荟园、文萃阁)

蒋介石踢足球	94.1	P.41	石林等
司徒雷登离开中国以后	94.1	P.45	石林等
陈布雷收集民间叙事诗	94.1	P.27	石林等
梅兰芳和小凤仙	94.1	P.72	石林等
张作霖赞赏常荫槐铁面无私	94.1	P.70	文彬
王莽热衷科学实验	94.3	P.79	石林等
林语堂与马	94.4	P.57	杜文彬
读《陈独秀子孙们的命运》一文有感	94.5	P.56	苏瀟雷
陈独秀诗六首	94.6	P.80	任建树等评注
鄂、湘、黔即景 诗十二首	94.6	P.83	布赫
艾黎和洪湖	94.6	P.85	黎白
郁达夫与曾朴谈赛金花	94.6	P.87	俞小红
陈立夫与中医学	94.8	P.64	翟书惠等
何应钦在台总当治丧委员会主任	94.8	P.27	翟书惠等
点睛传神——看张良仁先生			

□总目录□

的人物画	94.8	P. 65	缪慧敏
李登辉秘书雷秉章退休当算命先生	94.8	P. 85	翟书惠等
齐燕铭遗札	94.8	P. 82	吴泰昌
神之谜	94.9	P. 9	李冰封
中国现行哀乐的由来	94.9	P. 75	宁 可
咏“臭老九”	94.9	P. 75	梁漱溟
炎黄颂	94.11	P. 17	程思远
历尽沧桑的炎帝陵	94.11	P. 65	罗炳生
两位文化巨人陈寅恪与吴宓的晚年交	94.12	P. 19	刘梦溪
琵琶女艺术家吴蛮	94.12	P. 78	杨闻宇

□赤子心□

华侨领袖陈嘉庚	94.1	P. 77	刘正英等
香港实业界的奇女子梁国馨	94.6	P. 59	齐 夫
魂系故土的旅法画家吕霞光	94.7	P. 59	殷翔云
我的军事外交官生涯	94.9	P. 10	朱开印
白话诗人徐志摩	94.9	P. 45	王凡西
我祖父严济慈的品学与脾气	94.11	P. 18	严 立
执掌美国设计斜拉桥牛耳的桥梁专家邓文中博士	94.11	P. 59	陈 浜
海外华商投资中国大陆纪实	94.11	P. 49	王永志
陈嘉庚与蒋介石、毛泽东	94.12	P. 14	杨颖奇

□同根结□ (同心结)

根之深——李政道与中国	94.4	P. 83	顾迈南
一位台湾老兵回乡探亲记	94.6	P. 73	张家林
中国是她感情寄托的所在——记韩素音	94.7	P. 56	叶君健
张梦白与蒋纬国的师生情谊	94.8	P. 11	张同新

□遗闻录□ (轶闻录)

蒋介石的匕首——戴笠	94.5	P. 63	荣 华等
冯玉祥征婚记	94.9	P. 21	述而作

胡宗南包围延安受挫记	94.9	P. 82	立 之
揭开甲午历史的黑匣子	94.9	P. 36	邓加荣
黄伯韬殉葬记	94.12	P. 70	李 伟
海燕事件	94.12	P. 59	田 方

□神州录□ (神州光)

原始村遐想	94.4	P. 77	王守义
他们创造了中国第二次核打击力量	94.5	P. 74	彭子强
珠穆朗玛峰上的奇迹	94.9	P. 76	王友齐
中国一绝——万钟的彩蝶画	94.12	P. 80	田闻一

□九州景□

西秦古文化名胜掠影	94.7	P. 86	郑国铨
-----------	------	-------	-----

□西洋景□

“万宝路牛仔”攻入神州	94.11	P. 71	叶维力
-------------	-------	-------	-----

□他山石□

惊世名记者法拉奇的中国情	94.5	P. 44	王基高
冲垮大清王朝的川汉铁路股票风潮	94.9	P. 84	王晓华

□耻辱柱□

刘传新，为“四人帮”殉葬的公安局长	94.1	P. 80	蔡明忠
-------------------	------	-------	-----

□读者来信□ (读者窗)、论谈窗、信息窗

经济形势越好 越要反对形式主义	94.11	P. 86	李德复
毛泽东诗词手迹掺假了吗?	94.12	P. 60	穆 欣
我喜欢《炎黄春秋》	94.8	P. 41	王景山
“炎黄春秋杯”有奖征联评选揭晓	94.3	P. 86	

炎黄春秋

中国历史出版社出版 创刊于1981年 每月15日出版



邓拓(左)和何一风1950年摄于北海



梅兰芳在《霸王别姬》中饰虞姬，杨小楼饰项羽

李大钊身边的一对革命情侣

邓拓夫人谈邓拓的诗

张旭明、张大千与《五虎仕女图》

“郑和”号舰下西洋

横扫六合军威壮 ——秦兵马俑二号坑发掘揭秘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邮发代号: 82-50

定价: 3.20元